



目 录

专论

- 3 C·比留科夫 / 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俄国经济史

- 33 张广翔 周嘉滢 / 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原因的阐释：冷战以来的理论转向与研究焦点
- 58 徐广森 / 十月革命前俄国北方航道开发历史探析

俄（苏）外交

- 87 封帅 / 大陆帝国邂逅海洋文明：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义
- 118 郝江东 / 1947年旅大问题与苏联的“双规”策略
- 137 陈梦莉 张强 / 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原因及影响

俄（苏）认同

- 157 郭小丽 / 13-14世纪中俄文化认同的趋同性
- 185 下米斗仲夫 / 日本和苏联的相互认同研究（1945-1991年）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肖辉忠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7年第5期(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Бирюков С.В.

Регионы Приволж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3)

Чжан Гуансян, Чжоу Цзяин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причин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в 1861 г. западными учёным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поворот и основной фокус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 време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33)

Сюй Гуанмяо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ей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58)

Фэн Шуай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й империй с мор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87)

Хао Цзяндун

Проблемы Порт-Артура и Дальнего и «двухколей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1947 г..... (118)

Чэнь Мэнли, Чжан Цян

Дебаты, причины и влияние «север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в Японии..... (137)

Го Сяоли

Сближ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XIII-XIV вв.....(157)

Нобуо Симотома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заимн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Япон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85)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7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Sergey Biryukov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n Volga Federal District... (3)

Zhang Guangxiang, Zhou Jiaying

Western Scholars' Interpretations of Causes of Russian Emancipation Reform in 1861: the Theoretical Turn and Research Focus since the Cold War (33)

Xu Guangmiao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Russian Northern Sea Route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58)

Feng Shuai

When Continental Empire Encounters Marine Civilization: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Great Britain-Russian Relationship (87)

Hao Jiangdong

The Soviet Union "Double Track" Strategy and the Lv Shun and Da Lian Issue in 1947... (118)

Chen Mengli, Zhang Qiang

Domestic Debates regarding "the Kuril Islands" in Japan and Analyses of Their Causes and Influences (137)

Guo Xiaoli

The Convergence of Chinese and Russian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157)

Nobuo Simotomai

Japan-Soviet Union Mutual Perception Studies (1945-1991) (185)

专论

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 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C·比留科夫**

【内容提要】中俄两国政府推出了“长江-伏尔加河”合作规划。为此，特别需要研究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伏尔加联邦区内各联邦主体地位不同，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游说和影响中央政府的能力差别也很大。整体而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两个共和国，以及下诺夫哥罗德州，历史积累与发展态势较好。伏尔加联邦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特别是来自德国的投资），有着丰富的经验。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为中俄“长江-伏尔加河”的合作，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识支撑。

【关键词】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合作 俄罗斯地区 俄罗斯经济 伏尔加联邦区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5-0003(30)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欧亚伙伴关系背景下的中俄‘两河流域’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7BGJ032）的阶段性成果。

** C·比留科夫（Бирюков С.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专任研究员；俄罗斯国立克麦罗沃大学教授。

一、俄罗斯各地区总体经济状况

当前，俄罗斯各个联邦区及其内部的联邦主体，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传统经济领域的生产下降，没有足够的资源用于现代化更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无法成功实现进口替代战略，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劣。

尚无稳定的迹象表明俄罗斯已经走出了衰退和萧条。俄罗斯各地区在整个 2016 年，在一些重要的指标上，如投资、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等方面，都在下滑。虽然各地区 2016 年的预算平衡情况有所好转，但这是出于中央政府帮补的结果。俄罗斯地区经济形势仍不稳定，但往往也正是由于这些“波动”，从全国平均的角度，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走势。俄罗斯地区问题专家、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纳塔莉亚·祖巴列维奇（Нагалья Зубаревич）的看法是，俄罗斯工业领域逐步适应了持续性的危机，从 2016 年全年来看，工业生产取得了小幅增长（1.1%）。只有 20 个地区的工业生产是下降的，但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值占比很高（超过 18%）。整体而言，工业生产发展态势良好的地区，是那些以农工、军工为主的地区，以及新的石油开采地区。卡卢加州的汽车工业也开始走出衰退。制造业领域，实际生产下降的地区数量，在 2016 年减少到 31 个（2015 年是 43 个），但 31 个地区仍然不是小数字。祖巴列维奇认为，说俄罗斯工业地区完全克服了经济下滑，还为时尚早。^① 同样，对于拥有巨大工业潜力的伏尔加联邦区而言，从整体上看，工业生产表现出正面的信号，但不是伏尔加联邦区辖区内的所有联邦主体。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不足，其中首要的是“投资饥渴”（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голод，有投资需要，但投资不足）。从 2013 年到 2016 年，投资下降了近 12%。2016 年，投资继续下降的地区有 47 个。投资规模最大的地区（联邦层面的大城市、秋明州的油气开采区），在整体上保持着积极的投资趋势，即便是在危机的情况下，其竞争优势仍然很明显。在油气开采领域内的投资，也保证了雅库特地区投资指标的稳定增长。其他投资规模大、投资指标积极的地区，还有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

^① Мониторинг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Институт Гайдара. РАНХиГС.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ВАВТ) Минэконом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М., 2016.

共和国（均属于伏尔加联邦区）、沃罗涅日州和秋明州。伏尔加联邦区的其他大部分地区，由于投资环境差，吸引投资的能力有限，都在经历着“投资饥渴”。

同时，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地区而言，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是，财政赤字不断攀升。按照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季斯拉夫·茹科夫斯基（В. Жуковский）的看法，在 2015 年秋季，俄罗斯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处于隐性财政赤字（没有公开承认，但实际存在；没有中央的帮助，地区无力长期承担社会性开支）的状况之中；60%的地区有实际的财政问题，无力清偿贷款。^①随着商业积极性的下降（包括中小企业），各地区的税收基础受到影响，税收下降。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俄罗斯地方政府将资不抵债，进而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只能被迫向政府和央行借贷，隐性财政赤字实际上将无法避免。实际上，任何一个地区的货币贬值超过 20%，都意味着隐性财政赤字。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对于伏尔加联邦区一些长期处于衰退的联邦主体——如莫尔多瓦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以及基洛夫州——而言，尤其如此。

联邦中央的预算紧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许多地区在社会领域的危机，以及营商环境的恶化。按照茹科夫斯基的判断，目前政府首先在社会需求、支持低收入群体、专门性的投资项目等方面缩减支出，造成了社会领域内的严重危机。比如，冻结国家生育基金、冻结退休金和奖学金、冻结退休金储备，不再补贴郊区交通建设和维修，提高住房和公共服务费用，卫生和教育私有化等。^②另一方面，大多数商业企业由于贷款利率高、自然垄断行业的服务和产品价格高，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在目前的情况下，地区从联邦中央得到帮助的希望很小。实际上，2017-2019 年联邦预算，削减了对地方的财政资助。从 2016 年的 3100 亿卢布减少到 2017-2018 年的年均 1000 亿卢布，再到 2019 年的 500 亿卢布。同

① Владислав Жуковский. Шок: новая девальвация ударит осенью, а Росс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маргинальной. <http://asiarussia.ru/persons/8652>

② Жуковский В. Рост экономики – иллюзия, если население нищает. <http://www.eifgaz.ru/jukovsky-8-17.htm>

时，给予地方的预算外转移和税收返还额度，也被缩减。^①根据俄罗斯财政部门的解释，2016年预算中用于支持地方的3000亿卢布，是反危机措施，今后不会延续。

综上所述，俄罗斯各地区均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由于“增长战略”（原料领域、人为制造的“信贷繁荣”、进口替代，以及其他方面）的危机，地区层面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能成为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同时，俄罗斯地区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存在着障碍。

目前，俄罗斯很多地区都没有成型的地区发展战略和规划。此外，在一些地区，甚至没有接纳外国投资的法律制度、经济机制和基础配套设施。再加上一些地方上的官僚作风、封闭主义与狭隘思维，整体上，俄罗斯很多地区的营商环境不佳，行政官僚作风盛行。

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跨地区经济互助（МАЭВ）的框架内，积累了地区间相互协作的宝贵经验。在制定宏观地区发展规划方面，也有一定的经验。在联邦区的层面上，也有成型的地区间合作的制度机制。这些都有助于协调和引导外资进入地区的方向和进程。最后，俄罗斯的许多联邦主体，有着有雄心壮志的地方精英，这些人意识到了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进行现代化更新的必要性。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吸引大规模投资，包括来自海外的。

然而，在许多地区民众的意识中，对于吸引海外投资没有定见，缺少明确的价值判断。整体上，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民众对于在地方上经营的大型联邦性商业企业（寡头企业）和来自大城市的金融工业集团，持消极态度。显然，地区的投资吸引力，与其发展前景密切相关。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祖巴列维奇认为，俄罗斯各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主要是由一系列基本的因素（优势因素与障碍因素）决定的。^②在克鲁格曼等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划分了这两类基本因素。在研究者们看来，决定俄罗斯地区发展的“第一自然因素”有：

——能够保障市场所需求的自然资源（矿物资源，土地资源，以及其他）；

① Евстигнеева А. России нужен бюджет надежды// Известия. 8 ноября 2016.

② Зубаревич Н. Базовые факторы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ыше головы не прыгнешь. <http://russia-2020.org/2010/08/23/soc-ec-development-of-rus-regions/>

——有利的地理位置（包括临近全球贸易通道），可以节约运输成本，便利创新传播。

决定俄罗斯地区发展的“第二自然因素”包括：

——集聚效应与人口的高密度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

——发达的基础设施有助于缩减经济距离，这对于地域广袤的俄罗斯而言尤为重要；

——人力资本（教育，健康，劳动力，人口流动性等）

——能够改善经营环境的制度因素，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创新的传播等。

所有的这些因素，按照研究者的看法，都对俄罗斯的地区和城市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俄罗斯地区发展的特点是，对“第一自然因素”的依赖不断加大，首先是全球市场最为需要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和金属）。

“第二自然因素”以及地理位置，在很多情况下，是发展的障碍。祖巴列维奇指出，俄罗斯地区目前有如下的特点：

——城市数量少，特别是人口超过 20 万的大城市（在俄罗斯 1090 个城市中，人口超过 20 万的只有 90 个）。由此，除了大型的联邦都市外，城市聚集效果弱；

——基础设施不发达，大部分地区距离贸易通道遥远，甚至是人口稠密的欧洲部分，都处于经济外围地区（超过 40%的领土）；

——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连年下降；

——制度更新和改善所面临的障碍，不仅有目前的政策，还有流传下来的发展模式（路径依赖）。

祖巴列维奇指出，由于俄罗斯空间和地区发展的惯性巨大，所有这些因素和障碍，都是长期性的。快速地改善、明显地降低“第二自然因素”障碍，以及减少外围地区的规模，在 2020 年之前，不会出现。在研究和制订未来发展规划和预测时，需要首先考虑到这些对俄罗斯空间和地区发展的影响因素与障碍；其次需要明了俄罗斯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趋势，因为俄罗斯的空间发展有很大的惯性；第三是要考虑到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地区层面的政策。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地区政策不是长期的优先方向，相关的制度工具效率低、不系统。因此，影响未来地区发展的，不是联邦中央的地区政策，

而是其经济与社会政策。下面重点分析伏尔加联邦区的情况。

二、危机背景之下的伏尔加联邦地区

（一）基本情况介绍

从综合潜力来看，伏尔加联邦区在俄罗斯所有联邦区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是最具前景的一个地区，有能力吸引大规模投资，值得关注。

伏尔加联邦区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地区内联邦主体行政地位的多样性，这也是该联邦区经济政策协调中的一个障碍因素。伏尔加联邦区内有 14 个联邦主体，其中，共和国 6 个：巴什科尔托斯坦、马里埃尔、莫尔多瓦、鞑靼斯坦、乌德穆尔特和楚瓦什；州 8 个：下诺夫哥罗德、基洛夫、奥伦堡、奔萨、萨马拉、萨拉托夫、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彼尔姆。

除了行政地位不同以外，这 14 个联邦主体在自然气候条件、资源潜力和经济结构等方面，也差别巨大。在自然-地理因素方面，可以把伏尔加联邦区内的联邦主体分为三类：伏尔加-维亚特卡河流域地区（Волго-Вятские）、伏尔加河中游地区，以及西乌拉尔地区（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和彼尔姆州）。这些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不同的地理-经济特征。^①

伏尔加联邦区在俄罗斯是人口最为密集的行政区之一，总面积 103.8 万平方公里（占俄全国面积的 7.27%），人口数量 3200 万（占俄全国人口的 22.1%，仅次于中央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的工业产值位居各联邦区之首，占比 23.9%，表明该地区工业化程度高。伏尔加河是联系整个地区的纽带，是欧洲第一大河，也被认为是俄罗斯经济的动脉。从古至今，伏尔加河沿岸居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与这条河道密切相连。

伏尔加联邦区首要的优势，是其良好的地理位置。该联邦区是资源丰富的乌拉尔地区与经济发达的俄罗斯西北地区之间的天然纽带。伏尔加联邦区区位的独特性还在于，它处于国际交通走廊的交汇处。这条走廊把俄罗斯的

^①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го и Приволж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кругов. <http://www.litsoch.ru/referats/read/38677>

欧洲部分、欧洲国家，同西伯利亚、远东、东亚国家连接在了一起。大部分从西西伯利亚出来的油气管道，都经过伏尔加联邦区，这有助于发展当地的石油化工工业，并降低该地区获得能源（包括天然气）的成本。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伏尔加联邦区较为紧凑的地理配置，相对整齐的自然-地理与自然-气候条件，也是一个优势。相比之下，西伯利亚联邦区面积广大，跨越了数个自然气候区，显得过于松散。

伏尔加联邦区有一些重要的、全国性的大城市，如下诺夫哥罗德、喀山、乌法、萨马拉、彼尔姆；也有一些发达的、地区性的城市，如乌里扬诺夫斯克、切博克萨雷（楚瓦什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萨拉托夫、奥伦堡、奔萨、陶里亚蒂（萨马拉州第二大城市）、卡马河畔切尔内（位于鞑靼斯坦共和国）；还有散布在各地的中小城市。这些是伏尔加联邦区内具有前景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中心。

伏尔加联邦区的经济潜力（人才、工业和农业）是毋庸置疑的。该联邦区经济结构多元化，采掘工业、机械制造、化工、农工、生物技术、制药、建筑、建材、交通和能源等行业均衡发展。伏尔加联邦区传统的优势是机械制造（航空、火箭、造船、仪器、机床等）和石化工业。在矿物肥料、合成树脂、塑料、轮胎和苛性钠的生产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伏尔加联邦区自然资源丰富，石油与天然气储藏量巨大，钾盐储量占全俄罗斯的96%；还有大量的磷矿、锌、铜、铁、金和矿泉水资源。几乎每个联邦主体都有碳氢化合物资源。此外，在伏尔加联邦区的东北部，有着世界规模的钾盐矿床、大型的钛和铜矿矿床。丰富的能源储备与发达的加工工业，这是伏尔加联邦区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该联邦区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方面，居全国第二位。伏尔加联邦区的碳氢化合物，除了用作本地区化工工业的原料，还能够出口。

伏尔加联邦区农业气候条件好，种植业和养殖业发达，并由此带动了发达的食品加工业。伏尔加联邦区有很大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该联邦区的另一个优势也非常重要，就是人力资源。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在俄罗斯人力资源发展指数方面，都进

入了前十名的行列。但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如基洛夫州、奔萨州等，名次靠后。

伏尔加联邦区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非常多元，在这个地区居住着近 170 个民族，6000 多个宗教组织；同时，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之间，在此和谐有机地相处，没有冲突。这是伏尔加联邦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伏尔加联邦区与当前全国性的经济危机

按照著名的地区问题专家、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祖巴列维奇的观点，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危机（也包括地区层面）与此前的几次危机相比，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俄罗斯的经济危机，纯粹是内部因素造成的，与当前的全球危机没有任何直接或附带的关系。旧有的增长模式（原料型、信贷型）失灵，有多重原因，既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有关，也与商业成本上升、创新动力下降有关。开始于 2014 年的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其起点不是传统上的周期性经济下降，而是停滞。从 2013 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实际上就停止增长了。该年度，由于投资积极性和工业生产双下降，造成投资规模缩减。此后，形势连年恶化。到 2015 年，工业下滑 3.5%，这算是降幅低的年度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不高——5.5%–5.8%，但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数字，特别是在地区层面。^①失业率没有明显的提高，是因为各个地区的危机情况不同。一些地区危机情况严峻，另一些地区情况好些，这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大。无论是在联邦区的层面，还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劳动力的流动性，都在提高。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居民收入的下降，2015 年全年，降幅为 5%。当然，不同的地区，情况也不相同。经济发达的地区拥有丰厚的财政和预算积累，有能力补偿其所在地区居民的损失。而且，伏尔加联邦区内经济发达、同时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地区，在某些经济领域内的生产下降，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增长来抵消。不过，伏尔加联邦区内的落后地区，就没有这些机会了。伏尔加联邦区内的“领头羊”与“局外者”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

^① Зубаревич Н. Как выживают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гионы в кризис//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18 ноября 2016.

汽车工业地区处于危机之中。从经济领域和地区来看，由于需求骤减，受危机打击最大的是汽车工业地区。机械制造业地区，也是日子难过。在伏尔加联邦区，有一些大型的、具有全国生产规模的汽车生产巨人，如陶里亚蒂的“瓦斯”（BA3）、卡马河畔切尔内的“卡玛斯”（KAMA3）、下诺夫哥罗德州保罗市的“帕斯”（ПА3）、叶拉布加市的“索莱尔-叶拉布加”（Соллерс-Елабуга），以及乌里扬诺夫斯克等地的电机厂等，都情况危急。

传统的工业地区生产保持增长。顶住 2014 年以来经济危机的，是一些保有传统工业的地区。在伏尔加联邦区，这样的地区包括：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乌德穆尔特、彼尔姆和萨拉托夫州。同时，那些虽然没有强大的工业生产基础，但是有其他方面生产优势（原料和农业）的地区，遭受的损失也较小，如莫尔多瓦、马里埃尔、奔萨和奥伦堡。

农业、食品工业发达地区从中获益。伏尔加联邦区的一些拥有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生产潜力的地区，受益于俄罗斯对西方的反制裁措施（禁止进口部分西方国家的农产品），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领域逆势增长，逐步占领了西方食品让出的市场空间。伏尔加联邦区内食品工业发达的联邦主体有：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乌里扬诺夫斯克、彼尔姆、奔萨、马里埃尔和莫尔多瓦。这些联邦主体充分把握住了机会，加速发展农业及与之相关领域的生产。但是，用于农业和食品工业领域现代化更新的资源不足，影响了生产潜能的发挥。

石油开采地区情况各异。伏尔加联邦区的石油开采与加工地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目前面临着来自“新”油气开采地区（秋明州的汉特-曼西自治区、萨哈林州等）的竞争。竞争也凸显了传统油气开采区发展中的瓶颈。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长期投资流向的正是这些新的地区：东西伯利亚、萨哈林和亚马尔-涅涅茨地区。在投资的带动下，这些地区的油气开采和加工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石油加工业。这种改变，不利于伏尔加联邦区内的石油开采地区，致使其从中获得的收入减少。

军工地区得到发展。伏尔加联邦区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和萨马拉州军事工业发达。这两个地区的工业生产稳步发展，2014-2016 年持续增长。乌德穆尔特和萨马拉有着大量的军事订单，财政收入有保障。可以预期，这两个

地区的军工企业仍有大量的发展机遇。

采用 2014 年 1-12 月的数据来衡量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更有代表性，因为 2014 年是本轮经济危机的第一个年头。在工业生产方面，伏尔加联邦区有 13 个联邦主体的工业生产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伏尔加联邦区内部来看，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两个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增速最快；7 个联邦主体处于联邦区的平均水平；5 个低于平均水平。在农业生产方面，马里埃尔共和国同比增长 115.8%，另外 3 个联邦主体的增速高于该联邦区平均水平；5 个联邦主体处于平均水平；5 个低于平均水平。在工资方面，2014 年伏尔加联邦区所有联邦主体的工资都在增长。其中，马里埃尔共和国工资涨幅最高，同比（与 2013 年相比）增长 19.1%。在整个伏尔加联邦区，44.5%的就业工人的工资涨幅超过平均水平，29.2%的就业工人工资涨幅处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占 26.3%。

地区生产总值（Валов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родукт, ВРП，即，总附加值），是衡量一个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经济比重的重要指标。2015 年，伏尔加联邦区地区生产总值为 9.9 万亿卢布，排在中央联邦区（22 万亿卢布）之后，居全国第二位。在伏尔加联邦区内部，各联邦主体之间的差距明显。在“领头羊”（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萨马拉和下诺夫哥罗德）与“局外人”（基洛夫、莫尔多瓦和马里埃尔）之间，在地区生产总值方面，有很大的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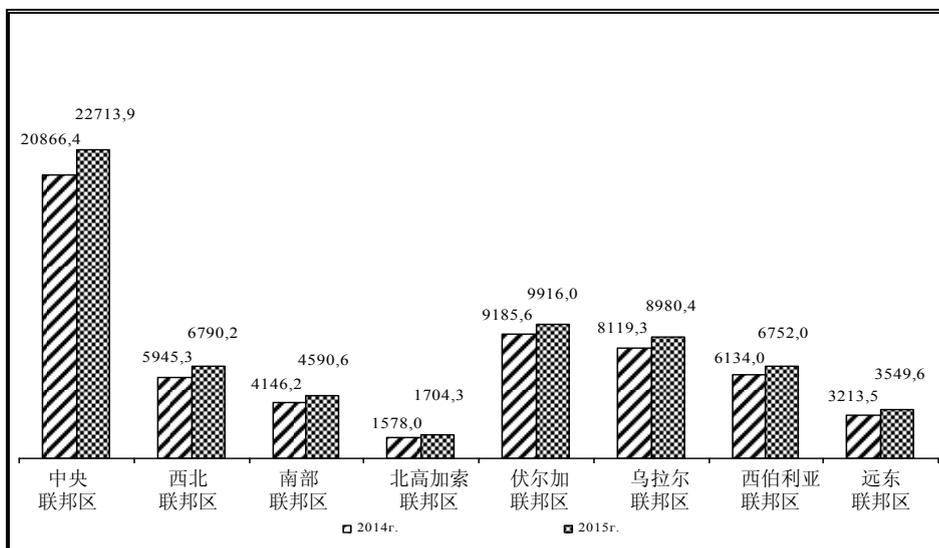


图 1 2014、2015 年俄罗斯各联邦区的地区总产值（总附加值），10 亿卢布

资料来源：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кругов. 2016 г.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表 1 2014、2015 年伏尔加联邦区各联邦主体的地区生产总值，10 亿卢布

| | 2014 年 | 2015 年 |
|-----------------|---------------|---------------|
| 俄罗斯联邦总计 | 79199.7 | 83232.6 |
| 伏尔加联邦区总计 | 9185.6 | 9916.0 |
|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 1260.0 | 1317.4 |
| 马里埃尔共和国 | 143.4 | 165.5 |
| 莫尔多瓦共和国 | 173.9 | 187.4 |
| 鞑靼斯坦共和国 | 1661.4 | 1833.2 |
| 乌德穆尔特共和国 | 450.6 | 497.7 |
| 楚瓦什共和国 | 237.5 | 250.4 |
| 彼尔姆边疆区 | 974.2 | 1048.0 |
| 基洛夫州 | 254.1 | 276.5 |
| 下诺夫哥罗德州 | 1009.5 | 1069.3 |
| 奥伦堡州 | 731.3 | 774.9 |
| 奔萨州 | 295.2 | 336.5 |
| 萨马拉州 | 1149.1 | 1240.3 |
| 萨拉托夫州 | 566.6 | 617.5 |
|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 278.8 | 301.4 |

资料来源：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кругов. 2016 г.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关于伏尔加联邦区的总体经济状况，有一些领域的指标，是很重要的。如，**建筑业**。伏尔加联邦区建筑业行业，在 2017 年第一季度继续走低，是上年同期的 88.5%。从联邦主体的情况来看，建筑业形势比较好的地区是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和萨马拉，马里埃尔、奔萨和基洛夫情况很差。在**道路货物运输**方面，是 2016 年第一季度的 110.2%，小幅上升。运输量上升的联邦主体有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彼尔姆和下诺夫哥罗德；马里埃尔、奔萨和基洛夫的道路运输量，同比大幅下降。在**零售额**方面，2017 年第一季度同比小幅下跌（是上年同期的 99.6%），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萨马拉、彼尔姆和下诺夫哥罗德零售业发展良好，莫尔多瓦、马里埃尔表现较差。**出口**下降情况相当严重，2017 年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是上年同期的 74.6%。俄罗斯传统出口市场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在 2014 年启动的制裁，严重影响到了伏尔加联邦区（包括那些经济实力强的联邦主体）的出口。在**小企业**的数量（伏尔加联邦区共有 3.5 万家，113 万人）方面，伏尔加联邦区仅次于中央联邦区（5.1 万家，152 万人）。下诺夫哥罗德（6500 家）和鞑靼斯坦（6000 家）的小企业数量，远超过该联邦区的其他地区。伏尔加联邦区小企业在 2017 年上半年的销售额与投资量，是上年同期的 122.4%，其中，鞑靼斯坦共和国小企业销售额为 5163 亿卢布，下诺夫哥罗德州是 4582 亿卢布，萨马拉州是 4299 亿卢布，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3431 亿卢布，其余各地区小企业销售额比较有限：马里埃尔共和国 576 亿卢布，莫尔多瓦共和国 587 亿卢布，楚瓦什共和国 850 亿卢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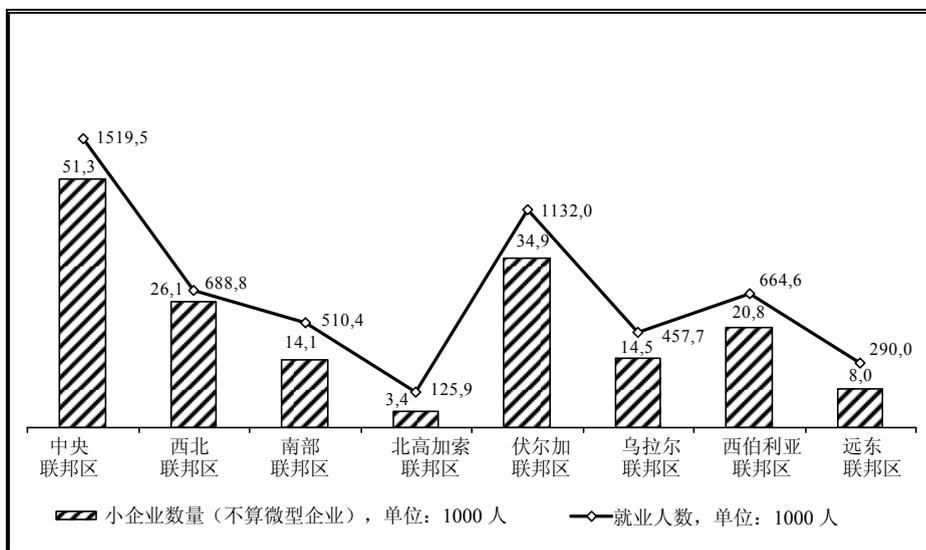


图 2 2016 年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小企业（不算微型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кругов. 2016 г.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表 2 2016 年伏尔加联邦区各联邦主体的小企业销售额，10 亿卢布

| | 总销售额 | 其中 | | | | |
|------------|----------------|---------------|---------------|----------------|--------------|---------------|
| | | 制造业 | 建筑 | 批发、零售、修理 | 运输、通讯 | 房地产、租赁、服务 |
| 俄罗斯联邦总计 | 18738.2 | 2194.9 | 2007.4 | 10690.6 | 814.3 | 1658.2 |
| 伏尔加联邦区总计 | 3077.7 | 465.3 | 389.6 | 1652.0 | 97.3 | 196.9 |
|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 343.1 | 41.2 | 61.6 | 185.1 | 4.9 | 16.6 |
| 马里埃尔共和国 | 57.6 | 12.1 | 3.9 | 32.2 | 0.4 | 3.7 |
| 莫尔多瓦共和国 | 58.7 | 8.4 | 10.9 | 24.9 | 1.7 | 5.5 |
| 鞑靼斯坦共和国 | 516.3 | 93.6 | 81.6 | 225.8 | 29.6 | 41.2 |
| 乌德穆尔特共和国 | 161.7 | 28.0 | 12.8 | 79.4 | 4.2 | 13.4 |
| 楚瓦什共和国 | 85.0 | 18.1 | 10.5 | 35.1 | 2.3 | 9.7 |
| 彼尔姆边疆区 | 294.4 | 37.9 | 31.5 | 174.9 | 10.3 | 17.4 |
| 基洛夫州 | 123.3 | 23.4 | 7.5 | 69.9 | 2.5 | 7.8 |
| 下诺夫哥罗德州 | 458.2 | 67.5 | 38.2 | 283.0 | 11.0 | 31.4 |
| 奥伦堡州 | 129.6 | 13.3 | 13.0 | 75.3 | 7.0 | 6.6 |
| 奔萨州 | 99.9 | 25.3 | 13.5 | 45.3 | 3.2 | 5.4 |
| 萨马拉州 | 429.9 | 47.5 | 68.4 | 254.2 | 12.9 | 20.1 |
| 萨拉托夫州 | 217.9 | 29.2 | 24.5 | 121.1 | 3.7 | 9.4 |
|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 102.0 | 19.9 | 11.8 | 45.8 | 3.6 | 8.7 |

资料来源：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кругов. 2016 г.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伏尔加联邦区内各联邦主体之间，在资源分配、发展潜能等方面差距很大。2014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缩小差距。作为“局外人”的落后地区，与领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发固化。这反映了联邦中央在消除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政策上的缺陷，也表明伏尔加联邦区协调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政策缺失。

（三）区域发展战略文件及其执行情况

对于一个地区的投资前景而言，除了数据指标之外，相关文件中的发展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伏尔加地区而言，有一份重要的文件：“2020 年前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该文件于 2011 年 2 月 7 日颁布执行。^①

该战略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伏尔加联邦区在 2020 年前的发展制定了长期目标、主要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工具。

——全面提升竞争力，既涵盖传统的商品、资本、工艺和劳动力市场，也包括管理体系、创新激励机制和人力资本的发展；

——面对新一轮的技术变革，需要增强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使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原料出口型的发展模式，其潜能正在耗竭；

需要解决的社会和制度问题，主要有：

——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大，大多数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包括承袭性和永久性的贫困）；

——经营活动风险高（制度因素、非正式的行政实践和一些地区的立法不完善等）；

该战略文件的一个重要预期的成果，是提高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农村地区，需要解决的任务很多，包括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建设，发展交通、能源、信息和通信建设，这些是缩小城乡差距必须要做的工作。

^①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7 февраля 2011 г. N 165-р г. Москва. 22 февраля 2011г. <https://rg.ru/2011/02/22/privoljye-site-dok.html>

在实体经济方面，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主要的发展方向包括：

- 对主要的工业领域进行现代化更新；
- 形成有竞争力的地区产业集群；
- 提高农工综合体的生产效率；
- 培育发达的中小企业；

整体而言，该战略文件泛泛而谈的内容多，较少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伏尔加联邦区各联邦主体的多样性（有一些甚至是处于危机中）情况。至于如何实现规划中的任务，各个层面都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执行机制。该战略也没有充分关注到一些已有的、地区间的合作机制，如“大伏尔加”（«Большая Волга»），这个机制现在还在，但是活动不积极）。另外，在改善伏尔加联邦区投资环境方面，包括发展公私伙伴关系等，也没有具体的举措。因此，这个战略文件需要补充、修改和完善。

二、伏尔加联邦区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

伏尔加联邦区与联邦中央之间的关系，对联邦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有着很多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联邦区利益集团对中央的影响，也包括联邦区内的联邦主体独立实现自身战略的能力，动员自身资源和吸引外部资源的能力等。需要指出的是，自 2000 年成立以来，伏尔加联邦区与联邦中央之间，一直有着特殊的关系。传统上，伏尔加联邦区与西北联邦区（该联邦区也被称为总统联邦区）一道，都被给予特殊的对待。原因在于，伏尔加联邦区内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并且问题较多的联邦主体，如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这两个民族共和国经济实力强大，执政精英团结且雄心勃勃，主体民族作用特殊（与突厥、伊斯兰因素相关联）。这两个联邦主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不仅要求特殊的身份，实际上追求的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主权国家地位。当 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发表之后，俄联邦内部的自治地区纷纷开启了主权声索的进程。几乎所有的自治共和国都要求主权国家的身份。其中的领头羊是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伏尔加地区的其他共和国跟随在后（楚瓦什、乌德穆尔特、莫尔多瓦和

马里埃尔），虽态度较为缓和，但也有野心。1992年2月21日，鞑靼斯坦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通过该共和国的新宪法，拒绝与俄联邦签署联邦条约，试图与俄联邦形成事实上的联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1992年3月31日的联邦条约，但是附有特殊的条款，以保障其对共和国护法机关，包括对能源资源，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掌控。由此，伏尔加联邦区的这两个共和国，在2000年之前，实际上是处在特殊的法律安排之下，破坏了俄罗斯宪法中关于联邦主体法律地位的条文；他们享受着不该有的经济上的优惠，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上缴税款；长期担任这两个共和国总统的沙米耶夫（Минтемер Шаймиев）和拉西莫夫（Мургаза Рахимов），同时也长期占据着议会上院领导人的位置。从2000年起，在俄联邦总统全权代表（谢尔盖·基里延科及其后继者们）的努力下，这两个共和国的准主权国家的地位逐渐被剥夺，重新回到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宪法空间之内；其精英人物也失去了此前在全俄政治中的分量和影响力。然而，直到今天，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仍然位居最有影响力的联邦主体的行列之中（仅次于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在全联邦政治层面上，仍然有着强大的、有影响力的游说能力。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市被确认为俄罗斯第三首都，该共和国于2009年与俄联邦签署了专门的权限分割条约，强化了该共和国在俄联邦中的特殊地位。类似的条约，除了鞑靼斯坦共和国之外，莫斯科只与车臣共和国签署过。2017年，联邦中央拒绝鞑靼斯坦共和国延长此条约。此外，在伏尔加联邦区的其他联邦主体内（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萨马拉、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奔萨），还居住着大量的鞑靼人，鞑靼人的商业网络涵盖了伏尔加联邦区的大部分地区，这些都是喀山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的优势。因此，无论是在伏尔加联邦区的层面，还是在联邦中央的层面，都特别关注这两个带有突厥-穆斯林“身份标识”的共和国。

突厥-东正教的楚瓦什共和国、乌戈尔-芬兰（угро-финские）的乌德穆尔特、莫尔多瓦和马里埃尔共和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游说能力，都远远不及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实力较弱的几个共和国，在捍卫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努力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避免把民族问题政治化。

下诺夫哥罗德是伏尔加联邦区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联邦区的行政首府所在地。下诺夫哥罗德在俄罗斯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Г.А. Явлинским）发明了一个术语——“下诺夫哥罗德序曲”（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й пролог），代表下诺夫哥罗德是改革的先行者。在联邦中央层面，下诺夫哥罗德的游说能力很强。1997年，担任俄联邦副总理的涅姆佐夫（Б. Немцов）、1998年担任政府总理的基里延科（С. Кириенко），均来自下诺夫哥罗德。此外，该州经济实力强大，中央政府对此也相当在意和关注。

萨马拉、萨拉托夫等州，也有相当的经济发展潜力，在联邦中央层面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是康斯坦丁·季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Титов）和德米特里·阿亚茨科夫（Дмитрий Аяцков）在这两个州主政期间，在联邦层面上的影响和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两个州在联邦权力机关的层面上，没有强大的游说能力（原萨拉托夫州副主席、原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现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言人沃罗金（Вячеслав Володин）除外）。另外还有一个已经被人忘却的原俄联邦政府副总理、萨马拉人奥列格·瑟苏耶夫（Олег Сысуйев）

彼尔姆边疆区也是如此，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处于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交汇处的地理位置，但在联邦层面的影响力甚微。与衰退中的科米彼尔米亚自治区的合并（2005年12月），对其自身地位而言，没有起到加分的效果。在联邦层面上，有一些来自彼尔姆的人物，如尤里·特鲁特涅夫（Юрий Трутнев）。此人在2000年代初担任过彼尔姆市市长和彼尔姆州州长，然后升到联邦层面任职，担任过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部部长（2004-2012年）和总统助理（2012-2013年）。目前，特鲁特涅夫是俄罗斯副总理兼俄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

奥伦堡州有一些特别之处：地处边疆、拥有天然气资源，以及作为新丝绸之路项目连接点（公路）的特殊地位。但其整体经济实力不是很突出。

基洛夫州是伏尔加联邦区内最落后的地区。该州领导人长期由“左派”力量代表担任。弗拉基米尔·谢尔盖延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从1996年到2004年担任州长。此后，在右翼力量联盟成员尼基塔·别雷赫（Никита Бельх）担任州长期间，该州变成一个“改革的阵地”。俄罗斯自由派（反

对派)的一些知名人物,也来自该州,如玛利亚·盖达尔(Мария Гайдар)和阿列克谢·纳瓦利内(Алексей Навальный)。但是基洛夫州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别雷赫被免去州长的职务,并非偶然。目前,他正处于腐败和滥用资金的指控和调查之下。无论是左派当政还是自由派掌权期间,基洛夫州在俄联邦层面上的影响力都有限。整体而言,目前该州处于衰退的境况之中,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很小。

担任伏尔加联邦区总统代表的人物,都是有着高效的管理才能、丰富的工作经验的实力派人物,且在联邦层面的仕途前景广阔。如,第一任全权代表是基里延科(Владименович Кириенко, 2000–2005 年期间任此职),此人是右翼力量联盟的领袖之一,曾短暂地担任过政府总理(1998 年 3–8 月)。2005 年以后,基里延科负责管理“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Росатом),从 2016 年起,担任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继基里延科之后担任伏尔加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的,是科诺瓦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овалов, 2005–2008 年期间任职;离任全权代表的职位后,科诺瓦洛夫担任俄罗斯司法部长,2008 年)。科诺瓦洛夫的继任者是拉波塔(Григорий Рапота),2008 年至 2011 年任伏尔加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在担任总统全权代表之前,拉波塔在俄罗斯就是一个著名的国务、政治活动家、将军,担任过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1998 年 4–11 月)、欧亚经济共同体秘书(2001–2007 年)、以及俄联邦总统驻南部联邦区全权代表(2007 年 10 月–2008 年 5 月)。现任全权代表是巴比奇(Михаил Бабич, 2011 年 12 月至今)。此人出身行伍,也有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掌舵过俄罗斯军工集团“安泰”(Антей),和车臣共和国(2002 年 11 月–2003 年 2 月)。以上四位总统驻伏尔加联邦区全权代表的地位之高、仕途经验之丰富,从一个侧面表明,俄罗斯中央政府对伏尔加联邦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持续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保证了伏尔加联邦区对中央政府的劝说能力。

制约总统全权代表行动的主要问题是,俄罗斯整个国家没有一个长期的、明确的发展战略和任务,由此带来地方层面相关法律规范和框架的缺失,令全权代表的工作实际上无从着手。^①他们的工作往往只能靠自觉,发生情

① Афанасьев М. Наместники// Известия. 22 февраля 2001.

况，自行解决。^①他们行动的策略，是运用自身“总督的权力”、“政治管理者的身份”和“外交家的技巧”，来动员各部门、各地区。以上提到的四位伏尔加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按照本文作者的观点，充分发挥了“政治管理”和“外交技巧”的策略，他们的工作有助于把伏尔加联邦区纳入到俄联邦统一的宪法和政治空间之内。但在联邦层面上为伏尔加联邦区的经济利益游说方面，他们的贡献较少。

三、伏尔加联邦区的投资吸引力和投资战略 ——以德资企业为例

伏尔加联邦区经济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任务，是吸引投资。因此，当前无论是在联邦区的层面，还是在区内联邦主体的层面，都特别关注创造良好的条件，来吸引投资。

伏尔加联邦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就积极开展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工作。当然，每个联邦主体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和领导人在吸引外资方面积极性的不同，取得的成效也不尽相同。自苏联“改革后期阶段”（1989—1991）以来，德国就是俄联邦的一个关键的经济伙伴。德国商业界对俄、对俄地区积极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叶利钦总统与科尔总理，以及普京总统与施罗德总理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俄罗斯，有一个强大的、支持与德国发展经济关系的游说力量，在德国也有一个同样强大的、支持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关系的集团。“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Восточный комитет немец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主席科德斯（Экхард Кордес，2014 年辞去主席职务），反对欧盟制裁俄罗斯。在本轮俄罗斯与西方危机发生之前的 2014 年，德国对俄投资存量占第五位，直接投资占第三位。

在俄罗斯，支持与德国发展经济关系的游说力量成型于 2000 年之后，代表人物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和俄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格尔曼·格列夫（Герман Греф）。这些人在联邦层面主张为德国经济利益以及德国对俄投资项目，创造良好的条件。

^① Федоров В, Сахарчук В. Семеро ждут одного// Век. 2001. №.18. С.1.

德国对俄投资，逐步进入多元化的阶段。从 20-21 世纪之交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北帕尔米拉（圣彼得堡）经济发展伊始至今，德国投资者在俄罗斯的投资区位，逐渐发生变化。从 1999-2000 年，德国三分之二的资本投向莫斯科，2001 年降为五分之二，直至德国投资的二分之一流向了外省（主要是中央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由于伏尔加联邦区和乌拉尔联邦区的经济潜力大，德国投资者对这两个地区也很有兴趣。当然，即便是在这种局面下，莫斯科仍然是德国投资的优先方向。俄罗斯首都仍然拥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同时，俄罗斯广袤的地区市场，也日益引起德国商业界和政府的关注，他们希望为自己的产品开拓俄罗斯地方的市场。融入俄罗斯外省的的经济之中，需要有相应的准备工作：许多德国大企业开始在俄罗斯地区层面设立办事处。德国北威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商人积极性最高。他们在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地区（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萨马拉和罗斯托夫州），积极开展自己的业务。

在新的形势下，俄罗斯各地区的风气也在改变。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各地区开始积极争取德国投资者。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德国资本和投资非常重要，能够改变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生活质量。1998 年以后，俄罗斯的经济的发展，居民购买力上升，这进一步刺激了德国公司在地区层面建立新的生产网点。

德国投资者对于区位的选择，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包括机场、河港、公路与铁路的状况，以及其他的交通设施）。对于在俄的德国投资者而言，障碍性的因素，还是各种复杂的官僚程序，以及一些俄罗斯地区所设置的地方保护主义栅栏。同时，从地方的层面看，争取外国投资者注意的最重要的因素，仍是州长的个人因素，他（她）的主动性，以及为外国商人提供必要政治担保的意愿。

德国商界在俄罗斯的积极行动，一个显见的结果是，他们几乎在俄罗斯所有经济发达、有发展前景的地区，都站住了脚。在 2000 年之前，按照投资吸引力排名，前三强是：鞑靼斯坦、卡卢加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其中两个属于伏尔加联邦区。德国大型企业在俄罗斯投资的领域，与他们在发达国家、中东国家和中国的选择有实质性的差别。在这些地区，德国直接投资通常是

集中于出口导向型的领域，也是德国工业经济的核心领域，如汽车、机械、电气、化学和制药。而在俄罗斯，德国人更喜欢把资金投入到了盈利率最高、对市场行情反应最为敏锐、迎合大众需求的领域，如，零售贸易、能源、采矿、车辆维修、冶金、房地产、食品生产（包括烟酒）等。由此可见，德国商人的选择，是充分考虑和认识到了俄罗斯内部市场的需求和特点。但是，德国投资与俄罗斯地区层面的长期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的长期建设规划和社会领域的发展之间，通常而言，没有什么关联。

伏尔加联邦区，是德国商业界长期、稳定关注和投入的一个地区。一方面，在伏尔加地区德国人有着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记忆（1921 年成立过伏尔加德国人自治区，1941 年被废除）；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的因素，德国人来到伏尔加地区投资，主要是看中这里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德国资本在伏尔加联邦区，主要流向的地区是：下诺夫哥罗德市（这是伏尔加联邦区的行政首府）、萨拉托夫市（原来的伏尔加德国人自治区首府）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市（这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从过去的保护主义策略，转变为经济开放政策）。

下诺夫哥罗德市，这个有 126.4 万人口现代化的大都市，同时也是伏尔加联邦区的行政权力、文化教育和经济商贸中心，是伏尔加-维亚特卡河流域地区的经济中心。现任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有着多年经济管理经验的瓦列里·尚采夫（Валерий Шанцев），大力支持和保护德国企业在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的投资。他在公开演讲中反复强调，德国过去是、现在仍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战略伙伴。他认为，正是德国的企业开启了下诺夫哥罗德州招商引资的大门，其他外国企业追随德国企业，在该州设立新的生产线。实际的情况确实也是如此。

目前，在下诺夫哥罗德州，德国企业建立了 80 多家合资企业，近 20 家 100% 独资企业，如可耐福（Knauf，德国建材企业）、威娜（Wella，德国美发产品企业）、佳氏福（Trosifol，德国建材、光伏企业）、百利盖（Bericap，德国容器企业）、克诺尔（Knorr-Bremse，德国制动系统制造商）和麦德龙（Metro，德国零售业）等。瓦列里·尚采夫州长强调，在吸引新的德国投资者方面，这些企业是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的伙伴。这些德国企业愿意把他

们的工作经验，分享给新来的，或者进行前期调研的其他企业，并与州政府一起参与相关的展示和展览活动。

现在，在下诺夫哥罗德大地上开展业务的德国公司不断增加。由于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针对德国投资者灵活、到位、定点的工作，出现了很多良好的先例，如，一些德国企业原本是想投资一个项目，完成该项目后，决定扩大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生产规模，于是又新增投资项目。如，德国科德宝集团（Freudenberg）2009年在该州投资5亿卢布，生产无纺布（不需要纺纱而成的织物）产品。2010年，科德宝集团决定建立第二条生产线，同时决定今后将在此地生产汽车零部件。

同样重要的是，来到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不仅有德国的大企业，还有中小企业，其投资的项目额度通常在1亿卢布以内。如，福莱格霍梅尔（Fraig und Hommel GmbH）集团，在2010年前后于下诺夫哥罗德州开设汽车紧固件生产线；朗盛（Lanxess）公司计划开办制造用于生产橡胶的添加剂的工厂。这些公司开展的项目能够得以实施，是因为下诺夫哥罗德州在捷尔任斯克（Дзержинск）市设立了工业园区，实施优惠政策。朗盛公司在这个园区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到了一块土地，州政府和市政府负责解决工程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朗盛公司在捷尔任斯克工业园区内的积极建设，俄罗斯联邦层面的一个生产聚氯乙烯的项目，给予了这家企业。这个投放在下诺夫哥罗德的项目，从2013年起，年产33万吨聚氯乙烯，生产规模还在扩大。

总之，下诺夫哥罗德政府对德国投资定向、全方位的扶持，令德国投资多年来成为该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助推力。^①但是该州未能把德国投资纳入到一个更为长远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中，即参与地区经济结构性转型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更新。

此外，德企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投资，集中于以下的几个领域：汽车（大众、戴姆勒）、巴斯夫（BASF）的聚氯乙烯和苛性钠工厂、可耐福材料公司的建材工厂、欧倍德集团（OBI Group）的超级市场、生产无线电测量设备的罗德与施瓦茨（ROHDE&SCHWARZ）公司、生产建筑设备和航空部件

^① Германски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Нижегородскую область будут расти-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алата. 24 февраля 2012. <http://tass.ru/arhiv/567917>

的利勃海尔（Liebherr）、生产汽车零部件的莱尼（LEONI）公司工厂、生产多用途聚酯无纺布的科德宝集团公司的工厂、生产壁纸的艾仕（A.S. Création Tapeten），以及道路施工用的含纤维素的添加剂生产企业瑞登梅尔集团（Rettenmeier Group）。

上述的投资大多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项目，但不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投资。它们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无关，也与诺夫哥罗德长期的优先发展领域无关。

鞑靼斯坦共和国，也是一个经济上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地区，长期以来是德国资本进入俄罗斯的一个重要落脚点。早在 2003 年，时任德国驻俄大使普勒茨（Hans-Friedrich von Ploetz）就正式访问喀山，得到了鞑靼斯坦共和国首任总统沙米耶夫的接待。双方当时强调，德国与鞑靼斯坦的合作，“还没有达到该有的稳定和规模”。在这次会见中，德国投资得到了鞑靼斯坦共和国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批准”。此次会见后，十余年过去了，德国已经成为该共和国最主要的对外经济伙伴之一。目前，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共有 80 余家德资企业。2015 年，鞑靼斯坦与德国的贸易额超过 10 亿欧元，大部分贸易是进口德国的机械和设备，因为鞑靼斯坦政府从 1992 年起，就致力于保持和发展共和国的工业，而德国的机械制造业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德国和德国投资者合作的框架下，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领导人与德国传统的工业地区，如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建立了稳定的友好关系。喀山最感兴趣的，无论过去还是当前，就是汽车制造领域的零部件及其他工艺，因为这些都是鞑靼斯坦共和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所需。^①

当前，许多德国大企业在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发展很成功，如，西门子（通讯、动力、设备租赁）、巴斯夫（化工）、林德（Linde，化学）、克诺尔（Knorr-Bremse，卡玛斯汽车配件）、德国齿轮制造公司（Zahnradfabrik，生产卡玛斯汽车变速器），萨利亚生物技术公司（SARIA Bio-Industries，加工动物源性原料）等。双方互利合作的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俄罗斯卡玛斯（КАМАЗ）和德国戴勒姆公司之间的合作。双方的战略合作始于 2008 年，

^① Германия признала Татарстан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ых регионов РФ для инвестиций. 19 октября 2016. <http://old.sntat.ru/ekonomika/48405-germaniya-priznala-tatarstan-odnim-iz-samykh-privlekatelnykh-regionov-rf-dlya-investitsij>

迄今已经成功推进了若干个不同的项目。戴勒姆公司给予卡玛斯公司在现代化更新方面以技术支持，为俄罗斯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对于德国投资而言，鞑靼斯坦共和国最具吸引力的领域，始终都是工业。2013年，萨利亚生物技术公司在鞑靼斯坦特别经济区“阿拉布加”(Алабуга)，开设了一家生产动物饲料的工厂，总投资额3500万欧元；2014年，德国RMA管道设备公司投资17亿卢布，生产石油天然气工业所需的球阀。虽然有西方制裁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德国商人却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市场，且比其他国家的企业更早地实现俄罗斯本土化生产，从而绕开制裁。目前，“阿拉布加”特别经济区已经成为鞑靼斯坦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在该经济区内有48家注册企业，私人投资总额达1537亿卢布。

鞑靼斯坦与德国投资者之间的合作，有着长远的前景。鞑靼斯坦共和国现任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Рустам Минниханов)，对发展和深化与德国投资者的关系，有着坚定的意愿。明尼哈诺夫始终强调，鞑靼斯坦共和国在一系列领域内，对德国商业界有着投资吸引力。如电力、石化、汽车与飞机制造、机械制造、IT和其他高技术、农业、工程、医药，以及建筑等领域。鞑靼斯坦领导人的考虑是，在目前的不利情况下(西方制裁，卢布贬值，俄罗斯消费者购买德国机械制造产品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开始在俄罗斯实现本土化生产，鞑靼斯坦可以成为德国企业本土化的落脚点。

双方还在一些有前景的新生产领域内开展合作。例如，鞑靼斯坦共和国投资发展局(Агентство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Татарстана, АИР РТ)正在与德国伙伴就在鞑靼斯坦开设工厂生产马来酸酐(用于生产薄膜，合成纤维，洗涤剂以及药物)进行谈判，总投资额为1.2亿欧元。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俄罗斯还没有类似的工厂，对此产品则有着巨大的需求。

双方在农业和食品工业领域也有着共同的兴趣。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代表指出，双方也在信息技术领域内讨论过一些项目，只是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①

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对德国投资者一贯的、有针对性的工作和政策，令

^① АИР РТ планирует привлечь 120 млн евро немецки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н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завода в Татарстане. 07.06.2016. <https://realnoevremya.ru/news/33488>

该地区对德资吸引力大增。2015 年，一份对在俄德资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俄罗斯各地区中，鞑靼斯坦共和国的投资吸引力位列前三。

而萨拉托夫州政府与德国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则有所不同。该州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与邻近地区相比，有一些重要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其地理位置优越：邻近莫斯科地区，与哈萨克斯坦交界，是进出中国、中亚和欧亚的通道。此外，两大国际交通走廊在萨拉托夫州交汇：“北-南”和“西-东”^①；未来，还可能会有“上海-汉堡”运输通道，这个运输通道将是一个多样式的联运枢纽，包括铁路、公路、内河，以及民用航空等。由此，萨拉托夫州有望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的物流枢纽，这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一些长期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萨拉托夫州成立了一个直属州长的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在各个投资环节上协助投资者：从开始阶段用于投资的土地使用权的获得，一直到项目的投产。这与鞑靼斯坦共和国（在其再工业化的战略框架内）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系统支持投资者的做法不同。

萨拉托夫州在与德国投资者的合作关系上开创了一个先例，即成功地让德国人投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德国机车基础设施制造商福罗斯（Vossloh AG）将与俄铁集团的子公司“交通运输用混凝土公司”（Бетэлтранс）在恩格斯市^②开展联合生产项目。“交通运输用混凝土公司”有 9 个工厂，生产钢筋混凝土枕木，其中包括在恩格斯市的工厂，目前，该工厂的年生产能力为 125 万件枕木。

萨拉托夫州政府领导也吸引德国投资者进入农业经济领域。萨拉托夫州农业领域优先的投资方向有：现代节水技术、植保技术、现代化牛奶生产工艺、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蔬菜储存和加工的物流中心、农产品加工（奶制品，肉制品）、罐头产品生产、糖类生产、肉牛养殖、养鸡、经济作物种

① 萨拉托夫是伏尔加联邦区的交通枢纽，是主要的铁路、公路和航空的交汇点。在萨拉托夫，有俄联邦高速公路 P228（塞兹兰-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北-南”高速），A144、E38、AH61（萨拉托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东-西”高速）、R158（萨拉托夫-奔萨-萨兰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南-北”高速），以及 P226（萨马拉-伏尔加格勒，“北-南”高速）。

② 恩格斯市（Энгельс），萨拉托夫州中部的一个城市。

植、粮食作物生产、大棚蔬菜、园艺，以及鱼类生产和加工等。

德国企业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投资经验，也很值得特别关注。2014年以来的西方制裁，以及其他一系列严峻形势，反倒促使乌里扬诺夫斯克实质性地提升了营商环境。德国是该州一个主要的经济伙伴。2017年上半年，德国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外贸总额中占第三位，出口的第七位，进口的第三位。麦德龙、汉高（Henkel）、费森尤斯（Fresenius Medical Care）、德国塑料包装企业（Jokey Plastik）、德玛吉森精机（DMG Mori）等德国企业，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均有投资项目。

德国企业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规模最大、最为出名的投资项目，当属“乌里扬诺夫斯克港口经济特区”（ПОЭЗ «УЛЬЯНОВСК»）和外伏尔加工业区（Заволжье），大批德国企业在这两个地区投资建厂。目前，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吸引外资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来自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企业的大型生产项目，不仅落地该州，而且进展顺利。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特点是，州政府有细致的规划，为投资者创造舒适的经商环境。仅举两个方面的例证，一个税收优惠政策，另一个是对投资企业提供全程的协助。

目前正在协商中的一个新的德国投资项目，是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建设高精度金属加工工程中心。另外，德国矿产集团（Quarzwerke）在投入 1200 万欧元建设生产线之后，继续扩大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投资，又新建了一条生产线，新增 80 多个工作岗位，产量则提高一倍，其生产的矿砂具有国际竞争力。德国矿产集团（Quarzwerke）研发实验室位于乌里扬诺夫斯克市，这里也是其全球研发中心。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德国的科研中心和学术机构接受培训。

德国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投资，有较长的历史。2006 年 11 月 21 日，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在德国经济和技术部推介自身的经济和投资潜力。同年，麦德龙集团就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开设了商贸中心；2009 年，博世（BOSCH）集团在该市开设职业培训中心；2010 年，汉高建筑技术公司（Henkel Bautechnik）又在该市开设干混建筑工厂。2015 年 9 月 29 日，德玛吉森精机（DMG Mori）机床工厂举办开业典礼，德国驻俄大使鲁迪格·冯·弗里奇（Rüdiger von Fritsch）出席仪式。自 2006 年起，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官方

和商界代表团连年参加德国“国际绿色周”食品展销会，以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自 2010 年起，又参加柏林国际航空展。这些举措，增进了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政府与德国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为推进商业项目提供了平台。乌里扬诺夫斯克对德合作模式的特点，是通过积极的公共外交，为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保障，并逐步形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公共游说团体，促进彼此间的合作。^①

2014 年春夏之际，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化。相应地，外国投资者（包括德国人）的心境与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设在莫斯科的德国贸易与投资（German Trade & Invest）机构负责人汉涅斯（Б.Хонес）指出，许多德国企业几年前还在扩大对俄投资，或者计划在俄建设生产网点，但这些势头停滞下来了，或者干脆取消了投资计划。显然，德国企业家的迟疑，与西方因乌克兰事件制裁俄罗斯，有着相当的关联。然而，原因不仅在这里，还与整个国际经济态势有关。^②

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与卢布汇率的波动，导致俄罗斯市场需求下降，其中也包括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卢布汇率的下跌，更让外国公司遭受了巨大的金融损失，特别是那些以卢布计算利润的公司，包括一些著名的德国品牌企业，如大众、欧宝、戴姆勒和曼恩（MAN）。

德国公司的季度报表显示，早在西方制裁之前，由于卢布贬值，德国企业在俄罗斯市场遭受损失，生产下降。根据俄联邦统计部门的数据，德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是机床、设备、化工产品和汽车）从 2013 年 5 月起就开始缩减了。也几乎在同时，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德国对俄贸易缩减与俄国内经济发展停滞，需要放在一起进行考量。德俄两国双边贸易额在 2012 年达到 805 亿欧元的顶峰后，2013 年降到了 765 亿欧元，德国对俄出口额减少了 20 亿欧元。

从诸多的事例中，都能看出德国投资者在俄罗斯，以及在伏尔加地区所面临的问题。2013 年底，大众和欧宝开始抱怨在俄销售量降低。这两家公

① Ульяновск - Германия: 10 л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льян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29 августа 2016.

② Борис Зарицкий. Германски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https://interaffairs.ru/jauthor/material/1139>

司有一个共同的担忧：俄罗斯市场对卡车的需求量下降，这是经济危机的关键指标。

2014年1月，德国对俄出口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2%；2月，同比下降幅度为17.7%。显然，这些数据与克里米亚事件及欧盟制裁没有任何关系。欧盟对俄第一轮制裁，从2014年3月中旬才开始。上述数据更主要是证明了俄罗斯经济本身的问题。

对史达德（Stada）药业公司而言，俄罗斯市场的重要性，仅次于其母国德国。该公司告知自己的股东，由于2014年卢布贬值，致使收入降低了13%。卢布的走低，使阿迪达斯（Adidas）2014年第一季度利润下降了6%，阿迪达斯的领导层对此表示担忧。汉高公司，这家早在1990年就在恩格斯市投资建厂的化工巨头，在2014年1-2月，也指出了在俄罗斯营商业绩的恶化。

根据“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2014年6月针对在俄罗斯的德企高层经理人的问卷调查，60%的受访者承认，乌克兰危机造成的俄罗斯与西方政治关系紧张，给他们的经营带来了消极影响。他们担心，经济制裁的收紧会导致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恶化（45%的受访者）、新项目融资困难（25%）、俄罗斯保护主义政策抬头（20%），以及对外国投资者不信任感增加（10%）。

整体而言，德国商界对把经济制裁作为对俄施压的工具，相当质疑。44%的受访者认为，政治不应该干预经济，而且经济制裁也不是解决政治分歧的合适方法。47%的受访者指出，制裁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如果俄罗斯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比如武装入侵乌克兰的领土。只有9%的受访者认同制裁是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行为的合适回应。

综上所述，对伏尔加联邦区的德资企业的现状及未来前景，可以做出下面一些总结：

——德国在伏尔加联邦区的投资困境，既与政治压力有关（德国精英在施罗德执政期间以及默克尔前两个任期内的对俄共识瓦解），也与整体的经济危机有关；

——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经济稳定发展，消费市场行情好，长期以来，德国资本大多流向这些领域。但是从2014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导致情

况发生变化；

——德国的投资，与伏尔加联邦区及所属各联邦主体的长期、重点发展战略和规划，没有关联；

——德国人不投资如下领域：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能够把当地社会经济提到更高水平的关键工业领域、有助于为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的领域；

——德国投资也不是为了解决地区经济结构优化的任务，能保障某个“点”上的增长，但不是整体经济的突破式变迁；

——在伏尔加联邦区工作的德国投资者，避开了 2014 年以来的经济制裁，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弥补由于俄罗斯经济危机造成的消费需求下降的损失（对德国产品的需求，也同样下降）。生产多元化是他们的一个战略，但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伏尔加联邦区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这里特指德国投资），有一些重要的做法：

——展销策略（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做法），即，广泛的宣传，加上社会民意对投资者的支持，特别是地区政府对投资者工作的支持；

——整个垂直权力系统对投资者的支持（鞑靼斯坦模式），这有其优势，但也需付出成本；

——对投资方和投资项目，进行定点支持。

显然，伏尔加联邦区地方行政部门恢复与德国投资者之间关系的努力，未必能奏效，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都有阻力。同时，在短期内，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也很难取代德国投资者。撇开政治上的困难，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伏尔加联邦区还是有留住和吸引他们的大型投资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建材和运输材料生产，以及农产品加工等。

伏尔加联邦区各联邦主体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形势，大体相同，总体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联邦主体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能力上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继续拉大。实力雄厚的联邦主体在危机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调整空间，有能力相对成功地应对危机。这些联邦主体在未来几年内的发展态势，仍然

是介于低增长和积极增长之间，在一些领域低迷能被其他领域的增长抵消。但是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联邦主体，其不完善的经济结构，在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背景下，将继续下去，难以改善。

伏尔加联邦区还是有一些有潜力的大型投资项目，但是在联邦区的层面缺少使项目落地的协调政策和机制。伏尔加联邦区的投资环境，在各个联邦主体之间，差别很大。对于吸引投资者而言，决定性的因素，是某个地区或大城市领导人的战略选择。

(肖辉忠 译)

【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current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and immediate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 of the Volga Federal Distri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overall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in Russia and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Volga Federal district and the experience of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participating regions of this district, as well as the investment prospects of its territories.

【Key Words】Sino-Russian “The Yangtze River-the Volga River” Regional Cooperation, Russian Districts, Russian Economy, Volga Federal District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статье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ся о текуще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ближайших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ов Приволж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бще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с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тор анализирует характер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Приволж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и опыт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зарубеж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ходящими в него регионами, а также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роект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олга-Янцзы”,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Приволж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круг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国经济史**西方学者有关俄国 1861 年农民改革原因的
阐释：冷战以来的理论转向与研究焦点**

张广翔 周嘉滢*

【内容提要】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进了西方学界俄国史学科的日益繁荣。20世纪50至90年代，在研究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时，西方学者采用现代化、原始工业化、官僚制等理论和社会史、个案分析等方法，阐释了俄国国家机构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农奴制下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修正了苏联官方史学的阐释模式。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1917年范式”的衰落和“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的兴起，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理论面临挑战，西方学界有关俄国改革问题的研究整体降温。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的兴衰，本质上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关键词】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俄国农奴制 俄国农民问题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5-0033
(25)

在国别史研究过程中，往往存在“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之争。^①国内学者在语言能力、文化背景和资料占有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国外学者则擅长质疑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式、发现并填补他们的研究盲点。比如，英美学者热衷于考察俾斯麦以来的德国史，“海外学者”在中

* 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周嘉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Abbott Gleason, "The Great Reforms and The Historians Since Stalin", in Ben Eklof, John Bushnell, Larissa Zakharova, eds., *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

国史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冷战期间西方学者几乎重新书写了俄国史。^①

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使西方学者对俄国史和苏联史的兴趣日益浓厚。农奴制在俄国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并渗透到俄国农村社会，构成俄国政权的统治基础。中世纪时西欧农奴制的解体与东欧农奴制的形成，^②以及19世纪中期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③几乎同步发生。西方学者围绕俄国农奴制问题展开大量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农奴制的确立、农奴制废除的原因和农奴制废除的影响。其中，西方学者有关俄国农奴制废除原因的研究，正是俄国史研究过程中“局内人”和“局外人”之争的缩影；同时，冷战以来西方俄国史研究领域的理论转向，成为西方学界“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兴衰的决定因素。

本文通过梳理西方学者有关1861年农民改革前经济发展水平、地主—农民关系、改革动力等问题的主要观点，展现冷战以来西方学界俄国史研究的主流范式和发展轨迹，借以深化中国学者对俄国史、美国史、冷战史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④



改革前“农奴制是否遭遇危机”，是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的经典议题。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苏联学者热衷于探讨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民

① 本文的“西方学者”主要是指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学者。在英语中，本有专门术语（English-speaking scholar）专门指代这类学者，但若采用直译的方法则与中文写作习惯不符。

② Jerome Blum, “The 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57, Vol.62, No 4, pp.807-836.

③ Peter Kolchin, *Unfree Labor: American Slavery and Russian Serfdom*,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④ 有关国外学界的最新研究进展可参见 Большакова О.В. Влас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19-начала 20 века: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М., Наука, 2008. С.134-153; Большакова О.В. 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англоязыч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отмены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1. №.4. С.14-26; Алессандро Станциани. Отмена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 глобаль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6. №.5. С.68-93.

的经济状况。^①他们深受苏联官方史学阐释模式的影响，惯用有关“生产方式”的概念，并将1861年农民改革视为俄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十分关注农奴制经济本身是否衰落和遭遇危机的问题。他们引经据典，认为在农业领域，“商品生产”和“农奴制经济”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中，“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②在工业领域，18世纪末19世纪初地主在领地设立工厂并强制农民劳动；在农奴制经济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条件下，地主只有通过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扩大生产的途径增加收入；运货徭役使农民必须为地主运输剩余产品。^③农民的实物租转为货币租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标志；同时，农民因生活水平下降而大量死亡，^④农村经济越来越无利可图。^⑤苏联学者还将“农民受剥削程度加深”与“农民运动日益增多”联系在一起，认为1859至1860年俄国农奴制出现了“总危机”。^⑥冷战期间，西方学者围绕“否定苏联学者研究范式”这一主线展开研究，讨论改革前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

在论证劳役租与代役租的利弊及其影响时，西方学者首先从探讨代役租的缺陷入手。丹尼尔·菲尔德比较农民欠款的情况，坚信代役制下农民欠款较多且易逐年累积。^⑦艾夫斯·多玛和马克·马基纳则采用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认为代役租常由地主定夺并易受通货膨胀的影响。^⑧随着现代化理论的盛行和原始工业化理论的兴起，西方学者将有关改革前俄国工业发展水平以

① Рянский Р.Л., Рянский Л.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о положении помещичьих крестьян на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м этап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крепостнич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Tractus aevorum*. 2016. №.1. С.51-67.

② 《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

③ [苏]П.И·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07-622页。

④ David Moon,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Russia, 1762-1907*, Pearson Education, 2001, p. 19.

⑤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613; Evsey D. Domar, Mark J. Machina,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Russian Serfdo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4, Vol.44, No.4, p. 919.

⑥ [苏]П.И·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一卷），第607页。

⑦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186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5-28.

⑧ Evsey D. Domar, Mark J. Machina,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Russian Serfdo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4, Vol.44, No.4, pp.936-939.

及农奴制下劳役租和代役租利弊的研究向前推进。苏联学者普遍认为，农奴制阻碍了俄国国内市场的扩大，俄国工业获得真正发展必然发生在农奴制终结即 1861 年之后。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富兰克林·门德尔斯提出“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将西方工业化的起源推至大机器工业诞生之前，关注前工业社会农村经济内部的分化。^①一般认为，原始工业化主要针对区域经济，其典型表现是产生“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的农村工业”，农村工业、外部市场与商业性农业三者缺一不可。^②这一理论出现后不久，便被研究俄国经济史的西方学者接受和采纳，逐渐出现在有关俄国 1861 年农民改革前经济发展水平的著述当中。

奥尔加·克里斯普在考察 1700 至 1914 年俄国工业化的类型时强调，19 世纪 40 至 50 年代，由于现代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俄国棉纺织业和制糖业获得较大发展。^③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理查德·鲁道夫和埃德加·梅尔顿分别考察了农奴制下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均认为改革前农奴制非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能够适应市场变化，通过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促进了俄国原始工业化的发展。当然，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分析俄国农奴制与工业化的关系，强调俄国北部地区代役制的发展，以及黑土地地区劳役制和代役制下农业收入的增加。^④后者则以非黑土区弗拉基米尔省姆斯捷拉（Мстѣра）庄园和黑土区库尔斯克省拉斯托尔格（Пасрогр）庄园为例，考察改革前两个庄园的经济结构：姆斯捷拉庄园是俄国圣像绘画中心，农民支付代役租；而拉斯托尔格则是典型的劳役制庄园，农民容易分家、喜欢酗酒且过于懒散。^⑤鲁道夫和梅尔顿的发现中断了农民生活贫困与劳役租负担过重之间人为的联系。此外，三者均强调地主农民和贵族地主在

① 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阐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147-152 页。

② Richard L. Rudolph,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Proto-Industrialization in Rus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free Labo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5, Vol.45, No.1, pp.48-49.

③ Olga Crisp, *Studie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Before 1914*, Barnes and Noble, 1976, pp.5-17.

④ Richard L. Rudolph,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Proto-Industrialization in Rus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free Labor”, pp.47-69.

⑤ Edgar Melto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Serf Agriculture and Agrarian Social Structure: Two Esta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1987, No.115, pp.69-106.

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鲁道夫和梅尔顿还肯定了农奴制下俄国农民对原料运输和市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修正了苏联学者提出的“地主通过运货徭役，强迫农民为其运输剩余产品”这一观点。近年来，法国学者提出了原始工业化活动逐渐“农村化”（ruralized）的概念，^①再次肯定了俄国农民经济的灵活性。尽管克里斯普、鲁道夫和梅尔顿等人与苏联学者在研究资料方面有所重合，但他们通过采用新的理论框架（即原始工业化），重新认识了农奴制下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西方学界史学理论的更新，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逐渐传播开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艾夫斯·多玛和马克·马基纳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否定了改革前俄国农奴制经济无利可图并出现危机的说法。^②多玛和马基纳建立了四个理论模型，将农民的价格视为衡量农奴制的重要指标（价格下降便表明农奴制下地主的利润下降），分析人口增长、谷物价格提高、“保罗一世法令”和代役租对农民经济的影响。结果，除了立陶宛地区以外，改革前其他地区的农民价格并未降至0，这表明地主利润并未下降。然而，在新经济史研究框架下，作者过于依赖数学模型和假设的方法，必然受到多重制约。比如，作者以地主拥有固定数量的农民为假设，以拥有固定土地和农民数量的一个庄园为研究对象，将市场因素和人口迁移因素排除在外；在时间序列数据（time series）缺少的前提下，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 data）^③无法反映出一段时间内数据的变化。

西方学者对18至19世纪上半期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普遍持乐观态度。彼得·加特莱尔在考察19世纪俄国经济发展的“连续性”问题时发现，19世纪最后30年，俄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立在改革前的良好基础之上，改革

① Alessandro Stanziani, “Revisiting Russian Serfdom: Bonded Peasants and Market Dynamics, 1600s-1800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2010, No.78, pp. 17-21.

② Evsey D.Domar, Mark J.Machina,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Russian Serfdo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4, Vol.44, No.4, pp.919-955.

③ Evsey D.Doma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erfdom: Essays by Evsey D. Dom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xvii.

前俄国非资本主义性质和现代生产组织并存。^①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几乎不否认与西欧主要国家相比，俄国经济发展具有滞后性。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坚信，农奴制下农民赋役负担沉重、迁移权和财产权受限，制约了农业的创新和工业的发展，致使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方。^②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格申克龙的观点不断遭到挑战并得到修正。杰罗姆·布卢姆、奥尔加·克里斯普后来强调，俄国不是因为地主—农民的经济关系而落后，是其落后导致农奴制继续存在；自然资源的匮乏和分布不均、土地重分制度、交通运输体系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小等因素，才是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阻碍。^③

西方学者对改革前俄国农民生活水平的看法同样积极，主要通过饮食结构考察俄国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工作能力，并将其与欧洲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杰罗姆·布卢姆援引法国学者列普莱（Le Play）的观点，认为 19 世纪 40 年代乌拉尔地区一个铁匠和木匠家庭的饮食结构较为合理，谷物、牛奶和鸡蛋的消费量较大。^④威廉·布莱克威尔描绘了 19 世纪上半期乌拉尔工厂工人的悲惨境地；^⑤而托马斯·埃斯珀则认为，当时俄国冶金业工厂工人的负担较轻，生活水平高于西欧农民，并指责苏联学者过分关注“工人骚乱”现象。^⑥

① Peter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1850-1917*, Batsford Ltd, 1986; Peter Gatrell, “The Meaning of the Great Reforms in Russian Economic History”, in Ben Eklof, John Bushnell, Larissa Zakharova, eds., *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85-90, 95-99.

② Alexander Gerschenkron, “Problems and patterns of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yril Edwin Black,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 Since 186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42-43;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7.

③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342-343; Jerome Blum, “Russian Agriculture in the Last 150 Years of Serfdom”, *Agricultural History*, 1960, Vol.34, No.1, pp.3-12; Olga Crisp, *Studie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Before 1914*, Barnes and Noble, 1976, p.95.

④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317.

⑤ William L. Blackwell, *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1800-186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59.这种工人多是 18 世纪末俄国政府将乌拉尔及其毗邻地区的国有农民划归到采矿企业业务工，分有不同面积的土地。参见 Алексеев В.В.Гаврилов Д.В.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Урал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М., Наука, 2008. С.357.

⑥ Thomas Esp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erf Workers in Russia's Metallurgical Industry, 1800-1861”,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78, Vol.50, No.4, pp.660-679.

史密斯和大卫·克里斯汀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 16 至 19 世纪俄国农民的饮食情况及其生活水平。他们主要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农民的生活水平并非一成不变，饮食结构会受到季节、收成和阶级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第二，改革前农民的饮食结构较为合理，摄入大量谷物以及小部分蔬菜、土豆、肉类、水果等；第三，农民的粮食消耗量在正常年份和歉收年份有所区别，但至少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和缴纳赋役的需要。^①遗憾的是，囿于资料的限制，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忽视了燕麦等重要粮食作物。

与史密斯和克里斯汀所进行的宏观研究有所不同，史蒂文·霍克和特蕾西·丹尼森选取俄国某个庄园开展微观研究。霍克以中部黑土区坦波夫省南部的彼得罗夫斯科耶（Петровское）庄园为研究对象。在考察当地农民的粮食产量、份地和家畜数量，以及农民的饮食和居住情况的基础上，肯定了 19 世纪上半期当地的良好收成与合理的饮食结构。他主要有两个代表性观点：第一，当地农民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较为均衡，饮食结构优于同时期的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甚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第二，农民生活水平并未下降，只是生活质量存在波动，粮食危机和流行病使农民挣扎在贫困的边缘，平日里住房不足和恶劣的卫生条件等难题愈发凸显，^②这一观点与史密斯和克里斯汀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在探讨农民的饮食结构时，霍克等学者主要关注黑麦、荞麦、粟米、牲畜、鸡蛋、家禽等食物消费情况，以衡量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按照这一标准，消费肉类和奶制品最多的农民“生活水平最高”，这显然忽视了不同地区的情况，且以农民仅消费食物为假设，因而遭到丹尼森的指责。丹尼森发现，在俄国中部工业区雅罗斯拉夫省的沃夏日尼科沃（Вощажниково）庄园，农民将收入用来购置日常消费品，如食品、服装、珠宝和家具等。同时，在现金有限的情况下，这里的农民权衡支配手中现金的方式，^③这与“将农民拖欠赋役（代役租）

① R.E.F. Smith, David Christian, *Bread and Salt: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Food and Drink in Rus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51-287, 330-360.

② Steven L Hoch, “Serf Die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Agricultural History*, 1982, Vol. 56, No.2, pp.391-414; Steven L Hoch,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in Russia: Petrovskoe, a Village in Tambov*,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15-64.

③ Tracy Denniso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Russian Serf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视为农业发生危机和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标志”的做法不符。当然，丹尼森的研究同样存在缺陷：她主要依据当地农民向地主的请愿书、嫁妆和遗嘱记录进行初步推测，尚未掌握有关农民收入和消费习惯的确切数据；其所涉区域并非与农民和农奴制关系最为密切的中部黑土区。

西方学界有关改革前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还受到了“恰亚诺夫理论”和“道德经济学”（moral economy）的影响。根据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论”，小农家庭农场的运行机制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一旦达到均衡点（即生活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任何进一步的劳动投入都毫无意义。^①苏联时期，“恰亚诺夫理论”曾屡遭限制和冷落，自20世纪中期开始“恰亚诺夫热”在西方逐渐升温。西方学者后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经济学”理论。詹姆斯·斯科特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尤其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等问题。他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生存风险与较高的生存保障。自此，西方学者常常比对俄国农民经济是否与“道德经济学”模式相符，主要关注改革前农民的经济活动、生活水平（粮食充足与否）和村社内部的集体行为等三个问题。^②比如，梅尔顿在探讨改革前俄国原始工业化问题时，肯定了农奴制下劳役租和代役租的不同分工。^③丹尼森在考察改革前雅罗斯拉夫省沃夏日尼科沃庄园的经济和社会演变时一再强调，这里的农民不单是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参与了土地买卖、劳动力雇佣、开设工厂和企业、信贷交易等经济活动，积累了财富并拥有一定的财产权。^④

19世纪上半期俄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同样备受关注。19世纪中期，俄

① [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1-63页。

② 有关“村社内部的集体行为”问题的研究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③ Edgar Melto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Serf Agriculture and Agrarian Social Structure: Two Esta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1987, No.115, pp.69-72.

④ Tracy Dennison, “Did serfdom matter? Russian rural society, 1750-1860”, *Historical Research*, 2006, Vol.79, No.203, pp.74-89; Tracy Denniso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Russian Serf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国农民改革的支持者依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断定俄国人口的死亡率超过出生率。这一观点后来被以И.Д·科瓦里钦科为代表一批苏联学者继承和发展，将1861年农民改革前俄国农民人口数量的减少视为封建农奴制出现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丹尼尔·菲尔德等西方学者的认可。20世纪70年代末，霍克和奥古斯丁修正了苏联学界广泛盛行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造成大量死亡”这一观点。二者指出，战争前后人口数量波动较大，俄国人口普查结果不能作为研究的唯一基础。^①同时他们还分析了地主农民人口减少的原因，认为这一时期地主农民转为国家农民或应征入伍，小部分还转入了小市民阶层。^②

苏联解体后，长期盛行的官方史学阐释模式随之终结。俄国学者或是宣称“改革前俄国农奴制没有危机”，“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③或是依托大量档案资料考察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④在研究改革前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时，俄罗斯学者通常依靠某个有关地区和庄园的大量数据；西方学者则擅长开展有关某几个省份和地区的比较研究或有关某个庄园的个案研究，并认为农民改革与经济因素关系不大，反而是一场政治行为。与此同时，俄国幅员的辽阔、农奴制下农民生活的多样性、如实记录农民信息的不易以及冷战时期西方学者所能接触到的资料的有限，使这些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尤其是有关劳役制和代役制下农民负担和收入、以及农民分化程度的研究较为薄弱。

二

西方学者有关俄国“革命形势”的研究，主要遵循两种思路，其中一种

① Steven L. Hoch, Wilson R. Augustine, “The Tax Census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erf Population in Imperial Russia, 1833-1858”, *Slavic Review*, 1979, Vol.38, No.3, pp.405-410, 423-425.

② Ibid, pp.411-425.

③ [俄]Б.Н·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4-412页；[俄]Б.Н·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上），张广翔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9-330页。

④ Нефёдов С.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Факторный анализ.Т. II. М., Территория будущего, 2010.

是政治史研究框架。17至18世纪俄国爆发的四次农民战争，使俄苏学者惯于关注俄国的革命形势与农奴制的关系。帝俄晚期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В.И·谢梅夫斯基、И.И·伊格纳托维奇等人，尝试统计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民运动的次数，以间接证明农奴制危机之严重。这一观点被列宁所吸收，他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提出：1859至1861年俄国面临严峻的国内“革命形势”。^①在20世纪中期以后，以М.В·涅奇金娜为首的苏联学者发展了这一观点。根据这一理论，改革前俄国阶级斗争尖锐（地主与农民），农民生活条件恶化，农民运动大规模爆发；克里米亚战败后俄国统治者面临严重危机，农民运动波涛汹涌，仅在1855至1861年就发生千余次，“革命形势”异常严峻。

这一范式首先遭到了一些苏联学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资料来源不够可靠，农村警察组织和国家秘密警察组织提供的数据不一致，记录时存在人为增加或减少农民运动次数的可能；^②第二，国家监督政策的严格与否影响数据的统计。西方学者同样质疑农民运动的决定性影响，普遍认为改革前后俄国政权都未遭受“自下而上”的农民运动的威胁，上层统治者最多只是因普加乔夫起义和1848年欧洲革命而对农民运动和社会动荡有恐惧感；在俄国政府决定实行改革后，农民运动才作为一种反馈而大规模地发生。^③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和后来俄罗斯学者接受了这一批判，不再夸大农民运动对1861年改革的决定性影响，而是注重考察农民运动的具体影响和农奴制下农民日常反抗地主的多种形式。实际上，有关农民运动问题的研究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如何确定农民运动的准确次数和具体原因，尤其是自然灾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0页。

② [苏]П.А·札依翁契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叔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0页。

③ Terence Emmons, “‘Revolution from Above’ in Russia: reflections on Natan Eidel’man’s last book and related matters”, in Peggy McNerny, Theodore Taranovski eds., *Reform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Progress or Cyc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7-49;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186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52-53; Walter M. Pinter, “Reformability in the Age of Reform and Counterreform, 1855-1894”, in Robert O. Crummey eds., *Refor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ast and Prospect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p.88.

害、酒价上涨、^①民间传言等偶然因素与农民所受剥削程度加强等必然因素相互之间的消长关系；17至19世纪中期俄国政权顶住农民战争巨大压力的原因，等等。

西方学者有关俄国“革命形势”的研究同时沿着另一条主线开展。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社会转向”（social turn），^②新社会史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70至90年代，西方学者兼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和个案分析手段，考察改革前俄国农民生活的世界。他们热衷于探讨俄国农奴制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尤其是作为俄国农民生活两大支柱的“家庭”和“村社”，以分析农奴制下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农民经济社会分化等问题，从社会史的角度修正苏联学界盛行的“革命形势说”。

家庭和村社是农奴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改革后农民争取自由和经济独立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婚姻反映出新家庭产生和旧家庭消亡的过程，尤其在俄国这样一个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家庭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村社是俄国农村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它既是民间的民主组织，又是官方的基层行政单位，构成俄国农村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③西方学者基本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其一，俄国地主究竟是否通过干涉农民生活来控制农民，以获得资源和增加财富、确保农民生存和按时缴纳赋役；其二，改革前地主是否掌握对农民的绝对控制权。

史蒂文·霍克在其《俄国的农奴制与社会控制：以坦波夫省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为例》一书中，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民生活的结构以及农奴制下农民受到剥削的程度和方式。该庄园属于加加林家族，农民主要从事农耕活动并缴纳劳役租。霍克从起源、手段和奖惩机制三个方面阐释了其著名的“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第一，由于地主对农业生产兴趣的缺乏和采用直接管理方式的不便，负责管理农民的“中间人”的地位举足轻重。农民家长对权力和地位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与地

① David Christian, “A Neglected Great Reform: The Abolition of Tax Farming in Russia”, in Ben Eklof, John Bushnell, Larissa Zakharova, eds., *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02-114.

② 李剑鸣：“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第26页。

③ 张广翔：“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2页。

方长官合作的方式对农民实行“社会控制”。第二，农民家长和地方长官提倡年轻人早婚和早育，保持较高的结婚率和生育率，促进农民大家庭的形成；地方长官通过限制已婚男子分家的方式巩固家长的权威；村社的土地重分制度和聘礼限制了农民分化。第三，农民家长和地方长官扩大早婚者、寡妇和退休人员的耕地面积，平均分配生产资源，甚至赋予寡妇特权和继承权；通过体罚、征兵或流放至西伯利亚等方式，惩罚懒散懈怠和不听管教的农民。霍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俄国农村家庭不仅是经济和家庭单位，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农村权力、惩罚和社会控制的中心；农村的社会剥削程度远远超过经济剥削，家庭主义（familism）和农民的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是决定农民生活面貌的主要因素，^①其影响大于国家、沙皇和地主。^②在解释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改善农民地位的尝试为何在地方仍收效甚微的同时，霍克还将“社会控制”现象视为俄国和欧洲村社内部机制的共同点，从而将有关俄国的农民学研究置于全球史视野之下。

埃德加·梅尔顿研究了巴基（Баки）庄园村社的内部机制。该庄园位于俄国非黑土区科斯特罗马省，属于列文家族，农耕和木材贸易构成当地农民经济的基础。梅尔顿将村社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归因于农民分化程度较高和兵役负担分配不均。在这里，村社事务由富商和官员共同管理，不富裕农民则无权干涉村社的决定；贫农承担征兵义务，中等家庭、富裕的木材商人及其家庭可以免服兵役，^③“开明地主”试图减轻农民兵役负担的努力数次落空。^④梅尔顿的研究表明：村社作为国家和地主的重要行政管理机构，已经超出

① Steven L Hoch,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in Russia: Petrovskoe, a Village in Tambov*,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91-186; “Bridewealth, Dowry,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in Rural Russia”, in Steven L. Hoch, *Essays in Rus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5, pp.245-271; “The Serf Economy, the Peasant Family,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Steven L. Hoch, *Essays in Rus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5, pp.272-284.

② Steven L Hoch,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in Russia: Petrovskoe, a Village in Tambov*, pp.187-190.

③ Edgar Melton, “Household Economies and Communal Conflicts on a Russian Serf Estate, 1800-1817”,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93, Vol.26, No.3, pp.559-578; Edgar Melton, “The Magnate and her Trading Peasants in Serf Russia: Countess Lieven and the Baki Estate, 1800-1820”,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1999, Bd.47, H.1, pp.40-55.

④ Edgar Melton, “Enlightened Seigniorialism and Its Dilemmas in Serf Russia, 1750-1830”,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90, Vol.62, No.4, pp.675-708.

地主的控制范围，牢固的“关系网”很难改变；“道德经济学”理论不能用于解释农民的这些行为。

罗德尼·博哈克分析了马努伊洛夫斯科耶（Мануиловское）庄园的家庭“继承策略”、征兵制和农民“日常反抗”行为的影响。该庄园位于俄国中部非黑土区特维尔省，属于加加林家族，农民主要从事农耕活动。在这里，兄弟间的冲突以及经济事务纠纷极易成为分家的导火索，分家后农民的经济地位相差悬殊；^①农民围绕征兵问题产生很多争端，最后依然由多数农民承担兵役义务。^②村社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斗争表明：这里的“继承策略”和“征兵制度”均不符合传统观念中村社的“平均主义原则”。博哈克还考察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揭示农奴制下地主、地方长官与农民的关系。博哈克发现，尽管农民反抗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主要是为了减轻代役租和指责地方长官的行为，且几乎从未发展成为农民起义。^③同时，博哈克的研究证实了詹姆斯·斯科特“日常反抗是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论断，揭示了农民反抗的社会学根源。^④

史蒂文·霍克、埃德加·梅尔顿和罗德尼·博哈克同时发现，农民家长和地方长官在维护农奴制方面抱有浓厚兴趣。他们能直接控制和剥削农民，在维护农奴制方面比国家和地主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个案研究和社会史研究方法的采用，这些学者强调俄国村社内部的非平均机制，过于关注农民的社会分化程度，忽视了村社内部的社会和文化纽带。与此同时，彼得·曹普、约翰·布什内尔、凯罗尔·伦纳德等学者，则更加关注改革前农奴制下地主权力的消长情况。

彼得·曹普探讨了改革前俄国农民的婚姻行为，以1782至1850年梁赞省互不相邻的米哈伊洛夫卡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的米希诺（Мишино）庄园

① Rodney D. Bohac, “Peasant Inheritance Strategies in Russia”,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85, Vol.16, No.1, pp.23-42.

② Rodney D. Bohac, “The Mir and the Military Draft”, *Slavic Review*, 1988, Vol.47, No.4, pp.652-666.

③ Rodney. D.Bohac,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Serf Opposition to Gentry Exactions, 1800-1861”, in E.Kingston-Mann, T. Mixer, eds., *Peasant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European Russia, 1800-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36-260.

④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和萨波若克区（Сапожковский）的波克罗夫斯科耶（Покровское）庄园开展个案研究。两个庄园均属于加加林家族，处于黑土与森林和瘠土地带的过渡地区，农民主要从事农业活动。曹普主要研究了农民结婚年龄推迟的原因和象征：劳动力至上观念的盛行和农民反抗能力的增强，表明地主控制力正在减弱。^①约翰·布什内尔利用有关戈利岑家族的档案、教区记事录等资料，研究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尔洛夫（Орлов）庄园有关农民婚姻的规定和影响。布什内尔同样发现地主数次改变农民婚姻习俗的举措均以失败告终，农民结婚的年龄和去向几乎不受地主的影响。^②布什内尔的结论还证实了史蒂文·霍克提出的由农民家长和地方长官共同进行“社会控制”的论断。凯罗尔·伦纳德则研究了改革前雅罗斯拉夫省地主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问题，以探讨农奴制改革的必然性。“交易成本”是指地主支付当地官员薪俸的费用。伦纳德发现，在这个棉纺织工业地区，小地主通过增加代役租的方式获取资金，而在大地主庄园内官员偷窃和贪污的现象屡见不鲜，与村社的斡旋和监管的开销使地主失去了从事农业活动的热情。^③曹普、布什内尔和伦纳德均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了1861年改革前制度变革的背景，认为改革前部分地区农奴制的法律和道德基础已经开始瓦解，某些地主甚至不愿负担农民中间人日常的花销和造成的损失。这些研究成果受到了有关俄国历史“连续性”问题研究的影响，对此前广泛盛行的“1861年改革是俄国社会发展分水岭”的观点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与西方经济史学者提出的“1861年改革不是俄国经济发展分水岭”的观点遥相呼应。

西方学者还十分关注地主对农民的最低生存保障，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地主会确保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土地和补贴，以便完成缴纳赋役的义

① Peter Czap, “Marriage and the Peasant Joint Family in the Era of Serfdom”, in Ransel David eds., *The Family in Imperial Russia: New Line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8, pp.103-123.

② John Bushnell, “Did Serf Owners Control Serf Marriage? Orlov Serfs and Their Neighbors, 1773-1861”, *Slavic Review*, 1993, Vol.52, No.3, pp.419-445.

③ Carol S. Leonard, “Landlords and the Mir: Transaction Cos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Emancipation Russia (Iaroslav Guberniia)”, in Roger Bartlett eds., *Land Commune and Peasant Community in Russia: Communal Forms in Imperial and Early Soviet Society*,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121-136.

务。^①罗伯特·克拉米发现，早在17世纪时俄国地主就对受歉收影响的农民提供帮助。^②史蒂文·霍克有关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农奴制的研究表明，1833至1834年俄国发生饥荒时，农民每月会从庄园谷仓领到一定的粮食，尽管不能凭此扭转危机局势。^③马滕·泽佩尔还指出，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波罗的海三省的地主曾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④

在考察改革前俄国的“革命形势”时，西方学者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讨论。一方面，从事俄国政治史研究的学者直接否定“革命形势”对农民改革的决定性影响，并大量探讨俄国沙皇和官僚在改革准备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从事俄国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则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和个案分析手段，考察改革前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通过证明地主在农民管理过程中居于次要地位、地主控制权的衰减和地主对农民的基本保障，间接驳斥“革命形势说”。

三

由于苏联史学过分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危机”和“革命形势”被苏联学者视为1861年农民改革的根本原因，据此认为俄国沙皇是被迫着手改革。而在西方学界，自20世纪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逐渐被应用于俄国史研究当中，并对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俄国史研究活动产生很大影响。在“现代化理论”的阐释模式下，国家是社会变革和工业化启动的主要动力，^⑤国家（state）和国家机构（state apparatus）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西方学者非常注重俄国沙

① David Moon, “Reassessing Russian Serfdom”,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996, Vol.26, No.4, pp.503-504.

② Robert O. Crummey, *Aristocrats and Servitors: The Boyar Elite in Russia, 1613-168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4-38, 45-49.

③ Steven L Hoch,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in Russia: Petrovskoe, a Village in Tambov*,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52-56.

④ Marten Seppel, “Landlords’ Medical Care for their Serfs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11, Vol.89, No.2, pp.201-223.

⑤ Большакова О.В. 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англоязыч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отмены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1. №4. С.14.

皇和官僚在改革启动和准备过程中的作用，排斥苏联学界广泛盛行的“沙皇被迫着手改革”的论断。他们普遍肯定“沙皇个人的重要作用”，并围绕“影响沙皇决策的因素”这一问题展开大量讨论，涉及国家利益、西方经济学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立法经验、“改革者圈子”等内容。

西方学者十分关注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1853年10月在欧洲大陆爆发的这场战争与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有关，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1856年，战争以俄国溃败而告终。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框架中，这场战争的实质为“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争”，战败后俄国启动改革的事实恰好符合“冲击—反应模式”。西方学者首先将改革与增强军事能力的需要直接联系在一起，认为俄国统治者意识到农奴制不利于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俄国与西欧国家的抗衡。^①特伦斯·埃蒙斯还将改革与俄国维护其在欧洲的地位、实现现代化和欧洲化两个目标紧密相连。^②与此同时，丹尼尔·菲尔德和布鲁斯·林肯则对战败的影响持保留态度，认为战败只是降低了政府的威望，^③政府并未轻率地采取行动。^④值得注意的是，菲尔德和林肯提出该种观点的深层原因值得探究。前者向来重视俄国农奴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和政治基础，而后者十分关注俄国“开明官僚”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对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有所保留便不足为奇。

西方学者普遍肯定沙皇个人的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深受革命前俄国自由主义史学的影响，西方学者给予了沙皇“解放者”的称谓，70年代以后则形成了多元的研究局面。赞美沙皇的学者认为：在君主

① Alexander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Russia, 1861-1917”, in H.J. Habakkuk, M.Post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707-708; Alfred J. Rieber, “Alexander II: A Revisionist View”,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71, Vol.43, No.1, p.47.

② Terence Emmons, “‘Revolution from Above’ in Russia: reflections on Natan Eidel’man’s last book and related matters”, in Peggy McNerny, Theodore Taranovski eds., *Reform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Progress or Cyc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7.

③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186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54.

④ Bruce Lincoln, *In the Vanguard of Reform: Russia’s Enlightened Bureaucrats, 1825-1861*,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xii; Bruce Lincoln, *The Great Reforms: Autocracy, Bureau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Imperial Russia*,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xiv.

专制的国家制度下，俄国沙皇的态度是改革的关键；^①亚历山大二世具备君主的责任和意识；在改革的准备过程中，沙皇努力处理好改革与官僚、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并多次扭转局势；^②沙皇还赋予内务部权力、支持编纂委员会的立法原则，保障改革法令的出台。^③否定沙皇作用的学者认为：亚历山大二世意志力薄弱，不具备彼得大帝和列宁的魄力；非常幸运地继承王位，有一支极富能力的官僚队伍，《巴黎和约》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制造了机会，等等。^④

尽管“经济危机说”在西方学界遭遇了“滑铁卢”，但改革前俄国上层和知识分子有关自由劳动力与非自由劳动力效率的争论，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阿尔弗雷德·斯克潘认为，“农奴制危机”仅存在于统治者的观念之中，但仍推动了改革的进行。^⑤而埃丝特·金斯顿·曼却否定了“自由劳动力观念”的作用，因为俄国经济学家、官僚和知识分子在探讨俄国村社、地主与农民问题时，尚未偏离“强制性”原则，仍以维护等级特权或社会秩序稳定为宗旨。^⑥同时，阿尔弗雷德·斯克潘和大卫·穆恩还通过改革法令内容本身反证改革与追求自由劳动力无关。前者认为，法令继续限制农民的迁移活动，以确保农民能够缴纳赋税；后者强调，改革法令没有以增大内需和刺激消费为目的直接减少农民的负担，农民仍被束缚在土地之上。^⑦

① Francis William Wcislo, *Reforming Rural Russia: State, Local Socie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1855-191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6-18.

② N.G.O. Pereira, “Alexander II and the Decision to Emancipate the Russian Serfs, 1855-1861”,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1980, Vol.22, No.1, pp.101-103, 115.

③ Francis William Wcislo, *Reforming Rural Russia: State, Local Socie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1855-191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3.

④ Alfred J. Rieber, “Alexander II: A Revisionist View”,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71, Vol.43, No.1, pp.44-45, 57-58;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186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3, 49-50, 364, 366-367.

⑤ Alfred A. Skerpan, “The 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and Emancipation”, in Alan D. Ferguson, Alfred Levin eds., *Essays in Russian History: A Collection Dedicated to George Vernadsky*, Archon Books, 1964, p.176.

⑥ Esther Kingston-Mann,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the West: The Impact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Pre-Emancipation Rus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1, Vol.33, No.1, pp.86-105.

⑦ Alfred A. Skerpan, “The 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and Emancipation”, pp.186-213; David Moon,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Russia, 1762-1907*, Pearson Education, 2001, p.24.

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看法不一。丹尼尔·菲尔德深受П.А.·札依翁契可夫斯基(П.А.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的学术影响,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说”,强调俄国农奴制逐渐失去文化和政治基础。^①西方学者还关注19世纪上半期俄国知识分子对农奴制的抨击和公众有关农奴制的讨论,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意识到农奴制的“不合时宜”(anachronism),并对统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格里高利·弗里兹长期从事俄国宗教史研究,他发现,人道主义精神已在俄国东正教堂传播,牧师试图规范俄国地主和农民的责任和义务。^③但大卫·穆恩却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自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西方“博爱”、“独立”和“进步”的思潮逐渐在俄国蔓延,但在后来的一百年间俄国始终没有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④而俄国学者则在苏联解体后才对公众舆论的作用引起重视,充分利用卡维林、萨马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非官方手抄笔记,推动“俄国知识分子改革方案”问题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西方学者非常关注农民改革的立法经验,借以探讨俄国农民法律地位的演变和农民改革的渐进性。学者最初只关注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改革尝试,^⑤后来逐渐重视18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的农民政策。大卫·穆恩肯定了彼得三世改革法令和保罗一世“三日耕作法”的规定。穆恩将1762年彼得三世的改革法令视为俄国农奴制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开始了终止贵族作为国家与农民“中间人”的进程;第二,教会土地世俗化后,“农民问题”逐渐成为俄国政府和社会热烈讨论的对象。^⑥苏珊·麦

①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1861*, pp.98-101, 359-360.

② David Saunders, *Russia in the Age of Reaction and Reform, 1801-1881*, Longman, 1992, pp.148-172, 205-227; Irina Paperno, “The Liberation of the Serfs As a Cultural Symbol”, *The Russian Review*, 1991, Vol.50, No.4, pp.417-436.

③ Gregory L. Freeze,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Serfdom in Prereform Russia”, *Slavic Review*, 1989, Vol.48, No.3, pp.361-387.

④ David Moon,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Russia, 1762-1907*, Pearson Education, 2001, pp.31-32.

⑤ Terence Emmons, *The Russian Landed Gent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186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⑥ David Moon, *The Russian Peasantry, 1600-1930: The World the Peasants Made*, Longman, 1999, p.109.

卡弗里、大卫·穆恩等研究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农民改革方案，肯定了1803年《有关自由农民的命令》在解放农民方面进行的尝试和1816至1819年波罗的海三省（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库尔兰）农民改革的指导意义，如保证农民拥有土地、贵族应该积极参与立法活动、保留村社权力、认真组织调查工作、处理好改革与地主权利之间的关系。^①西方学者普遍认为，19世纪30年代“基谢廖夫农民改革”给予了农民一定的自由，降低了国家农民受剥削的程度，增加了国家农民的份地和国家的收入，并为地主农民改革提供了参考。^②大卫·穆恩还肯定了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一世针对地主农民的改革措施，如建立讨论“农民问题”的秘密委员会、1842年有关“义务农民”的法令、1844年有关解放家仆的法令、1847年有关赎买权利的法令以及1847至1848年乌克兰右岸三省（基辅、波多利亚和沃利尼亚）的“财产清册”制度，这些可被视为俄国上层统治者有关农民改革的有益尝试。^③穆恩着重分析了“财产清册”制度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直接促成立陶宛贵族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的请愿和“纳吉莫夫敕令”的出台；制定方案时应考虑不同地区的情况；改革应该逐步进行。^④

西方学者热衷于研究“改革者圈子”尤其是“开明官僚”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对俄国官僚的评价还很低。主要认为官僚仅将改革停留在口头上，几乎未将想法付诸实践；^⑤通过国家机器不停地限制“自由主义贵族”的活动，形成“官僚专制主义”现象，反倒是以A.M·翁

① Susan P. McCaffray, “Confronting Serfdom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Projects for Serf Reform in the Time of Alexander I”, *The Russian Review*, 2005, Vol.64, No.1, pp.1-21; David Moon, *The Russian Peasantry, 1600-1930: The World the Peasants Made*, Longman, 1999, p.110.

② Walter M. Pintner, *Russi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Nicholas I*,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53-181; Olga Crisp, *Studie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Before 1914*, Barnes and Noble, 1976, pp.79-92; Bruce F. Adams, “The Reforms of P. D. Kiselev and the History of N. M. Druzhinin”,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1985, Vol.19, No.1, pp. 37-43; David Moon, *The Russian Peasantry, 1600-1930: The World the Peasants Made*, pp.107-108.

③ David Moon,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Russia, 1762-1907*, pp.46-48.

④ David Moon, “Russian Peasants and Tsarist Legislation on the Eve of Reform: Interaction between Peasants and Officialdom, 1825-1855”, Macmillan Press, 1992, pp.62-112; David Moon, “The Inventory Reform and Peasant Unrest in Right-Bank Ukraine in 1847-1848”,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01, Vol.79, No.4, pp.653-697.

⑤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1861*, pp.167, 354-358, 362-367.

科夫斯基和A.A·戈洛瓦乔夫为首的特维尔省“少数派”贵族一直坚持“自由主义原则”。^①实际上，埃蒙斯过于强调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而菲尔德只从法令内容本身出发，忽略了农奴制下社会关系的生命力。随着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在美国学界传播开来，西方学者逐渐将“官僚”视为一个中性概念，并注意到19世纪中期俄国官僚的权力体系和人事制度，以及官僚在农民改革准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布鲁斯·林肯、弗朗西斯·威廉·维斯勒、沃尔特·品特等学者在俄国“开明官僚”问题上著述丰富，在阐释“农民改革如何发生”这一问题时考察了“改革先锋”的形成、观念和贡献，^②编纂委员会成员的社会特征和供职经历，^③以及他们在限制特维尔省等地区“自由主义贵族”敌对行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④而史蒂文·霍克却认为，1858至1861年编纂委员会成员不够了解农民和农业的实际情况；期间的经济危机对改革方案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⑤在研究“改革者圈子”时，西方学者还强调了叶莲娜·巴甫罗夫娜的重要作用，推崇她在卡尔洛夫领地进行的农民改革，^⑥肯定她在圣彼得堡汇集“进步人士”的举动。^⑦

① Terence Emmons, *The Russian Landed Gent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311-312, 316.

② Bruce Lincoln, *In the Vanguard of Reform: Russia's Enlightened Bureaucrats, 1825-1861*,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68-204; Bruce Lincoln, *The Great Reforms: Autocracy, Bureau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Imperial Russia*,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5.

③ Bruce Lincoln, "The Editing Commissions of 1859-1860: Some Notes on Their Members' Backgrounds and Service Careers",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78, Vol.56, No.3, pp.348-358; Francis William Wcislo, *Reforming Rural Russia: State, Local Socie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1855-191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4.

④ Walter M. Pinter, "Reformability in the Age of Reform and Counterreform, 1855-1894", in Robert O. Crummey ed., *Refor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ast and Prospect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p.88.

⑤ Steven L. Hoch, "The Banking Crisis, Peasant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ssia, 1857-1861",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1, Vol.96, No.3, pp.795-820; "The Great Reformers and the World They Did Not Know: Drafting the Emancipation Legislation in Russia, 1858-1861", in Steven L. Hoch, *Essays in Rus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5, pp.285-319.

⑥ Bruce Lincoln, "The Karlovka Reform", *Slavic Review*, 1969, Vol.28, No.3, pp.463-470.

⑦ Bruce Lincoln, "The Circle of the Grand Duchess Yelena Pavlovna, 1847-186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70, Vol.48, No.112, pp.373-387; Shane O'Rourke, "The Mother Benefactress and the Sacred Battalion: Grand Duchess Elena Pavlovna, the Editing Commission,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Serfs", *The Russian Review*, 2011, Vol.70, No.4, pp.584-607.

在考察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原因时，西方学者实际上分析了两个问题：其一，1856 年亚历山大二世为何向社会公开政府改革的意愿；其二，1856 至 1861 年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对俄国农民改革渐进性的认可扩大了俄国史研究的范围，彼得一世以来的俄国农民、贵族和政权问题被一并考察。西方学者赞同多种因素在 1861 年改革启动和准备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其争论的实质只是确定其中最为重要的某个因素。克里米亚战败、沙皇的个人作用以及社会舆论和开明官僚的影响确实更为重要：克里米亚战败是直接动力，社会舆论是催化剂，沙皇的个人作用是关键，而开明官僚则是拥护者和执行者。

西方学者有关“影响沙皇决策因素”的争论表明，在改革的准备过程中，俄国沙皇、官僚、知识分子和贵族并没有严格分为两个阵营，沙皇是全俄最大的地主，官僚之间、官僚与贵族之间、贵族之间的分歧很大。西方学者在研究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原因时，还间接揭示了农奴制在俄国长盛不衰的原因。一方面，农奴制同时满足了国家、贵族和农民的利益，在三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equilibrium）状态。^①另一方面，农奴制是俄国维持国际地位和国内稳定的重要手段，废除农奴制度和改善农民地位并非政府的首要目标。^②仍需提及的是，农奴制作为一种松散的管理制度，在不同地区表现各异。因此，无论农民改革是沿着“直接式”还是“渐进式”道路进行，都不可能同时满足俄国所有农民的需要，符合俄国所有贵族、官僚和知识分子的预期。这些现象反映出数百年来俄国农民问题的复杂性，揭示了西方学者研究方法多样化和研究视角多元化的深层原因。

四

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进了西方学界俄国史学科的日益繁荣。由于受

① David Moon, “Reassessing Russian Serfdom”,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996, Vol.26, No.4, pp.483-515; Peter Czap, “The Perennial Multiple Family Household, Mishino, Russia, 1782-1858”,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982, Vol.7, No.1, pp.5-26.

② Roger Bartlett, “Serfdom and State Power in Imperial Russia”,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2003, Vol.33, No.1, pp.29-64.

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战后初期西方学者排斥苏联学者的研究范式，大量阅读革命前有关俄国自由主义兴起的俄国史学著作和 20 世纪早期西方俄裔历史学家撰写的俄国通史，试图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起源，尤其对 1917 年革命的发生抱有浓厚的兴趣。土地问题、粮食问题、战争问题和立宪会议问题几乎贯穿于 1917 年革命和革命后初期布尔什维克巩固政权的始终，“大改革”问题作为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自然而然走进了人们的视野，“1917 年范式”（1917 Paradigm）在西方学界逐渐确立。俄国农奴制一向被视为俄国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表现之一，因为中世纪时西欧农奴制的解体与东欧农奴制的形成，以及 19 世纪中期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几乎同步发生。正是由于上述两点原因，在二战以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西方学者研究俄国 1861 年农民改革问题的热情有增无减。

自 20 世纪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史研究方法逐渐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当中。50 至 90 年代，在研究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原因时，西方学者以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史研究方法为主，以原始工业化理论、新经济史研究方法、“道德经济学”理论、官僚制理论、个案分析手段为辅，很好地阐释了俄国国家和国家机构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农奴制下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驳斥了苏联学界广泛盛行的“经济危机说”和“革命形势说”。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陆续举办了几场有关俄国改革问题的学术研讨会，^①促进了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西方学者的许多观点逐渐得到了俄国学者的认可，比如注重克里米亚战败、经济危机、经济目标、开明官僚、立法经验和编纂委员会的影响；弱化“农民运动”研究范式，农民不再被视为推动改革的决定性力量，等等。^②

然而，苏联解体后，这一曾被西方学者轰轰烈烈地研究了近 40 年的问题逐渐降温。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方面，“1917 年范式”走向

① 会议论文集主要包括 Robert O. Crummey ed., *Refor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ast and Prospect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Ben Eklof, John Bushnell, Larissa Zakharova eds., *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eggy McNerny, Theodore Taranovski eds., *Reform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Progress or Cyc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Larisa Zakharova,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I: a watershed?”, in D.C.B.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93-616.

衰落。“1917年革命”不再被视为俄国历史的重要分界点，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解体”；不断升级的美苏争霸战曾使“十月革命史研究”与“当代俄国政治问题研究”紧密相连，而苏联解体后二者之间不再有关联；^①苏联解体后档案的开放，使西方学界有关斯大林时代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而在此之前这一问题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西方俄国史研究领域出现了理论转向。^②“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促进了“新文化史”的兴起，符号、文本、形象、经验和感受等内容备受关注；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理论面临挑战，在“新政治史”的研究框架中，俄国的边缘地带和民族主义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当“十月革命史研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历史”，^③“新文化史”和“新政治史”研究又呈方兴未艾之势，西方学界的“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作为冷战的产物，必然逐渐走向衰落。

尽管如此，20世纪下半期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原因的阐释，仍对目前中国的俄国史学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俄国史时逐渐使用现代化理论、积极引进社会史研究方法，考察俄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④加上中国史学素有“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经世致用”传统，并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研究结构。因此，上述西方史学的理论转向和研究

① Steve Smith,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Europe-Asia Studies*, 1994, Vol.46, No.4, p.563.

② Jane Burbank, “Revisioning Imperial Russia”, *Slavic Review*, 1993, Vol.52, No.3, pp.555-567.

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解体后西方学界在“十月革命史研究”方面遭受了学术枯竭的境遇。近十年来的西方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 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The First Year of Soviet Rule in Petrogra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S.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S.A. Smith, *Russia in Revolution: An Empire in Crisis, 1890-192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Joshua A. Sanborn, *Imperial Apocalypse: The Great Wa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Mark D. Steinbe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5-192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上述四位西方学者分别属于“传统政治史”流派、“现代化理论”流派、“新政治史”流派和“新文化史”流派的代表人物。

④ 张广翔、周嘉滢：“百年以来的中国俄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第108-128页。

焦点必将有助于深化中国学者对俄国史、美国史、冷战史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推进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Abstract】 Since the Cold War, political demands have led to the increasing prosperity of the discipline of Russian history with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During the 1950s and the 1990s, when exploring causes of Russian Emancipation Reform in 1861, western scholars usually tended to interpret the important role of Russian national institutes through theories such as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the Bureaucracy Theory, sociological historic approaches and case studies. Based on these methodologies, Western scholars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n landlords and peasants under serfdom, and also revised some Soviet offici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model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1917 Paradigm” and the rise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New Political History”, the totalitarianism paradigm and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have faced challenges. There emerged a decline of Western researches on Russian refo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Western researches on Russian Emancipation Reform in 1861, in essence, is the result of the Cold War.

【Key Words】 Russian Emancipation Reform in 1861, Russian Serfdom, The Issue of Russian Peasants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рост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В 50–90-х годах 20 века, изучая причины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реформы 1861 года, западные учё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л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ю,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ю, бюрократию и социальную историю России, применяя метод анализа отдельных случаев, провели анализ важной рол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усскими помещиками и крестьянами и изменили модель и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 упадком «парадигмы 1917 года» и ростом «нов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н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ыл брошен вызов тоталитарной парадигме и теор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и спа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форм 1861 г. западными учёными, по сути,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с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в России в 1861 г.,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十月革命前俄国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探析*

徐广淼**

【内容提要】在十月革命前的三个多世纪里，俄国对北方海航道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探索。17世纪，“北方海航道”概念开始形成，18世纪的北方大考察，极大地推动了俄国人对北方海航道沿线的地理认知。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俄国开始尝试航道的商业利用。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俄国基本掌握了北方海航道的地理全貌，并最终实现了这一海上通道的全线通航。其北方海航道的贸易政策也逐渐由保守转向开放。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对北方海航道的探索成果，已经确立了苏联在航道地理认知、航行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并首次以对外声明的方式宣示了在北极的主权立场，从而为苏联时期继续开发北方海航道，明确提出航道的管辖权主张打下了基础，奠定了俄在航道管辖权问题上的传统主导地位。

【关键词】北方海航道 北极 科学考察 岛屿主权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5-0058(29)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016M600607）“中俄在北方海航道的合作研究”、武汉大学2017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俄两国海路运输战略演变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此外，本文还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16JZD029）“世界海洋大国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14JZD032）“中国参与极地治理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 徐广淼，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博士后；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北方海航道的概念与范围的确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目前在俄罗斯的官方定义中,北方海航道指的是北极东北航道中紧邻俄罗斯北部领土、西起喀拉海峡,东至白令海峡的航段和水域。^①在北极冰融和全球远洋航运日趋发展的当下,北方海航道的商业化利用,将对中国的经济布局、能源安全和航运业产生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北方海航道政策,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将这一贯通欧亚的北极海上航线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进行价值最大化地利用。俄罗斯近年来虽然提倡发展北方海航道的国际航运业务,将其打造成为“可与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相提并论的国际化航道”,然而在航道法律地位上却向来坚持对其拥有不容置疑的管辖权,称其为国内航线而非“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这一看似矛盾的政策主张背后,是俄罗斯作为北极大国历史上对北方海航道的考察政策、航运贸易政策以及管辖权主张演变的结果。因此,研究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政策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北极政策和航道主张的渊源,摸清政策走向,更好地把握俄罗斯在航道开发与利用事务中的核心利益和次要利益,以减少中国与俄罗斯在北极航道合作中的潜在冲突,并为中国对航道的利用扫清障碍,从而推动北方海航道早日实现“冰上丝绸之路”和“蓝色经济通道”的功能转变。

俄国学术界对十月革命前北方海航道的历史研究成果较丰富,也经历了久远的历史发展。但总体来看,其研究多集中于特定的时间段和航段,系统的梳理工作尚未完成。十月革命前,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国内关于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和北方海域考察的论著,经常为苏联时期和当今的学术论著所引用,但这一时期在对航道开辟、探险的历史梳理方面,断代现象较为明显。由于19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的发展,北极研究著作中使用的科学数据和绘制的地图开始比以往更加精准。^②19世纪中后期到十月革命前,俄

① 2012年俄罗斯联邦出台的《北方海航道法案》(又称《北方海航道商业航行国家管理个别法律条款修正案》)中,将北方海航道水域的准确地理范围描述为“西起热拉尼耶角的经线连接新地群岛、新地群岛东海岸线和马多奇金海峡、喀拉海峡和乌戈尔沙尔海峡西部界线,东到与美国的海洋划界线至白令海峡的杰日涅夫角之间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俄罗斯北方海岸的水域。” Закон о Северном морском пути. 28 июля 2012 года N 132-ФЗ.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http://www.nsr.ru/ru/zakon_o_smp/

② Фердинанд Ф.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еверным берегам Сибири и по ледовитому морю.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41.

国受海洋战略调整和日俄战争的影响,对北极的关注点放在了研究北方海航道全线航行的可能性上。^①苏联时期尤为重视对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的研究,确定对北方海航道探索与开发的历史是从16世纪开始的,出版了一批附有北方海航道自16世纪中叶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间的航行统计数据表等珍贵资料的论著。^②在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逐渐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苏联开始在历史中寻找证据,力图证明俄国在北极各海域、岛屿的长期存在,这类论著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对于俄国在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历史有详细的梳理,但其结论需辩证看待。^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术界对北方海航道开发的历史论著中的研究范围,多集中在较短的时间段中航道开发的某个方面,这些论著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苏联和苏联以前航道开发历史梳理中的细小但关键的问题研究上的缺失^④。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北方海航道、东北航道、北极航运等方面的研究热度有所提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现实关注的领域。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北极航道国际法地位的著作或文章,立场更倾向于认定北方海航道在国际法上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⑤国内学者探讨俄罗斯出台的北极航运、航道法律政策的文章结论,多倾向于指出俄罗斯关于北方海航道的立法与国际海洋法的冲突之处。^⑥2013年俄罗斯出台新的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之后,国内也有数篇文章分析了新规则与1990年规则之间在航道定义和航行

① Брейтфус Л. Морской сибирский путь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лаваний Карским морем и Сибирским Ледовитым Океано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4.

② Сибирцев Н, Итин В.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и Кар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е крае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6.

③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Белов М.И.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Том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й транспорт, 1956.

④ Гончаров А.Е.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Пономаренко С.А. Сибирь в войнах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атериалы Сибир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Красноярск: Резонанс, 2013; Матишов Г.Г. Комплекс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рктики по трасс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на атомных ледоколах (20 лет опыта ММБИ)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ЮНЦ РАН, 2014.

⑤ 郭培清等:《北极航道的国际问题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王泽林:《北极航道法律地位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⑥ 刘惠荣:“论俄罗斯对北方海航道的法律控制——兼论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冲突”,《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6-10页。

制度上的变化，介绍俄罗斯自苏联时期以来有关北方海航道的立法变迁。^① 同时也有中国学者明确指出北方海航道当前发展的症结，并对其战略转型提出建议^②。国内学者探讨北极航运开发对我国的战略影响及对策的文献，多从能源供给、外贸运输和科学考察等角度提出北极航运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并从港口布局、航运技术与人才储备、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政策建议。^③“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提出后，国内学者开始研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北极航线开发利用的新机遇。^④然而，国内学界从历史角度探讨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和北极航运开发进程的文献还很少，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北极海域的地理发现和北方海航道适航性的探索

俄罗斯在北极海域的探险与考察传统由来已久，15-17 世纪，官方组织下的零星探险在俄国形成了关于“北方海航道”的最初概念，18 世纪上半叶的北方大考察，极大地推动了对航道的地理认知，但无法克服的航行条件和技术难题，使俄国随之对航道的兴趣急转直下。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政府政策重新调整，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使这一时期的考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15-17 世纪：“北方海航道”概念的最初形成

俄国的北方领土和边界最初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⑤17 世纪末

① 张侠等：“从破冰船强制领航到许可证制度——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法律新变化分析”，《极地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268-275 页；白佳玉：“北极航道沿岸国航道管理法律法规变迁研究——从北极航道及所在水域法律地位之争谈起”，《社会科学》，2014 年第 8 期，第 86-95 页。

② 封帅：“利基航线、俱乐部物品与北方海航道开发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一个中方视角”，《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79-103 页。

③ 杨剑：“北极航道与中国北极政策定位”，《国际观察》，2014 年第 1 期，第 123-137 页。

④ 姜振军：“中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与双边经贸合作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41-47 页；刘惠荣：“‘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北极航线开发利用”，《中国工程科学》，2016 年第 2 期，第 111-118 页。

⑤ 本文中“俄国”这一国家名称的意义，指的是自 16 世纪末以来、领土囊括了当今俄罗斯版图中北方地区的国家政权。

以前，俄政府对北方海航道没有形成固定的概念，对于北方地区的地理认知也十分模糊，甚至存在很多误区，如“15-16世纪时人们曾认为沿着北方海岸到达鄂毕河口，不远处就是中国首都”。这一类说法很快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和航海探险的过程中被证伪。因此，15-17世纪的俄国官方北极探险，是以北方地理发现和探索北方海上通道为主要任务的。

沿白海和巴伦支海居住的早期居民，基于生活需要，对北方海域的探索要远远早于官方组织的探险。早在公元6-7世纪，部分斯拉夫人迁居至白海和巴伦支海沿岸，成为波莫瑞人（Поморье），意为“沿海居民”。波莫瑞人是最先对今俄罗斯西北部海域进行探险和从事航海活动的人群。不晚于15世纪时，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向西伯利亚北部的海上航路。因为西伯利亚北部盛产毛皮，这条海路从德维纳湾口（Двинская губа）开始，穿过乌戈尔沙尔海峡（Югорский шар），经过亚马尔半岛（Ямал полуостров）到达鄂毕湾（Обская губа），然后沿塔兹河（река Таз）南下。为了适应冰区的航行条件，波莫瑞人发明了名为“科契”（Поморский коч）的木制船，船身为圆形，船体外板还有双层的保护膜，有助于避免船身遭受冰块挤压。^①波莫瑞人对北方海域的探索，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造船技术经验，更重要的是绘制了一批航海图志。这些图志直到19世纪以前都被认为是白海海域最为详细的航海图志。

俄国官方对北方海域的探索则开始于12-15世纪，基辅罗斯分裂之后的俄罗斯西北部封建国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时期。^②据苏联史学家推断，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对俄欧北部进行了初步的经济开发，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对西伯利亚和新地群岛的最初探索。^③15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并入莫斯科公国，开始了有史料记载的官方北方海域探险。探险科考政策的形成过程，多为探险家或航海家向政府或当权者（大公或沙皇）提出考察方案和构想，

①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ГИДРОМЕТ, 2008. С.7.

② 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136-1478年。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西北北部名城，最初为基辅罗斯的一个王公政权，后于1136年完全脱离了基辅大公的控制，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共和国存在了300多年，最终并入统一的俄罗斯国家。

③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ах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10.

政府或当权者下令开展探险考察并提供物资支持，考察的成果多以绘图和日志的形式记载下来。

莫斯科公国时期在北方沿海分别开辟了向西和向东两个方向的海路。1647年，为了寻找海象栖息处，同时也为了与楚科奇人进行贸易往来，俄国沙皇派以费多特·波波夫（Федот Попов）和谢苗·杰日尼奥夫（Семен Дежнев）为首的考察船队，沿北方海岸向东进行远征探险。然而由于该年冰情条件十分恶劣，探险以失败告终。次年，考察队乘7艘科契船重新启航，但只有6艘船成功到达了陆地最东端，并且船只多少都遭受到了海上暴风的损坏，只有杰日尼奥夫率领的一艘船行驶到了阿纳德尔河口（река Анадырь），并乘小船到达该河中游并在此建立了阿纳德尔河尖柱城堡。^①杰日尼奥夫在向沙皇的呈文中描述了从科雷马（Кольма）到楚科奇半岛（Чуко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附近的航行，证明了亚洲和美洲大陆之间海峡的存在。亚欧大陆最东北端的海角就此被命名为杰日尼奥夫角。^②

因此，直到17世纪，俄国才通过探险初步确定了“沿着北方海岸能够从欧洲通向亚洲”^③的海上航路的存在，并初步形成了“北方海航道”（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的概念。

15-17世纪俄国对北方海航道的探索仅停留在起步阶段，官方探险规模极小，探险过程中没有形成对北方地区成体系的研究，没有准确的地理知识作为基础，也没有现代的造船技术作为支撑，成果也十分有限。再加上恶劣的冰情条件，北方海航道这条海上航路一度成了难以征服的传说。然而探险的结果却形成了俄国对其北方边界和海域的最初认知，是俄国这个对土地和海洋充满扩张欲望的国家认识和继续探索北方海航道的前奏和铺垫。

（二）18世纪上半叶：北方大考察与北极海域地理认知的深化

17-18世纪，随着俄国在西伯利亚的进一步扩张，以及一系列地理发现、

① 尖柱城堡：又名尖柱寨堡，14-17世纪存在于莫斯科公国国家边界上。

②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ГИДРОМЕТ, 2008. С.9.

③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9.

探险考察的开展，俄国对北方海岸以及北方海航道的认识开始更加清晰。俄国重新认识到，从欧洲沿着漫长的北部海岸是有海路可以到达勘察加半岛（Камча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和中国的。18 世纪上半叶俄国在两次堪察加探险中，不仅命名了白令海峡（Берингов пролив），还极大地增进了俄国对北方海岸和北极海域地理面貌的认知。这一时期俄国的北方探险已经不再是对北方海岸和北极海域零星的探索，而是初具规模、以地理发现和探索航道为目的的系列探险，是使北部边界的走向和大小岛屿、海峡的存在逐渐清晰的过程。

1724 年，沙皇彼得一世下达了进行北极探险的命令，并任命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Витус Беринг）为探险队长。探险队于 1727 年夏天乘船穿过鄂霍次克海，并在勘察加半岛建立了探险基地。同年 7 月 16 日，白令探险队抵达美洲海岸，再次证明了美洲和亚洲之间的海峡的存在，并发现了阿拉斯加和几群无名岛屿。他们随后命名该海峡为白令海峡。这次探险，史称第一次勘察加探险。

受到第一次勘察加探险成功的鼓舞，1733 年，俄国又进行了第二次勘察加探险。这次探险活动延续了十年之久，由于其历时长，规模大，且成果丰硕，后被誉为“北方大考察”。

北方大考察是在 1733-1743 年的十年间进行的，也是由白令率领。这次考察分有多个支队，按地理考察区域，从西向东分别有德文斯克—鄂毕支队、鄂毕—叶尼塞支队、勒拿—哈坦加支队、勒拿河以东支队以及太平洋支队。^①考察有三大任务，分别是查明沿北方海岸横贯航行的可能性、发现美洲大陆和寻找从勘察加到日本的海路。考察的具体内容包括：其一，对勘察加半岛内陆和沿岸的调查、对北部海岸进行勘察并沿北部海岸试航，同时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广阔地区进行深入研究；其二，绘制地图并标示出从阿尔汉格尔斯克（Архангельск）到亚洲大陆东北角海岸的确切走向、收集汇入北冰洋的河流的相关信息、收集北部地区动植物和当地居民以及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等。

^①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590-591.

北方大考察的 10 年间，考察队在绘制北方海岸的地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确定了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楚科奇的航道线路。这些地图对后来北方海航道的探索 and 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此次考察共留下了 62 幅西伯利亚与勘察加地区的地图，也是第一批利用工具测量的北部海岸较为准确的地图。因当时测量工具精确度的限制，这批地图虽存在一些不足与错误，但其精准度已是 17 世纪的草图手稿远远不能相比的，而且考察的总图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绘图工具和考察收集来的所有地理信息。1753 年，俄国科学院在总图的基础上绘制出了更为精准的最终版本的总图，并于 1758 年出版。

北方大考察的另一个成果，是使俄国对西伯利亚、极北地区和北太平洋的地理认知大大加深，并且在这一领域赶超过了当时的西欧。考察期间，各支队对不同区段的海底进行了深度测量，并研究冰层、海水流动、潮汐等现象，为俄国海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有专家单独对西伯利亚的民族和历史进行研究。考察的成果在随后的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在实践中被使用，并不断地进行更正和补充。俄国随后的北方考察在出发前都会大量研究北方大考察的成果作为考察基础，而之后的那些考察成果也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北方大考察成果的修正。

北方大考察也使俄国进一步了解了北方海航道东段航行的困难程度。考察之前的地图上显示的北方海航道东段比实际航程要短，并且看上去更易通行。而北方大考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东段航行的诸多困难，从皮亚西纳（Пясина）到哈坦加（Хатанга）和从科雷马到阿纳德尔两个航段长期布满密集的冰块，以当时的造船和航行技术很难通过。基于这样的分析，18 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俄国不再有人向政府提议沿西伯利亚海岸开辟航路，而在北方大考察之前，这样的提案有十余个。^②

① Рябчикова В.И., Комедчиков Н.Н., Кривов С.В., Логинова Л.В.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й и кар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северных отрядов «Второй камча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1733-1743 годах.// Гавзов А.В., Раменский П.А.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от прошлого к будущему. Архангельск: ИПЦ САФУ, 2012. С.49-50.

②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332-337.

俄国虽然没能在 18 世纪解决沿北方海岸横贯航行的问题，但 17-18 世纪的北方考察实际上解决了许多航道东段开发的先决问题，俄国对北部地理方面的认知也有了极大的更新。这一时期的地图上已经清晰标明了新地群岛的尤日内岛（остров Южный）、马托奇金海峡（Маточкин Шар）、瓦伊加奇岛（остров Вайгач）、乌戈尔沙尔海峡、喀拉湾（Карский залив）和拜达拉塔湾（Байдарацкая губа）、别雷岛（Белый остров）、鄂毕河口和塔兹湾、格达半岛（Гыдан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叶尼塞河口（устье Енисей）和叶尼塞岛、泰梅尔半岛（полуостров Таймыр）、大别吉切夫岛（Бегичева Большой остров）、勒拿三角洲（дельта Лены）及其附近岛屿、圣角（Святой Нос）、利亚霍夫群岛（Ляховские острова）、科捷内岛（Котельный остров）、熊岛群岛（Медвежьи острова）、恰翁湾（Чаунская губа）、杰日尼奥夫角（мыс Дежнева）、白令海峡、楚科奇角（Чукотский мыс）、圣劳伦斯岛（остров Святого Лаврентия）、克列斯特湾（залив Креста）、阿纳德尔河口和勘察加等地。这足以证明，整个 18 世纪俄国对北部地区以及北部沿岸、附近岛屿、北方海航道的认知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当代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北极的认知能与俄国相比。^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北极航海非常重要的维利基茨基海峡（пролив Вилькицкого）并没有出现在 18 世纪的地图上。但是已有的了解已足够俄国以国民经济发展为目的进行北部和西伯利亚的资源开发了。

（三）罗蒙诺索夫对海冰和高纬航道的研究与探索

俄国著名学者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 М.В.）对 18 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北极海域探险和北极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仅推动了俄国的北极地理、海冰研究的发展，并在其著作中多次阐明北方海航道对西伯利亚开发的重要意义，还多次提出北极考察方案。他的北方海航道高纬航线（высокоширотная трасса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构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为出生在北方沿海地区的波莫瑞人，罗蒙诺索夫从小便跟随家人出海

^①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441-442.

航行，对北极的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深厚的感情。在他长达二十年的在该领域的研究生涯中，著有《北方海域探险概述和从西伯利亚沿海到印度的可能出现的航路的记载》（1763）（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разных путешествий по северным морям и показание возможного проходу Сибирским океаном в Восточную Индию）一书和与其他一些有关的文章，全面反映了俄国以及西欧在 18 世纪中期北极航运的发展。这一著作奠定了他世界上首位极地地理研究者和北冰洋科学研究奠基者的身份。^①罗蒙诺索夫在北极地理研究中首次对北极冰进行了分类。在其著作《北极海域冰山形成概述》（«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ледяных гор в северных морях»）中，他将北极冰分为海冰（在海面上自然形成的薄冰、初冰）、河冰（注入北冰洋河流河口的冰野、冰丘等二级冰）和冰川冰（陡峭的海岸边形成的山冰和瀑布冰），这一分类和现代北极冰的分类已十分相近。罗蒙诺索夫还研究北冰洋海流并提出了北冰洋海冰漂浮的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化石冰及相关概念，他对北极冰的研究比英国早了 60 年。然而，罗蒙诺索夫在北极冰的研究中存在一大误区，即当时他认为北极海冰是可以在一个夏季全部融化的。^②

罗蒙诺索夫提出了从斯匹茨卑尔根群岛（Шпицберген）和新地群岛向北航行的可能性，还在其有生之年提议并参与组织了两次极地考察。1755 年，罗蒙诺索夫第一次向政府提出北方海航道和西伯利亚考察计划，但并没有立即获得政府的响应。当时俄国正准备与普鲁士进行战争，守卫其在波罗的海的势力范围。战争结束后，当罗蒙诺索夫再次提出北方海航道的考察计划，并呈交《北方海域探险概述和从西伯利亚沿海到印度的可能出现的航路的记载》一文时，正值俄国海船舰队委员会成立，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批准了这一决定。^③这次考察于 1764 年正式开始，目的是寻找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向西穿过北冰洋到达勘察加的海上通道。考察使用的船只是专门设计的，具有双层防护外板，能够防止海冰对船体的损坏。1765 年的北极海域冰情条

① Перевалов В.А. Ломоносов и Арктика.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лавсевморпути, 1949. С.10.

② Там же. С.16.

③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361-363.

件相对恶劣，考察队只航行到斯匹茨卑尔根群岛。1766 年考察船队想尝试驶入北极的中央海域，结果也以失败告终。^①

现在看来，虽然罗蒙诺索夫在当时提出关于北极海冰和航道的观点并不十分准确，他所提议的考察也以失败告终。但总体上看，罗蒙诺索夫在俄国对北极地理环境和北极海冰的认识、北方海航道概念的形成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早在 200 多年前，罗蒙诺索夫就已提出北方海航道的开通可以使西伯利亚丰富的资源获得开发，也能够沿岸发展商贸，同时该航道还是通向东方最近的路线。他的高纬度海域考察是俄国进行的第一次北极海域高纬航行考察，给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然而罗蒙诺索夫提出的考察计划的失败再次证明了，北方海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仍不适宜航行。俄国政府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了开发北冰洋高纬度航线的想法，^②国家战略目光开始调转向南，整个 18 世纪后半叶到 19 世纪中期以前，俄国再没有在北极考察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此同时，由于考察船只缺乏且装备落后，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进行西伯利亚北部的综合考察，只对新地群岛和楚科奇半岛作了单独的海洋考察。^③18 世纪中期以后，俄国对北方考察的兴趣的衰减也反映到俄国北部地图的变化发展中。18 世纪末期的俄国北部地图与 18 世纪初相比变化巨大，而与 19 世纪甚至二十世纪使用的北部地图则差别不大。^④而俄国对北方考察兴趣的减弱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60 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结束。

（四）19 世纪中叶以后：政策转变、技术与航道考察的突破

对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俄国来说，与北部地区形成稳定的政治联系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再次失去了打通黑海出海口的机会。1872 年俄国转让阿拉斯加后，俄国在东北部的国家利益和影响力

①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ГИДРОМЕТ, 2008. С.11.

②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336-337.

③ Там же. С.444-445.

④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441.

受到了美国的威胁，因而急于恢复其在亚洲东北部和远东的势力。此时，俄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和发展海军舰队的需要，又被迫将视野重新调转向北，对北极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而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其寻找新的自然资源产地和销售市场。而要开发新的市场，建立有效的交通联系是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方海航道再次受到政府的关注。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的考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获得的成果也更加丰硕。19 世纪上半叶是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在极地科学研究方面，数学、物理、化学、航海学和医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都对极地科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俄国地理海洋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也为俄国北极考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技术条件。地理科学在这一时期分出水文地理学、地图学、气象学、历史地理学、海洋学、航海学等多个分支学科。俄国在组织北方考察时也开始开展单独的海洋学和气象学研究，观察海水流动，测量水文和水深。绘制地图时也开始使用更加完善的仪器。

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都断断续续在北方海航道进行科学考察活动。主要包括打造破冰船、积极开展北方海航道的适航性考察以及初步建成北极气象观测网络几个方面。

19 世纪后半叶，俄国重新开启了停顿多年的北方考察事业。然而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和国力限制，这一时期除了 1870 年的新地群岛考察和派出两艘战舰之外，俄国在北方并无较大动作。直到 1900 年，彼得堡科学院组织考察队，乘帆船“霞光”号（Парусно-моторная шхуна «Заря»）进行对新西伯利亚群岛的考察。该考察持续了两年之久，考察队在西北部海岸泰梅尔半岛和西部海岸的科捷内岛完成了一系列的水文、物理、地理探测。1902 年秋，该船因没能穿过冰层而沉没。这次严重事故直接证明了在北方海航道使用破冰船的重要性。

俄国在 19 世纪最后几年开始了建造破冰船的尝试。在政府的指令下，1899 年，俄国第一艘北极常备破冰船建成并投入使用，命名为“叶尔马克”号（Ледокол «Ермак»），该艘破冰船也是世界上第一艘能够通过坚硬冰盖的船只。1909 年，位于彼得堡的造船厂又成功建成“泰梅尔”号（«Таймыр»）

和“瓦伊加奇”(«Вайгач»)号两艘新破冰船,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科考和水文探测设备。从1910年到1915年,两艘破冰船共完成了5次北部沿岸航行。^①考察人员夏季利用破冰船在西伯利亚沿岸进行绘制地图、信息采集等工作,而冬天则将破冰船停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越冬。^②

俄国在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破冰船,还与当时日俄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的远东形势有关。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极其薄弱,极大地影响了其维护该地区主权的能力。而且,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在楚科奇进行商业往来,美国通过白令海峡即可到达楚科奇,相比于俄国需要沿西伯利亚漫长的海岸向东才能到达,美国扩大在楚科奇的影响力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俄国计划通过破冰船解决到达楚科奇的交通这一难题。

建造破冰船最为重要的目的,是探索北方海航道的适航性,即能否在一个通航期内不进行越冬就完成全线航行。因为实践证明,在北方海域开展过境运输和向西伯利亚北部运送生活物资,离不开破冰船的支持。1913-1914年,破冰船队的尝试失败了,船被卡在了切柳斯金角(мыс Челюскин)附近的冰面上而不得不在当地越冬。考察队在本次航行中发现了北地群岛(Северная Земля)。北地群岛与俄罗斯最北端的半岛——泰梅尔半岛仅隔着极窄的维利基茨基海峡,然而直到这次水文地理考察时才偶然被发现,这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发现之一。该群岛最先被命名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群岛,1926年苏联政府将其更名为北地群岛。^③

20世纪初期,俄国就曾计划将北方海航道转变为常规海上交通线路。这一时期俄国对北方海岸和北方海域的地理认知达到了较高水平,也掌握了破冰船技术,因此开始尝试通过考察证明航道的适航性,考察成果也不再以地理发现为主。这一时期统筹研究北方海域的航行条件、全面组织考察的机构是北冰洋水文地理考察组织,参与该组织的都是具有北方海域航行经验的

①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ГИДРОМЕТ, 2008. С.12-14.

② Pier Horensma, *The Soviet Arct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15.

③ Жохов А.Д., Жухова Н.В., Зайцева Н.А., Ушакова М.Г.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Архипелага Северная земля// Гавзов А.В., Раменский П.А.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от прошлого к будущему. Архангельск: ИПЦ САФУ, 2012. С.53-55.

水文工作者。^①1911年，考察队首次从西向东到达科雷马流域，自此确立了到达该流域的常规航线。1914–1915年，该组织进行了俄国首次沿北方海航道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至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自东向西航行，并在维利基茨基海峡附近越冬。航行过程中考察队进行了水文探测，收集了大量地理和生物数据，考察成果汇集成更为详细的航海地图和指南，更加准确地标注了北部海岸和岛屿的位置。在考察地段新发现的一些岛屿也逐一标注，包括小泰梅尔岛、若霍夫岛（остров Жохова）等。至此，俄罗斯北方海域的岛屿已全部完成了地理发现，也完成了北方海航道全线自西向东和自东向西的航行。

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还初步建成了北极气象观测网络，对北极海域航行起到了保障作用。俄国第一个由24个观测站组成的气象观测网络是北方大考察时期建成的，但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1834年，俄国建立了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7个地磁气象观测站，初步形成了气象观测网络。19世纪，俄国在新地群岛、巴伦支海与白海、弗兰格尔岛和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白令海峡、阿拉斯加等地考察时，分别在这些地区进行过气象观测，为俄国对北部地区气候的了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875年，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земля Франца-Иосифа）的发现人之一卡尔·瓦伊普列赫特（Karl Weyprecht），在维也纳科学会议上提出建立北极气象观测站的国际网络的建议。这一提议随即获得了欧洲、俄国和美国学者的响应，也促成了1882–1883年第一个国际极地年活动的开展。俄国、芬兰、荷兰、挪威、瑞典、奥匈帝国、丹麦、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参与到该活动中。这些国家在极地年框架下，在北极组建了12个水文气象观测站（在南极建立了2个水文气象观测站）。其中，有两个北极气象观测站是由俄国建立的，分别位于新地群岛和勒拿河河口。新地群岛观测站的气象观测于1882年9月1日开始，持续了整整一年。1896年，该观测站重新启用并沿用至今。1914年，俄国政府进行喀拉海域水文地理考察时，于次年8月开始短暂使用位于季克松岛上的无线电站，该站在1916年恢复使

^①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ГИДРОМЕТ, 2008. С.14.

用之后一直沿用至今。^①

相比于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上半叶，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国家支持的北极科考数量明显增加，规模也更大。虽然因俄国国内政局不稳，考察偶尔会因国家财力支持不济而陷入窘境，也常被战争中断，之前的考察成果也未能得到及时整理，然而这一时期的北方考察基本完成了几个世纪以来北极海域考察的地理发现任务，北方海航道的大体范围也在地理形式上确定了下来，并完成了全线航行的考察任务。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北极探险与考察以地理发现和航路探索为主要任务，旨在满足领土扩张、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目标的需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俄国基本掌握了北方海航道的地理面貌，完成了一系列的地理发现，并随着科学技术知识的提升最终完成了这一海上通道的全线航行，证明了航道的适航性。十月革命前俄国对北方海航道的考察获得了诸多成果，这些成果奠定了之后苏联和俄罗斯在航道地理认知、航运技术上远超其他国家的领先水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在航道管辖与利用上的传统主导地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俄国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实现在一个通航期内（不进行越冬）完成航道全线航行的目标，北方海航道的地理范围也并未通过法律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

二、北方海航道航运贸易政策的国家实践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北方海航道航运和北方地区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经历了一个从保守闭关到被动开放的过程。17-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在北方海航道航运贸易中的政策总体上呈现“闭关保守”的态势，而历经了克里米亚战争、农奴制改革、外国商业航行和进口贸易的冲击以及 20 世纪初日俄战争的失败之后，19 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对北方海航道航运贸易的政策，开始由“闭关保守”走向被动开放。

^① Катин Ю.Н. История полярных станций в западном сектор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и// Гавзов А.В, Раменский П.А.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от прошлого к будущему. Архангельск: ИПЦ САФУ, 2012. С.134.

（一）17-19 世纪上半叶俄国的北方海航道航运贸易政策

17 世纪初，随着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一系列地理发现、探险考察的进展，俄国对北方海岸以及北方海航道的认识开始成形。但无论是从技术上、气候上还是认识上来讲，当时的俄国都还远远没有具备进行常规航行的条件。加上当时俄国对于航道各海域以及沿岸的地理知识尚十分缺乏，而英国、荷兰等国家的船只和商人已经开始在航道东段和相关海域活动，面对西方国家在北方海域对俄国形成的经济竞争和利益威胁，17-19 世纪上半叶间，俄国对北方海航道总体上采取了保守、封闭的航运贸易政策。

俄国于 1605 年左右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吞并，并开始大量获取西伯利亚毛皮。毛皮商贩往往充当先行者的角色，为军队和官员开路。随后西方国家也开始购买商贩经由喀拉海运输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毛皮，再转销欧洲。为了防止英国与荷兰参与西伯利亚毛皮交易的竞争，1619 年，沙皇米哈依尔·罗曼诺夫（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下令禁止海路运输并封锁喀拉海域。^①因此，商贩们转而进行大陆上的水陆联运。^②

1704 年，沙皇政府决定集中运输途径以便在北方建立海关监督，再次下令往来西伯利亚的商业运输只能使用陆路。这一命令对通往西伯利亚的海航道商业航运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欧俄北部沿海居民把该命令理解为政府禁止通过海上航线前往鄂毕河和塔兹河河口等地。该命令一直持续了整个 18 世纪，不仅阻碍了本国商队对北方海航道商业航行的探索，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沿海经商的积极性。^③

1733-1743 年间的北方大考察时期，俄国在阿留申群岛和科曼多岛上发现了海洋兽类，之后开始陆续有商人和商业公司到该地收购毛皮。1745 年，俄国在阿留申群岛建立了狩猎基地，从而开启了俄国在阿拉斯加的殖民时期。而进入 19 世纪后，随着农奴制的瓦解和反击拿破仑的战争准备的开展，俄国在亚洲东北部和阿拉斯加事务上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经济影响力在该地

①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ГИДРОМЕТ, 2008. С.8.

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编写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66 页。

③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235-236.

区明显减弱。

早在 1818 年，英国在阿拉斯加成立了哈德逊湾公司，美国人也从美国哥伦比亚河流域到达阿拉斯加。两国势力开始渗入阿拉斯加和亚洲东北部地区。美国人还到楚科奇半岛与当地人进行交易。19 世纪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捕鲸船只进入俄国水域的禁渔禁猎区，并向土著居民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反抗俄国殖民者。^①为了维护在阿拉斯加和亚洲东北部的地位和经济利益，俄国不得不在该地区推行贸易保护与航行限制政策。

1821 年，俄国枢密院颁布了《实施关于东西伯利亚、美洲西北部、阿留申岛、千岛群岛等地区的航行边界和沿海往来规定的决议》的法令^②。该法令规定：“在以上地区岛屿、沿岸港口、海湾和美洲整个西北沿岸……包括阿留申岛和整个西伯利亚沿岸进行贸易、捕鲸捕鱼、工业活动的权利，由俄国臣民享有，禁止外国船只停靠以上俄属海岸及岛屿。”^③此外，该法令还禁止外国船只在北纬 51° 以北的海域航行。^④俄美公司还向沙皇政府提出派军舰在太平洋海域巡航的请求，并请求政府采取措施对抗英美在阿拉斯加的势力入侵。然而此时沙俄政府忙于应付欧洲事务，只是从喀琅施塔得派出一艘巡洋舰去进行巡航。一艘巡洋舰的监管力度远远不够，俄国政府却并没有采取后续措施。

该政策的实施仅仅维持了三年。1824–1825 年，迫于英美的政治压力，俄国与英美签署了《俄美贸易、航行与捕鱼公约》^⑤与《俄英公约》^⑥，同意英美船只自由出入太平洋上的俄属海域。^⑦至此，英美两国经济势力在东

①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454-458.

② Указ о приведении в исполнени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 пределах плавания и о порядке примор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вдоль берего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Америки и островов Алеутских, Курильских и проч.

③ Иванов И.С. Арктический регион: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Том 3. Применимые правовые источн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Москва: АСПЕНТ ПРЕСС, 2013. С.230-241.

④ Паламарчук П.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режим море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ектора Аркти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равопорядок. М, 1981. С.114.

⑤ Конвенция о торговл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и и рыбной ловл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1824 г.

⑥ Русско-англий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1825 г.

⑦ Гакель Я.Я.,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Чернеко М.Б. Арктическое мореплавание в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454-456.

北部的渗入越发明显，直至 1867 年，俄国被迫将阿拉斯加及附属岛屿转让给美国。

17-19 世纪上半叶，沙皇政府以抵抗西方势力渗透为目的，以颁布法令的形式针对北方海航道的个别航段采取了封锁海域、建立海关监督以及贸易保护和航行限制的航运贸易政策。而政策的执行情况却越来越不乐观。一方面，科学技术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航道进行商业性利用的可能性在提高，西方探索北方海航道的热情也逐渐高涨；另一方面，到了 19 世纪，俄国国力日益衰弱，在北方海航道东段的影响力与政策执行力逐渐无法与英美势力抗衡。俄国在北方海航道的航行贸易保护政策失去了执行所需的财力、物力、人力保障，因此，这一“封闭保守”的航运贸易政策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被动地转变为开放。

（二）19 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运贸易政策的转变

19 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对北方海航道航运贸易政策由“封闭保守”向被动开放转变，是受到了时代的深刻影响。

一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和 1861 年农奴制改革的影响。对于十九世纪的俄国来说，与北部地区形成稳定的政治联系，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争夺黑海出海口的期望落空。南部无出海口的桎梏使俄国的地缘政治局面大大受限。俄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和发展海军舰队的需要，又被迫将视野重新调转向北，对北极政策重新进行调整。同时，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也使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巨大变化。俄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其寻找新的自然资源产地和销售市场。而要开发新的市场，建立交通联系是前提，于是北方海航道再次受到政府的关注。再加上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俄国更加意识到了开发北部出海口、发展北方海航道常规商业运输的重要性。

二是西方国家对北方海航道的商业航行考察使俄国意识到西伯利亚北部对外贸易发展机遇的来临。16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俄国曾多次尝试开发西伯利亚的海航线的商业航行。到了 19 世纪中叶，俄国科学界开始认为，喀拉海域冰情条件恶劣，并无商业通航的可能。然而这时，西方国家对北极

科学和航运、贸易的兴趣正在上升。^①19世纪末，欧洲对北极的了解开始增多，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如挪威、瑞典、英国、美国和德国开始向北方派遣考察团，考察巴伦支海渔业开发、斯匹茨卑尔根群岛上煤炭开采和捕鲸业发展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对北方海航道商业航行的兴趣也在增加。1874-1875年，英国和瑞典对西伯利亚航线进行了考察。这次考察虽然不具有任何商业性质，但航行线路对后来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887-1899年间，外国商业公司对西伯利亚航线的探索和商业试航开始兴起。喀拉海的商业航运多数是英国的货运业务，英国还为此成立了四家商业公司，利用英国政府的支持，采取港口交货的政策，增加货物的数量和品种来吸引西伯利亚市场。起初，英国西伯利亚航线的商航进展顺利，1893年开始变为每年一次，商队的规模也有所增加。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出于应对西方贸易竞争和发展西伯利亚交通吸引力的目的，俄国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于19世纪后20年开始投入到北方海航道的商业试航活动当中，俄国政府则开始对经由北方海航道运送至西伯利亚的进口货物实施免税政策，并在航运中采用港口交货制度，以提高西伯利亚市场的吸引力。然而，这些做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多次废立。

三是日俄战争的失败对俄国改变对北方海航道航运开发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于俄国的交通体系来说是一场残酷的考验。由于战场远离欧洲，俄国必须经由跨越欧亚的交通要道输送武器装备。刚建成不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被认为是经过完善的工程设计的，但面对战争时期巨大的军物流，仍然显得不堪重负。由于军用货物的运输占去了西伯利亚商品运输的空间，西伯利亚在日俄战争时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贸易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贸易持续亏损，人口也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西伯利亚铁路自身运作和建设所需的钢轨、机器和储备物件也需通过铁路运输，军事物资挤占了这些物件运输的空间，西伯利亚大铁路因超负荷的运输量和设备缺乏维护而几近瘫痪。

俄国太平洋舰队第一分舰队在1904年末被消灭后，俄国原来的军队后

^① Гончаров А.Е. История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870-е—1890-е гг.: Кандид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Кемерово: Кемер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3. С.207.

援保障便出现了严重问题。调遣舰队到远东战场，如果经过苏伊士运河，不但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沿线并不安全，很容易受到日本的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攻击。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局面，俄国政府决定尝试利用北方海航道这一当时唯一能利用的交通线，解决大吨位船只的航运问题。当时提出利用两条线路：一条是沿西伯利亚海岸，穿过新地群岛海峡到达白令海峡；另一条线路是通过喀拉海和鄂毕、叶尼塞河口，再经铁路运送至战场。^①

俄国航海协会曾在 1904 年提出方案，拟沿西伯利亚北部海岸新建 16 个常设的站点，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水文地理观测和绘图工作。同时还提出新建一批适合极地航行的船只。如果不能保证这些设施的建造，就不可能保障北方海航道的航行安全。有人提议利用破冰船进行横贯航行，然而这需要极好的航行条件和足够的燃料，可是破冰船叶尔马克号自身的吨位连全线航行所需的煤的重量都不能承担。因此，越冬成了必需的选择，而越冬导致的时间拖长则对战争更加不利。可以看出，这一方案对于不容浪费时间的远东战场来说极为冒险，沙皇政府最终还是决定由波罗的海分舰队绕道苏伊士运河到达远东战场。^②利用北方海航道调遣军舰和货物运输的计划也只停留在方案层面。这也是俄国在 20 世纪初面临的困境之一，即对于利用北方海航道进行交通运输并没有做好准备，而日俄战争的惨败恰恰证明了对于 20 世纪的俄国来说，北方海航道的航运开发势在必行。

因此，基于 19 世纪中期以来俄国面临的国内外发展困局，北方海航道的商业开发被政府重新提上了日程。

1876-1884 年间，北方海航道的商业航行考察主要以俄国国有、私有企业和一些国内外合资公司为主体，当时的考察在对喀拉海域、鄂毕河和叶尼塞河河口的水文地理研究上并不细致，航行的物资技术基础也不能满足考察任务的需求。1884-1899 年间的商业考察与航行中，俄国政府曾规划出北极常规航运的战略部署，包括利用专门船只对商船队进行破冰引航，着力打造适合引航的一批破冰船只，同时也采取进一步举措提升北方海岸港口的基础

① Гончаров А.Е.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Пономаренко С.А. Сибирь в войнах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атериалы Сибир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Красноярск: Резонанс, 2013. С. 86.

② Там же. С.88.

设施。这一时期的商业航行考察增加了俄国和西方对喀拉海域、鄂毕河和叶尼塞河河口以至于整个北方海航道东段海域的了解。

虽然日俄战争时通过北方海航道调遣军舰的方案流产，但也足以让沙皇政府认识到在丢失了黑海出口之后发展北方海航道运输对俄国的重要意义。在战争压力下，沙皇政府希望能通过任何能够利用的交通线路解决运输问题。因此，当 1905 年海上商业航行和港口管理局提出继续发展西伯利亚海上运输业务，然后通过叶尼塞河转运的方案时，政府决定支持。实施这一方案需要调遣船舰进入叶尼塞流域，政府因此决定成立叶尼塞河区舰队，^①并且于 1905 年组织了叶尼塞流域的考察。这一举动表明，北方海航道西伯利亚航段的国家运输业务因取消了港口交货制度而中断 11 年后，国家决定采取政策改善西伯利亚不堪重负的交通困局。这一时期北方海航道被誉为“西伯利亚第二大干线”，可以说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在国家政策中处于同等受重视的地位。然而叶尼塞河区舰队在北方海航道的运输过程中并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政府在该项计划上明显入不敷出。在成功进行完叶尼塞的考察活动之后，有六年时间喀拉海域停止了货运。自 1906 年开始，就有人向政府提议，将轮船卖给私人。^②到了 1910，叶尼塞河区舰队每年的亏损都会超过 10 万卢布。^③

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内外交困的国内外环境，俄国对北方海航道航运的发展政策执行得并不如意，但北方海航道的航运数量较之前的历史时期都有大幅增加。1876-1919 年间，在北方海航道西段共进行过 122 次航行，其中有 86 次获得了成功。1911 年，航道东段开始进行从海参崴穿过白令海峡到科雷马河口的每年一次的航行，这时货船已经可在一个航期内将商品与粮食送至科雷马河流域。^④

（三）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走向开放的航运贸易政策

① Анонимый. Северная мор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на р. Енисей в 1905 г. СПб, 1905. С.12.

②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Управление внутренних водных путей и шоссейных дорог. Эксплуатационный отдел. I дел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15076 от 28 июня 1914 г.

③ Миронов В.О. О судоходстве к устью Енисея// Сибирские вопросы.1910. №.42. С.43.

④ Визе В.Ю.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М-Л, 1940. С.46-47.

19 世纪后 20 年间，西伯利亚北方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与国家对其进口货物的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港口交货制度（即在俄国北方港口交货）也对俄国极地航运和西伯利亚商品的输出有促进作用。

19 世纪 70 年代，外国对北方海航道商业航行的兴趣以及英国在西伯利亚的资本扩张，使俄国政府和企业倍感威胁，同时也刺激了俄国对西伯利亚和北方海航道投入商业和科研力量。因此，政府先是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以增强本国企业和商品的竞争力，并加快了在西伯利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包括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加快西伯利亚的工业发展，而这也要求北方海航道的商业海运线路的发展要与之匹配。然而，在国内通过北方海航道进行的商业运输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北方海航道商业航线的发展仍然需要外国商业航运来带动。这样一个背景，催生了俄国进口货物的免税政策和对外贸易的港口交货制度的产生。

北方海航道最初的商业通航是为了出口西伯利亚的石墨、木材和农产品等资源，但到后来发现进口工业产品的航运需求反而更大。1893 年前，运至西伯利亚的免税进口商品的种类相对来说已经非常丰富了，不但包括日常用品，还包括采金设备和一些奢侈品等。英国的商品也在与德国甚至俄国本土商品的竞争中式微，英国企业开始根据订单进行货物运输，西伯利亚的进口货物运输自此开始依赖订单和免税政策。

然而北方海航道开发的实践以及喀拉海域商业货运业务的开展，使俄国认识到自身在航运业务方面的落后，尤其是与英、德等国相比。俄国一些资本家利用帆船对喀拉海域的试航均以失败告终。实践表明，在已然落后的情况下，开发北方海航道如果没有国家系统性的支持是无法与外国竞争的。俄国官方航运在北冰洋海域发展落后，相应的国内的工业商品在北方地区也无法与英国竞争，这迫使俄国在 1894 年取消港口交货政策和进口货物免税政策，来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①而日俄战争后，为了吸引国外货物运到喀拉海域以填补因战争造成的国内运输不足，1905 年 4 月，沙俄政府决定对外国进口货物重新实行免税政策。叶尼塞斯克（Енисейск）成了军用物品和战

^① Гончаров А.Е. История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870-е—1890-е гг.: Кандид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Кемерово: Кемер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3. С.210-212.

时民用必需品的交货港口，一批企业和个人获得了运送免税进口商品的特权。但 1905 年仅有一家俄国公司进行了往来西伯利亚的商航，许多俄国货运公司将这一特权转卖给了外国公司。虽然俄国财政部承诺在西伯利亚众多河流河口延续港口交货的政策，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对北方海航道的利用明显减少。接下来，北方海航道的开发仅停留在科学讨论层面，也成了西伯利亚地方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工具。^①因此，1905 年俄国计划发展喀拉海域航道运输的计划和叶尼塞考察，并没有为北方海航道国家和私人货运业打下基础。

19 世纪后 20 年的北方海航道商业航行和对外贸易政策的相互作用，对北方海航道开发具有重要的影响。相较于之前，甚至和后来的苏联时期相比，该阶段的航运和贸易政策都相对开放，然而却也在开放与闭关之间不断反复，可见开放的有限性。但从客观上讲，这一时期航运和贸易政策的被动开放，促进了北方海航道的开发，促使其向海上交通干线转型，并且对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商品进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满足了当地对工业品的需求，但抑制了当地工业的发展。实践表明，这一“自由经济区”政策并没有带给俄国更多的实际利益，反而使西方的垄断集团及其在俄国的代理人最终获利。俄国在这一阶段以后严格限制外国公司和资本开发西伯利亚海航线，甚至整个俄国北部地区的开发都利用国有企业完成，而苏联则延续了这一政策。

日俄战争以后，沙俄政府认识到了北方海航道对于北方运输和商业贸易的重要意义，但其应对方案并没有突破以往的模式，而是将废止的进口商品免税政策重新启用，这说明俄国在这一时期对北方交通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应对国家危机的层面，缺少长远的计划和战略眼光。而之后沙俄政府在北冰洋开展的水文地理考察也被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北方海航道航运和北方地区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经历了一个从闭关保守到被动开放的过程。这与国际贸易几百年来发展趋势有关，也受俄国自身国力衰退的影响，无论是航运政策还是对外贸易政策，

^① Гончаров А.Е. История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870-е—1890-е гг. С.213.

也无论是选择保守还是开放的政策，每个时期政策的选择和转变都带有很大的被动性，政策的决定和转变都伴随着俄国自身发展与同外国竞争的关系中走不出的桎梏，并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缺乏航运贸易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

三、岛屿主权维护与航道管辖主张的基础

历史上，俄国视其比邻的北极海域和附近岛屿为其天然拥有的内海和领土，并未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声明其归属。这些海域和岛屿的地位在 19 世纪开始遭到来自欧洲的诸多挑战。沙皇俄国在二月革命前夕向一战盟国发布照会，宣布对北极诸多岛屿的主权主张，这一声明在当时并未遭到各国明确反对。因此，对于俄国的北极领土主权主张并不存在大的争议。然而，受时代以及海洋法的发展进程所限，俄国对其地理比邻的北极海域的法律地位，并未在这一时期以有效的国内或国际法律形式明确下来。

（一）北极岛屿争议的由来

位于喀拉海上的新地群岛早在 15 世纪被俄国北方沿海的波莫瑞人发现，后被俄国历代政权认为是其无可争辩的领土。然而在 1910 年，俄国对新地群岛的主权也受到了外国的挑战。这一年，俄国发现新地群岛北部有大量挪威居民居住。挪威将新地群岛北部视为无主地，其依据是 1860 年以前挪威在新地群岛的活动并未遭到俄国的反对。俄国随即对挪威提出抗议并要求迁走挪威居民，以免造成挪威对新地群岛北部的事实占领。^①与此同时，出售阿拉斯加后，美国势力又进一步在亚洲东北部海岸增强，这越发使俄国感受到其北部领土边界面临着来自东西两边的威胁。俄国在北方岛屿诸如新地群岛、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等地的主权权利也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俄国于 1916 年发布外交照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声明在北极的主权立场。

（二）1916 年的外交照会

^① Pier Horensma, *The Soviet Arct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12.

1915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之际，俄国海洋部长格里戈罗维奇（Григорович И.К.）向外交部长萨佐诺夫（Сазонов С.Д.）提议，俄国可以正式从法律上确定1913–1914年间维利基茨基（Вилькицкий Б.А.）领导的水文地理考察期间发现的和绘入地图的岛屿的俄国所属的地位。格里戈罗维奇还提议这些岛屿还应扩展至“虽不是俄国首先发现的，但与俄国领土比邻的岛屿。”^①这些岛屿包括：本尼特岛（остров Беннетта）、然涅特岛（остров Жаннетты）、亨里埃塔岛（остров Генриетты）、赫勒尔德岛（остров Геральд）和乌耶季涅尼耶岛（остров Уединения），同时还包括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该提议为基础，俄国外交部于1916年9月20日向所有一战盟国发出外交照会，宣布以上岛屿属于俄国领土。^②同时还在照会中强调，“新地群岛、科尔古耶夫岛、瓦加奇岛几百年来便是公认的俄国领土。”^③这一表态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备受瞩目。俄罗斯有学者认为，这一做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宣布了占领某一特定领土的历史法律基础原则”。^④

值得注意的是，1909–1910年的俄国和挪威的外交危机发生时，特罗姆瑟商船船长联盟曾表示，“新地群岛与格陵兰岛、斯匹茨卑尔根群岛和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一样属于无主地”，然而1916年的照会中并未提及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的法律归属。在随后的几年中，挪威曾据此对该群岛提出

① Письмо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ра России И.К. Григоровича министр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Д. Сазонову с просьбой принять меры к закреплению за Россией права владения землями, открытыми русскими моряками в Северном Ледовитом океане и Антарктике от 27 Февраля 1915 года. http://www.emaproject.com/lib_view.html?id=pb00003408#p2|1|n

②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 нотифик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ржав по вопросу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к России островов открытых капитаном Вилькицким и других островов в Северном Ледовитом океане от 20 Сентября 1916 года. http://www.emaproject.com/lib_view.html?id=pb00003412#p2|1|n; Циркулярноепредписа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Б.В. Штюрмер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 России за границей от 20 сентября 1916 года. http://www.emaproject.com/lib_view.html?id=pb00003411#p2|2|n

③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 нотифик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ржав по вопросу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к России островов открытых капитаном Вилькицким и других островов в Северном Ледовитом океане от 20 Сентября 1916 года. http://www.emaproject.com/lib_view.html?id=pb00003412#p2|1|n.

④ Голдин В.И. Арктик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е в XX-начале XXI вв// Вестник Северного(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1. №.2. С.22-34.

过主权要求。该群岛的俄属地位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时期才得以确定。

1916 年俄国的外交照会对苏联乃至现在的俄罗斯提出并维护其北方海航道管辖权的主张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次照会是俄国第一次准确确定自己的北部边界的官方声明，从法律上来讲，奠定了历史性权利在俄国北极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方面应用的开端，也为苏联乃至当今俄罗斯利用直线基线对北极部分海域提出内海主张和对北方海航道提出管辖权主张提供了历史基础。苏联时期也基本是利用这些岛屿划出领海直线基线，为自身寻求更广阔的内海空间，再结合“历史性海峡”的理论，从而将管辖权扩展至整个北方海航道水域^①。1916 年的外交照会发出后，没有一个收到照会的国家对该照会所描述的俄国北极领土提出明确反对。^②美国学者佩尔·豪瑞斯玛（Pier Horensma）评价 1916 照会时说：“俄国在该外交照会中对北方领土的清晰描述与对外宣布，成功地界定了自身的主权利益范围，虽然这一时期俄国在北极科学考察领域已经落后于西方，俄国北部也仍然是一片荒芜，但至少这一时期对于俄国在北极的领土主权已不存在大的争议。”^③

1916 年的俄国外交照会中虽清晰界定了俄国北部岛屿的主权归属，然而并未涉及岛屿附近的海域。相比于俄国极具扩张意识的北极领土政策来讲，十月革命前俄国对北极海洋权益的维护意识受时代所限而显得极其淡薄，相关政策缺乏清晰目标和长远战略。例如俄国虽然始终将喀拉海域视为其内海，然而西欧国家，尤其是挪威和英国坚持该海域为开放海域。关于 1619 年俄国沙皇关闭喀拉海的命令，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这是证明喀拉海为俄罗斯内海的有力历史证据，而西方学者则认为该命令并不能证明喀拉海就是俄国内海，原因是 1619 年以后西方国家的考察活动以及商业活动还不时在该海域出现，而当时俄国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④由此可见，1916 年的

① 虽然“北方海航道水域”的说法在俄罗斯官方文件中直到 2013 年才出现，但北方海航道自始至终没有固定的航线，航行过程中的航线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冰情条件。因此此处使用“北方海航道水域”的说法。

② Буник И.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е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морскому пути.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МИД РФ, 2007. С.92.

③ Pier Horensma, *The Soviet Arct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20.

④ Ibid.

俄国外交照会并未解决俄国北部岛屿附近的海域归属问题。

结 语

十月革命前俄国对北方海航道几百年的开发实践对苏联乃至当今俄罗斯的北方海航道的开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官方组织的系统和不系统的大小考察，最终确定了北极海域的地理面貌和北方海航道常用航线的大致地理范围（未通过法律明确），完成了北方海航道全线航行的探索，考察成果为苏联时期系统的北极开发打下了比其他国家更为坚实的科技基础，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在航道管辖与利用上的传统主导地位，也为俄罗斯在地缘上对北极的重视铸造了深厚的历史传统。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动荡变化，俄国通过制定和几经调整北方海航道航运贸易政策来发展和利用航道，在对外贸易方面开放航道的被动性，根本上源于国势衰弱，而一个强大的政权取而代之则势必又将对外关闭航道，北方海航道的国际航运业务发展也长期滞后，进一步影响了其基础设施等航行保障条件的建设。十月革命前俄国对北极岛屿主权的维护，从法律上来讲，奠定了历史性权利在俄国北极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应用的开端，也为苏联乃至当今俄罗斯利用直线基线对北极部分海域提出内海主张和对北方海航道提出管辖权主张提供了历史基础。总而言之，俄国早期对北方海航道的开发使俄国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北极领土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也为苏联和现今俄罗斯实施航道商业化开发方案、提出管辖权主张和成为北极考察技术领先强国奠定了基础。

【Abstract】 In the three odd centuries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Russia explored continuously the Northern Sea Route.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concept of “the Northern Sea Route” has emerged. While the 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greatly enriched Russian’s geographic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Northern Sea Rout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gether with changes in domestic political climate, Russia started to develop commercial values of the Northern

Sea Route. After several centuries' exploration, Russia has, on the whole, mastered the geographical profile of the Northern Sea Route while finally achieving full navigation of this sea passage. Its trade policy also changed from conservatism to openness. Russia's exploration of the Northern Sea Route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as established the Soviet Union's pioneering status on the global stage in geographical perceptions of routes and navigation technologies. Meanwhile, it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Russia claimed its sovereignty in the Arctic,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oviet Union's continuing developing the Northern Sea Route, proposing clearly to its governance power of the route and settling Russia's traditional dominance in governing the route.

【Key Words】 Northern Sea Route, the Arctic Pole, Scientific Expedition, Islandian Sovereignty

【Аннотация】 В течение более чем трёх веков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Россия проводила непрерыв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Уже в XVII веке начала складываться концепц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Северн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8-го век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у познанию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ей.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прогресс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и изменения во внутривосточ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привели Россию к коммерческим испытаниям водотоков. После нескольких столетий изучения Россия в основном понял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ую панораму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осознала значимость полного навигационного доступа к этой морской магистрали. Торг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раны на северном навигационном канал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ерешла от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й к открытой, начинается притязание н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над островами, прилегающими к северному побережью России. Автор приходит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дан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утвердили лидирующее место России в областях освоения и навигационной технологии на Северном морском пути, и заложили основу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освоения коммерческого судоходства на Северном морском пути в советские годы, заложили фундамент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беждения в юрисдикции над данным маршруто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Арктика, научн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над островами

(责任编辑 李恪)

俄（苏）外交

大陆帝国邂逅海洋文明： 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义*

封帅**

【内容提要】英国和俄罗斯的交往始于1553年，在400多年的时间里，英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17-18世纪，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对于英国的科技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模仿，英国则默许俄罗斯取代瑞典成为东欧最强的国家，两国保持着足够的默契和友好关系。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成为欧陆霸主，海陆帝国的竞争主导了19世纪的欧洲格局。最终两国在克里米亚兵戎相见，并且使俄国失去了欧陆霸权。进入20世纪以后，英俄帝国都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英国主动放弃了帝国，但也同时失去了全球大国的地位。而俄罗斯则通过建立苏联的方式，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维持大陆帝国的实际存在，但因为无力应付与海洋文明的整体性竞争，耗尽了内部的活力，最终也以解体而告终。冷战结束后，影响英俄关系走向的很多限制性要素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英俄两国几次尝试在双边关系上有所突破，但都无果而终。400多年累积下来的历史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前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英国国内对俄负面认知将长期存在，且英国对外政策仍在延续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核心的基本思路，英俄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仍然较低。如果这些历史形成的基本条件不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周边跨区域安全架构的理论模型与实现路径”（项目批准号：2016EGJ00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为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在文章初稿完成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的李冠杰博士针对英国史的部分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生变化，未来英俄关系缺乏互信、低位运行的状况将很难得到有效改变。

【关键词】英俄关系 大陆帝国 海洋帝国 英国外交 俄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56.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5-0087

(31)

引 论

一切都源于那次偶然的冒险。

1553年，历史还停留在那伟大的大航海时代。英国冒险家理查德·詹斯勒（Richard Chancellor）与休·威洛比（Huge Willoughby）率领的船队在不列颠扬帆起航，去探索那条传说中能够穿越北冰洋，最终到达亚洲的北方航线。然而，英国人显然严重低估了北极航行的难度，他们的船只在巴伦支海遇险，大部分船员不幸身亡。幸存者被当地人救起，辗转送到了莫斯科。令这些劫后余生的英国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在当地受到了非常热情周到的招待，甚至还得到了沙皇伊凡四世（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的接见。^①没过多久，他们就被送返英国，也将这个遥远国度最初的信息带回了伦敦。于是，一场原本失败的探险获得了全新的历史意义，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北极航道，但是他们却发现了俄罗斯。

这便是英俄关系的最初起点，从这一刻起，英俄两国开始了在世界舞台上长达几个世纪的命运纠葛。他们曾经成为盟友，也一度兵戎相见；在欧亚大陆间，两国曾经为了帝国的荣耀争霸不休，在欧洲平原上，两国也曾经共抗强敌，为了世界的和平奋勇作战。英伦三岛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理想楷模，是俄国贵族和知识精英梦想的应许之地；而苏联的魅力也曾令无数英国青年神往，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一度成为无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英俄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却深藏着涉及帝国体制与文明形态的历史逻辑，从根本上制约着英俄关系的走向。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英俄关系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

^① 参见 J. Hamel, *England and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Richard Chancellor, *Richard Chancellor's Discoveries in Russia 1553*, London: Pravda, 1998.

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范畴，两国的深度互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格局和外交政策，而且深刻地塑造了英俄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认知，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甚至社会文化。可以说，英国就像一面镜子，让俄罗斯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对于任何试图尝试深入理解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形态的研究而言，英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里，很多国家的研究者都对英俄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特别是英国、俄罗斯两国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为深入，其成果在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① 相比而言，在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英俄关系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直接涉及英俄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比较有限，在研究深度上也稍显不足。迄今为止，缺乏对于英俄关系长时段和系统性的梳理，对于英俄关系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次要素的挖掘也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②

① 国外学者关于英俄关系的研究包括 Giles Fletcher, *Of the Russe common wealth. Or, Maner of government of the Russe emperour, (commonly called the Emperour of Moskouia)*, at London, Printed by T. D. for Thomas Charde, 1591; J. Hamel, *England and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George Tolstoy,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Intercourse Between England and Russia: 1553-1593 (1875)*, Whitefish, Mo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Dominic Lieven, *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Battle for Europe, 1807 to 1814*, London: Allen Lane, 2009; Andrew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against Russia, 1853-56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1; Edward Carr,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Collection of 14 volumes, London: Macmillan, 1950-1978; Curtis Keele,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8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Молчанов Н.Н.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84; Отв. Ред. Г.А. Санин: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18 века. От северной Войны до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против Наполео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德]马克思,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257-306页; [德]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年, 第13-57页; [英]彼得·霍普柯克: 《大博弈: 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 张望、岸青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等等

② 目前, 中国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数量较少, 散见于俄、英外交史的研究中, 可参考潘兴明: “英俄纷争问题探因”, 《俄罗斯研究》, 2008年第2期, 第83-88页; 林军: 《俄罗斯外交史稿》,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孙成木、刘祖熙主编: 《俄国通史简编(两卷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钱乘旦主编: 《英国通史》(六卷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年; 封帅: “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英国学派——历史沿革、思想谱系与时代特征”, 《俄罗斯研究》, 2016年第3期, 第3-36页; 等等。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系统梳理英俄关系的历史进程为基础，深入挖掘掩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英俄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意义，并且展望英俄关系的未来走向。本研究尝试以长时段视角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剖析影响英俄关系变化的关键要素，希望能够对英俄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提供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为欧亚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

狡猾的学生与自大的老师：16-18 世纪的英俄关系

目前可考证的资料显示，至迟在 16 世纪 80 年代，英国与俄罗斯之间便已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早期英国社会各界对于俄罗斯的了解也多来源于英国驻俄外交官员。^①然而，在 16-17 世纪，在欧洲国家眼中，俄罗斯仅仅是一个僻处欧洲东部边缘的小国，在英国对外战略的排序中还在瑞典等欧洲强国之下，尚不足以对欧洲局势构成影响。^②因此，直到 17 世纪末，英俄之间才出现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

1697 年 3 月，由沙皇彼得一世（Петр I Алексеевич）亲自组织的俄国“大使团”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欧洲进行访问。对于该使团的主要目的，官方说法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反对土耳其的同盟，但实际上，彼得是要去亲自考察“他本人及其祖辈都未曾见过的欧洲政治生活，并且……按照欧洲国家的模式建立俄国政治军事制度”。^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得一世以随团军士的身份随同使团出访。于是，俄国沙皇第一次访英就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实现了。

1698 年初，彼得抵达伦敦，并在英国停留了 4 个多月。在此期间，彼得广泛走访了英国各地，“观看了军火厂和海军演习场……旁听了议会辩论，

① 这一时期对于俄罗斯最重要的介绍文章为 Giles Fletcher, *Of the Russe common wealth. Or, Maner of gouernement of the Russe emperour, (commonly called the Emperour of Moskouia)*, at London, Printed by T. D. for Thomas Charde, 1591.

② 早期英俄交往的信息可参见 George Tolstoy,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Intercourse Between England and Russia: 1553-1593 (1875)*, Whitefish, Mo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③ Отв. Ред. Г.А. Санин: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18 века. От северной Войны до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против Напалео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С.16.

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并到一些手工工场、学校、博物馆参观，访问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化人士”^①，在英国期间，他还离开伦敦访问了朴茨茅斯等重要港口，对于英国造船业显示了浓厚的兴趣。^②

这次短暂的英国之行对于俄罗斯历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英国所代表的欧洲社会的强大与繁荣，给彼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坚定了他在俄罗斯国内推动改革的决心。一方面，从 1699 年开始，彼得以欧洲制度为蓝本，对于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宗教和社会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③，使俄罗斯帝国迅速走上了现代国家的道路，并且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在访英之后，彼得改变了斯拉夫民族僻居内陆的传统，开始努力追逐海洋，“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④可以说，彼得对英国的访问是俄罗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西方影响了彼得，沙皇影响了俄罗斯，而俄国的现代化和复兴又极大地影响了欧洲”。^⑤诚如彼得一世在出访期间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是一名学生，正在为自己寻求老师”^⑥。英国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不经意间扮演起了引导俄国走向现代化的老师的角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模仿对象。为了加强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彼得仿照欧洲国家的模式创立了现代俄罗斯的外交体制，并

① 孙成木、刘祖熙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12 页。

② 彼得一世对于海洋的渴望在这次“大使团”访问过程中展露无余，在访问期间，他先后在英国与荷兰参观造船工厂，并亲自参与造船工作。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47 页。

④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21 页。

⑤ Молчанов Н.Н.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84. С.64.

⑥ Там же. С.68.

且大量任命欧洲国家的外交官主管俄国外交事务。^①

平心而论，俄罗斯是个出色而狡猾的学生，但这一时期的英国却显然是一个略显自大的老师。

出于对英国和海洋文明的学习和模仿，彼得对于拥有海洋和港口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为了获得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1700年，彼得对瑞典宣战，从而拉开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的序幕。在这场决定未来欧洲东部战略版图的斗争中，英国的态度却很令人玩味。

事实上，英国应该算是瑞典的盟友，就在1700年，英国与瑞典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②在瑞典击败丹麦，迫使其签署《特拉温达尔条约》并退出北方同盟时，英国还担任了条约的保证人。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英国对于北方战争的关注越来越少，即便是在明显瑞典可能在战争中遭遇失败的情况下，也并没有引起英国的重视。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俄罗斯已经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并于1712年迁都圣彼得堡，展现出对于波罗的海控制权的志在必得。到了1719年，面对瑞典即将全面失败的结果，英国政府才不得不有所动作，与瑞典缔结同盟条约，并且派出军舰进入波罗的海，但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军事措施来推动战局的转变。这种虚张声势的态度反而给了彼得更大的信心。1720年，俄军跨越波罗的海攻入瑞典本土，最终于1721年达成《尼什塔特和约》，北方战争以俄罗斯的全面胜利而告终。^③瑞典失去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领土和特权，也永远失去了大国地位。而俄罗斯帝国“像一只新下水的船只，在斧子的敲击和大炮的轰隆声中，驶向

① 因此恩格斯将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团队称为“现代的耶稣会”，并且认为“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参见[德]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3-57页。另外可参见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7-40页。还可参见 Отв. Ред. Г.А. Санин.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18 века. От северной Войны до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против Наполео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С.12.

②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中被转述，参见[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7-306页。

③ 北方战争的相关内容可参见 Отв. Ред. Г.А. Санин.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18 века. От северной Войны до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против Наполеона.以及[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1-65页。

欧洲列强的大家庭。”^①

作为欧洲海上霸主的英国，为什么要在北方战争期间默许俄国取代瑞典成为东欧的主导国家？这个问题从 18 世纪以来一直备受争议。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英国希望染指波罗的海的意图是明显的，正是北方战争的结果，改变了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独占波罗的海的局面。但英国选择俄罗斯的根本原因远不止于此，英国的外交精英绝对不会看不出俄罗斯更大的战略野心，但是英国的金融资本对于俄罗斯这个巨大的市场垂涎三尺，特别是在荷兰资本开始进入俄罗斯之后，英国更加希望加快进入俄罗斯的脚步，于是，已经开始衰落的瑞典帝国就成了英俄关系的祭品。^②

在马克思看来，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对俄国采取拉拢的政策，反对其他欧陆大国，这为俄国提供了参与欧洲事务的机会。^③“十八世纪下半期，俄英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俄国向英国出口的铁从占 75% 增加到 80%，大麻从 40% 增加到 58%，亚麻从 12.5% 增加到 60% 以上。英国造船工业需要的铁、木材、大麻、帆布，主要仰赖俄国的出口。俄国同英国的贸易始终保持顺差。”^④

这种默许俄罗斯帝国扩张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联合王国内心深处的傲慢自大，他们并不认为俄罗斯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会对他们的霸权构成威胁，甚至也不认为其能够成为欧洲的一流强国。他们坚信英国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控制俄罗斯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七年战争，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在东欧和黑海沿岸的持续扩张，英国都表示接受。“在那个世纪（18 世纪）的末尾，……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

① Молчанов Н.Н.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84. С.21.

②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53-330 页；还可参见陈乐民：“《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第 42-49 页。

③ 陈乐民：“《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 年第 4 期，第 46 页。

④ 孙成木、刘祖熙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17 页。相关信息还可参见 H.S.K. Kent, *War and Trade in Northern Seas: Anglo-Scandinavi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Mid-eighteen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①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都会嘲笑人类那不自量力的傲慢。18世纪末，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的局势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英俄关系的运行也逐渐开始脱离英国单边主导的轨道。

海陆帝国的争霸与结盟：1800-1917 年的英俄关系

对于英俄传统友好关系的第一次挑衅可以部分归结于保罗一世(Павел I Петрович)那略显任性的逆反心理。由于和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关系不佳，保罗对于俄罗斯之前所执行的政策都存有明显的芥蒂。虽然 1798 年 12 月俄国同英国在圣彼得堡缔结了新的同盟条约，并加入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但很快就因为马耳他岛的归属以及同奥地利的矛盾激化而退出了对法作战。1800 年 12 月，俄罗斯同瑞典、丹麦、普鲁士签订了武装中立条约，共同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英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实质性的危机。在保罗看来，“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体系的扩张……比法兰西的革命原则更加危及普遍的利益”。^②所以保罗决定与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和解，联法反英。为此，保罗向拿破仑提议，俄法联军从陆上穿越突厥斯坦地区远征印度。尽管这个计划由于过于异想天开而没有被拿破仑所接受，但保罗仍然于 1801 年坚持派军队前往印度。幸运的是，这场明显没有胜算的军事冒险最终因为保罗的突然死亡而终止。1801 年 3 月 23 日晚，亲英派军人发动政变，杀死了保罗一世，即位的亚历山大一世及时召回了即将陷入绝境的远征军。^③

作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最宠爱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就任沙皇以后，很快回到了祖母的外交路线上。1801 年 6 月，英俄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英俄海上协定》，缓和了一度紧张的英俄关系。虽

①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 267 页。

② Отв. Ред. Г.А. Санин.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18 века. От северной Войны до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против Наполеона. С.148.

③ 对于这次针对英国的军事冒险可参见[英]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年，第 48-54 页。

然亚历山大最初也希望维护在保罗时代建立起来的与法国的友好关系，并在1801年10月在巴黎签订了《俄法和约》，但两国关系还是因为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势力快速扩张而很快走向破裂。1805年，英俄在圣彼得堡再次签订同盟条约，俄罗斯加入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组织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并主导对法作战。然而，经过民族主义思想洗礼的法军的力量已经凌驾于所有欧陆国家之上。拿破仑凭借自己的军事天才，先后粉碎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并进抵俄国边境。1807年，俄法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亚历山大以出卖普鲁士的方式获得了宽松的停战条件，但代价是与英国断交，并加入大陆封锁体系。《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对于连战连败的俄罗斯帝国来说，算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俄罗斯获得了在东方的行动自由，至少可以部分补偿其在中欧地区所失去的势力。“它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①但这对于英俄传统友好关系来说，则是第二次的背弃。

然而，这一时期同英国断交并且加入大陆封锁体系的代价，对于俄罗斯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经过近百年的贸易往来，英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工业品的主要来源国，而俄主要向英国输出木材和农产品，“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金钱；而俄国已经是太欧洲化的国家，没有钱是不行的。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②1812年，拿破仑的庞大军团跨过俄国边境，进攻俄罗斯本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场战争成为拿破仑帝国的转折点，俄罗斯的庞大领土和严冬，拖垮了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军团。^③法军的惨败使整个欧洲局势迅速逆转，英俄重新联合，重建反法同盟，俄军西进势不可挡。1814年，当亚历山大一世以反法联军总司令的身份进入巴黎时，他做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的夙

① [德]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页。

② 同上，第33页。

③ 参见 Dominic Lieven, *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Battle for Europe, 1807 to 1814*, London: Allen Lane, 2009.

愿，俄罗斯帝国第一次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当俄罗斯帝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历史顶点时，英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在这一时刻，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仍远远落后于英国和西欧大部分国家，^①在工业产品和金钱方面仍要依赖英国，也缺乏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正是这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拥有了最强大的陆军，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没有人能够同他们在陆上抗衡。如果说英国作为海洋帝国的荣耀来自于他们以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自由贸易体系，可以凭借强大的海军建立殖民地网络，并且通过贸易获得大量货币收益，那么，作为大陆帝国的典型代表，俄罗斯帝国的力量植根于那巨大且不断扩张的领土，以及那一支略显野蛮却无比忠诚于沙皇的庞大陆军。诚如恩格斯所言，“这个国家（俄罗斯）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受到攻击；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②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俄罗斯将“帝国”这一古老政治形态的扩张范围推上了新的历史高度，海陆帝国的争霸与结盟成为十九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

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30年里，英俄关系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段，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同时进行，且并行不悖。英国人凭借强大的海军和空前的制造业能力，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不断获得新的立足点，扩大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帝国。而俄罗斯则延续着大陆帝国的习惯，不断向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以及高加索扩张领土，并逐步蚕食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及黑海沿岸的势力范围。此外，凭借战胜拿破仑所获得的威望，俄罗斯帝国对于欧洲局势掌握着关键的裁决权。亚历山大一世所倡议的神圣同盟，虽然在条约内容上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但其实质是通过俄普奥三国

① 这一时期，俄国除了兵员数量大于英国之外，在任何涉及到工业化和经济的项目中都远远落后于英国，双方的综合实力差距很大。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44-150页。

② [德]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6页。

的联合，形成欧陆大国联合管理欧洲事务的局面。^①掌握最大话语权的俄罗斯因为积极镇压欧洲革命，并借助军事行动不断拓展自己在欧陆的势力，成为“欧洲的宪兵”。

然而，世界的地理空间是有限的，只要海陆帝国同时扩张的趋势不停止，那么必然会在某个陆海兼具的重要节点上形成对撞，进而发生冲突。最终，两大帝国的前进步伐在黑海沿岸发生了碰撞，英俄两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面军事冲突在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了。

打击土耳其是俄罗斯帝国崛起过程中的常态化行动。利用镇压 1848 年革命的机会，俄国已经在巴尔干半岛获得了稳定的立足点，但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的野心不止于此，他继续向土耳其施压，企图进一步分割土耳其。由于之前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一再取得成果，他对于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1852 年底，他曾向英国提议联合进攻土耳其，并且共同瓜分土耳其的遗产，但不出意外，这一提议被英国拒绝了，于是尼古拉决定单独采取军事行动。^②

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在外交方面的知识缺陷，尼古拉一世对于英国在土耳其的利益关切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仅仅凭着大陆帝国的想象，笨拙地将领土分割作为吸引英国的筹码。实际上，作为成熟的海洋帝国，英国对于占领土耳其领土没有任何兴趣，它所在意的是土耳其的市场开放和对海峡的控制权。在 1840-1850 年，英国对土耳其的工业品出口额增长了两倍以上，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商业利益，而且将土耳其的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对于海洋帝国来说，最关键的资源是航道与战略要塞。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了它控制黑海通向地中海航道的权力，而海峡的控制权一旦被俄国所获得，就将使其获得自由出入地中海的通道，从而威胁到英国的海洋贸易航路。^③因此，维持一个虚弱但完整的奥斯曼帝国是最符合英国的

① 参见 Guglielmo Ferrero, *Problems of Peace, from the Holy Alliance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Miami: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

② 孙成木、刘祖熙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0-71 页。

③ 根据 1840 年英俄普奥签署的《伦敦协定》，土耳其政府有权在和平时期对所有外国军舰关闭海峡。

利益的。

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差异，在“东方问题”的外交斗争中得到了清晰地展现。1853年11月30日，俄罗斯黑海舰队突袭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并将其全部歼灭，彻底控制了黑海的制海权。俄罗斯的盲目行动触动了海洋帝国的底线，1854年1月，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3月正式对俄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浅薄的尼古拉”^①拙劣的外交技巧，使得矛盾最终演化成了军事冲突，而且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国都站在了英国一边。

这是一场典型的海陆帝国间的军事对抗。拥有蒸汽动力军舰的英军在轻易取得黑海的制海权之后，便选择将主要战场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沿海地带。1854年9月，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但他们完全没有试图进军俄罗斯内地的计划，实质性的战争活动主要集中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上，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一直拉锯了11个月。这种战争方式使英国军队避免了当年拿破仑深陷俄罗斯腹地的噩梦，也使得英国相对于俄罗斯军队的武器技术优势，在有限的战场空间中得以充分发挥。这种方式意味着战争结果不可能对俄罗斯帝国的生存造成威胁，它所打击的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政治地位，这种选择充分展现了英国高超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技巧。虽然俄军奋勇作战，使得战局持续很久，但双方在战略运筹与武器技术方面的严重不对称，使得战争结果几乎在开战之初就已注定了。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攻破之前7个月，尼古拉一世就因为对局势的绝望而服毒自杀，最终，俄国于1856年3月被迫签署了《巴黎和约》，承认了在土耳其问题上的失败。^②

客观地看，如果仅从军事角度而言，俄军在军队数量、武器质量都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能够坚守塞瓦斯托波尔11个月，并且在确定无法守住要塞的情况下，有计划整建制地撤出，继续守住塞瓦斯托波尔北面的高地，

① 这是恩格斯在自己文章中对尼古拉一世的评价，其实在这篇文章中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可能流传更广，即尼古拉一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参见[德]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8页。

② 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进程及其战略设计可参见 Andrew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against Russia, 1853-56*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1;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London: Penguin, 2012.

使得英法联军难以向北推进，这也堪称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但从政治层面看，克里米亚战争无疑是俄罗斯历史上遭遇的最严重挫败，它使得俄罗斯被迫退出所有之前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所获得的利益，而神圣同盟也因战前的外交活动实际终结，致使俄罗斯彻底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且从国势的巅峰急速跌落。可以说，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这个曾经的老师给俄国人的重要一课，也推动了俄罗斯帝国内部改革进程的重启。

19世纪下半叶，向欧洲的海洋文明学习以及改革运动，再次成为俄罗斯帝国国内政治的主旋律。这一时期，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上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小心谨慎地利用欧洲列强的矛盾，适当争取自身的利益。^①同时，为了补偿在欧洲方向上的失败，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不断加快，同英国在伊朗、阿富汗等地都形成了长期的竞争格局。^②在这一时期，认识到自身实力差距的俄罗斯，始终小心翼翼地处理与英国的关系，尽量避免自己在大陆区域的扩张触碰英帝国的底线，一旦遭遇英国的强烈反应，都选择及时后退，避免形成同英国直接的军事对抗。^③

“欧洲宪兵”在克里米亚的失败，令欧陆大国的力量重组进程进一步加速。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进程正式完成，欧洲地缘战略结构完全颠覆。德国的崛起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一轮工业化进程而实现的，而且代表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它对英国霸权挑战的严峻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战略格局的变迁给英俄关系的逐步缓和提供了有利条件。1874年，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之子阿尔弗雷德（Alfred Ernest Albert）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的女儿成婚，英俄王室成为亲家。借助参加婚礼的契机，亚历山大二世正式访问了英国，成为彼得大帝以来第二位访问伦敦的俄国沙皇。这次访问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两国关系的

① 例如，利用普法战争的机会，推动1871年3月《伦敦公约》的签署，使俄国再次获得了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利，部分弥补了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去的权益。

② 参见[英]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③ 例如，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俄罗斯为了不与英国发生冲突，主动放弃了在1877年俄土战争中获得的权益。回避冲突，灵活妥协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对英政策的主要方针。

走向，但至少提供了良好的和解氛围。在 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英国综合国力逐步衰落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再也无力维持“光荣孤立”的政策。^①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英国的战略重点转回欧洲，并且开始参与结盟外交。面对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挑战，原本在欧亚地区势力范围争夺上矛盾重重的英国与俄罗斯终于又走到了一起。1907 年 8 月 31 日，英俄两国代表在伦敦签署协定，划定了两国在伊朗、阿富汗以及中国西藏地区的势力范围。英俄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集团的正式形成，欧洲正式被划分为两个敌对的军事集团。^②最终，在 1914 年，两大军事集团将巴尔干半岛上的一次局部冲突演化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都被改变了。

帝国模式的黄昏：1917-1991 年的英苏关系

如果说 19 世纪的英俄关系是为我们展示两大帝国辉煌的时刻，那么 20 世纪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场以“帝国黄昏”为主题的宏大戏剧。

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帝国崩解，全新的苏维埃政权以前所未见的姿态参与到世界体系中来。面对突如其来的苏维埃革命，英国外交表现出了足够的务实与灵活。由于历史上的皇室联姻，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与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实际上是亲戚

①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15-316 页。

② 早在 1894 年，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时期，法俄两国就已经形成了军事同盟关系。1904 年，英法协约签订。至 1907 年英俄协约签署，英法俄三国协约国集团正式形成。参见 Fiona K. Tomaszewski, *A Great Russia: Russia and the Triple Entente, 1905 to 1914*,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Inc, 2000.

关系。^①因此，末代沙皇一家被杀的消息在英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苏维埃政权在英国社会的公众形象非常糟糕。在 1919-1920 年，英国直接组织了协约国集团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但事与愿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力量超乎想象，经过两年的奋战，最终取得了内战的胜利。面对苏维埃政权存在已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英国政府也迅速根据现实需要，积极调整对苏政策。

其实，在俄国内战结束之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恢复对苏接触。1919 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演讲中就提出“干涉俄国内战的代价太大”，主张解除对苏俄的经济封锁。^②由于英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广泛的经贸往来，英国对于从俄国进口木材等农林产品有一定的需要。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英国就开始积极推动恢复与苏俄的联系。1920 年 1 月 16 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就宣布撤销对苏俄的经济封锁。1920 年 5 月，苏俄贸易代表团访问伦敦，双方开始就经贸问题展开对话。1921 年 3 月 16 日，《英俄贸易协定》在伦敦正式签署，虽然冠以贸易协定的名义，但这实际上是一份具有广泛政治意义的双边文件。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英国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这也为苏俄参加热那亚国际会议、并且获得更多欧洲国家的承认，提供了条件。

1922 年 12 月 30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英俄关系在后来的 70 年里成了“英苏关系”。苏联的创立在英俄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现象层面上看，苏联的建立使得英俄之间交往的密切程度明显降低，两国民间交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完全中断，双方的了解（特别是英国对于苏联的了解）出现了明显断层。由于英国社会对于苏联的信息极其匮乏，

^① 由于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罗曼诺夫王室与温莎王室完成了联姻，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英俄王室之间的亲戚关系十分复杂。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英王爱德华七世两人的皇后是亲姐妹，他们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和乔治五世实际上是表兄弟关系，而且由于两人都酷似母亲，所以他们二人是当时欧洲王室相貌最像的成员，二人私交极好，尼古拉二世还是乔治五世的儿子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的教父，在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一度希望将尼古拉二世一家送往英国，但乔治五世并未积极回应。罗曼诺夫家族被杀，对于乔治五世的心理冲击极大，而且在英国国内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该事件之后，英国社会舆论对于苏维埃政权的仇视和妖魔化宣传始终是英国舆论的主流话语，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

^②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第 172 页。

加上苏联建立以后，流亡群体成为英国人了解苏联社会的主要渠道，英国主流社会的对俄认知出现了明显偏差。但在更深的意义上讲，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俄国的政治思想首次在英俄两国的交往过程中实现了“反攻”。在十月革命之前数百年的英俄关系中，对于俄罗斯来说，英国永远是先进的一方，无论在科学技术与政治思想上都是如此，向英国学习国家发展的道理是俄罗斯的基本逻辑，两国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关系是单向度的。然而，随着苏联的建立以及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快速发展，苏联模式被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视为更加有效的现代化路径，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全世界左翼知识分子及青年视为旗帜与榜样，也鼓舞着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①对于在 20 世纪早期仍努力维持庞大殖民地体系的英国来说，苏联的崛起几乎等同于敲响了英帝国的丧钟。

20 世纪 20-30 年代，英苏关系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而且互信程度极低，恶化与断交几乎已经成了两国关系的常态。1927 年，因为苏联工会支持英国工人罢工，导致英苏关系恶化。作为对这一行动的报复，英国强行搜查了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处，并于 5 月 27 日宣布与苏联断交并废除 1921 年两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直到 1929 年 10 月才恢复外交关系。即便在纳粹德国逐渐成为欧洲的战策源地的态势逐渐明朗之后，英苏两国仍然继续相互算计与利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希特勒坐收渔利。^②

解铃还须系铃人，1941 年 6 月 22 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英苏关系在当天就实现了转圜。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当天约见苏联大使，表示将尽可能协助苏联。当晚，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① 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思想对于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超过历史上任何俄国思想，众多英国贵族、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曾经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思想。例如，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剑桥五杰”就将苏联利益视为人类普遍的利益。另一个重要的案例，是 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翼评论》杂志的出现，它成功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的传播，在英国也涌现了佩里·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等著名的左翼思想家。

② 对于这一段历史，基辛格博士曾有过非常深刻的分析。参见[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贵添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309-344 页。

发表广播讲话，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①面对共同的强大敌人，英苏双方终于捐弃前嫌，共同承担起反法西斯战争的重任。然而，战时的盟友并没有改变英苏之间互不信任与相互防范的心理状态。在战争期间所有涉及战后秩序安排的国际会议中，丘吉尔都想尽一切办法限制战后苏联势力的扩张，即便在战争胜利之后，丘吉尔仍继续全力呼吁对苏强硬，最终加快了冷战格局的形成。^②但无论怎样，有限的外交手腕与苏联红军的铁甲洪流相比显得苍白无力，随着德日法西斯的溃败，苏联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的势力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顶点，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超级大国。

与苏联的鼎盛之势相反，同一时段，作为战胜国联盟另一重要成员的英国正在步入衰落的进程。大战胜利之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消耗的英国，已经无力维持庞大的殖民帝国。以1947年2月21日英国希望美国接手援助希腊政府的照会为标志，英国和美国完成了海洋文明代表国接力棒的正式交接。在随后的20年里，随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大英帝国也宣告终结。最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在战场上占尽优势的英法两国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反对，被迫放弃在埃及的一切利益，狼狈撤退。^③至此，即便是对于国际事务最不敏感的人们也都认识到，“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英国和法国……既非大国，亦非强国”。^④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深刻地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经过充分反思之后，英国放弃了帝国，回到了欧洲，但将自己的对外战略之锚牢牢地挂在了美国的战船之上，将美英特殊关系作为本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外交体系。这既是英国外交务实的一面，也可以看作是英国人对自身实

① 方连庆等：《现代国际关系史料选辑》（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② 参见[美]约翰·加迪斯：《冷战》，翟强、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③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苏联对英施压的相关情况可参见Curtis Keele,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8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253-256.

④ 时任埃及宣传部门主管的萨达特的记录，转引自[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贵添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523页。

力进行客观评估后做出的无奈之举。实际上，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英苏关系就失去了全球的战略意义，而变成美苏关系结构的一个附属要素。站在这一时刻回望 18-19 世纪英俄关系史中英国的辉煌功业，不禁令人心生感慨。

50-70 年代，英苏关系在苏联的外交体系中已经逐渐退居较为次要的位置，虽然仍有所推进，但显然已经难以对全球层面美苏竞争的主线产生实际影响。1956 年 4 月，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和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一同访问英国，这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访问期间，两国共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和联合王国关系的宣言》，表示将共同努力结束军备竞赛，缓和国际冲突。这次访问也成为赫鲁晓夫时期缓和与西方阵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改善了欧洲的紧张形势。随后，苏联与英国又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截至 1965 年，英苏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39.9 亿卢布，较之 1950 年增长了三倍。^①

在冷战最后 20 年里，除了时有发生的情报战和相互驱逐外交官这种示威性的行动之外，英苏关系在双边层面并无更多外交突破。虽然在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等问题上，英国都明确表达了谴责，并且追随美国抵制了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但也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②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洲国家逐渐开始尝试以整体的形式开展与苏联的外交活动。历史走进 20 世纪最后一段时间，那些曾经笼罩在苏联政权身上的解放者光环也渐渐消褪。冷战的结构使苏联长期与更发达的海洋文明处于对抗的格局之中，逐渐令苏联这个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包装起来的大陆帝国陷入困境。大规模的军事投入和对外援助消耗了经济发展的潜能，国家治理模式的僵化逐渐耗尽了其内部的活力。到 80 年代末，长期的冷战对抗令苏联变得精疲力竭，经济领域的无力令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再也无力对抗民族主义思想的挑战，而作为苏联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显然对苏联与俄

①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第 313 页。

② 关于相互驱逐外交官的相关情况可参见 David Blair, “Cold War Echoes as UK Takes Tough Line”, *Daily Telegraph*, July 17, 2007. 其他抵制行动的经过可参见 Peter Byrd(e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Thatcher*, Oxford: Philip Allen, 1988.

罗斯历史的实质性联系缺乏深刻理解，以至于过于轻易地放弃了这个大陆帝国的边缘部分，而且对可能出现的对于国家本身的巨大冲击，没有做好准备。最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来的时候，历史上最完美也是最后的大陆帝国，以解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实际上，20 世纪的英俄（苏）关系存在一明一暗两条主线，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决定了英俄（苏）关系的主要形态：

明线，指的是英俄（苏）两国在 70 年的时间里从对立到合作，再从合作到对立的历史，其中对立是双边关系的主要形态。因为在这一阶段，双方在意识形态认知上的对立已经不可调和，战争期间的合作是在国际权力结构极端不利的状态下不得已做出的理性选择。到了 20 世纪后期，由于英国综合国力的迅速衰落，英苏关系最终成为美苏关系的附属结构，失去了全球性的意义。

暗线，指的是英俄两国在 20 世纪实际上都在应对“帝国”这种政治治理模式所遭遇的历史性困局。拿破仑战争将脱胎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理念传遍欧洲，德国的统一则将民族为基础建设现代国家的模式完美地付诸实践，德国的崛起实际上隐含着以现代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模式的历史隐喻。当民族国家崛起之后，帝国曾经代表的“神圣使命或更高等级的文化”^②的合法性便消失了，一旦帝国自身的力量走向衰落，帝国模式本身就将难以为继。这的确是残酷的历史选择，虽然英国先后两次取得了世界大战的胜利，却依然无法逆转帝国模式的命运。

面对帝国模式的困局，作为海洋帝国代表的英国选择了体面的退出，主动终结了大英帝国的时代，从而尽可能持久地维持了与前殖民地国家的松散联系。但高超的外交技巧最终也无法扭转自己失去世界大国地位的结果。在 1956 年以后，英国在全球事务中大多只能以美国伙伴的身份出现，对外战略的选择空间被限定在美英关系的框架之内，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作为大陆

① 参见 Curtis Keele,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8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②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8.

帝国的代表，俄罗斯则选择以抛弃旧的帝国符号、却保留帝国实质内核的方式，利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新建构自身的合法性根基，将帝国秩序与现代化的要求结合起来，赋予自己的发展模式以新的现代性意义。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指出，“苏联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旧式帝国。它是一个适应了 20 世纪的、现代化的、完美的帝国模板。”^①因此，在科技与文化更加先进的海洋帝国消失之后，它仍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得以延续。然而，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帝国体系，俄罗斯不得不将自己始终在学习的海洋文明设定为自身必须要战胜的敌人，从而画地为牢，使自己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竞争陷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耗尽了帝国的力量与民众的耐心。最终，民族主义的再次兴起彻底摧毁了苏联。在 20 世纪的尾声即将到来之际，人们看到的是“帝国的黄昏”。

迷茫与停滞的新时代：1991-至今的英俄关系

对于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的很多研究来说，冷战的终结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性时刻。世界格局的突变，使得许多问题的性质与内涵，在冷战结束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发生重大的改变。然而，与很多重大国际议题不同，虽然冷战结束了英俄两国的帝国时代，但冷战终结对于冷战后期英俄关系结构中的关键要素的改变似乎并不明显。

后冷战时代的英俄关系，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继承了英苏关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核心特征：

一方面，英俄关系受制于美俄关系的结构没有改变。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英国外交政策依托于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英国始终认真地扮演美国全球行动的特殊伙伴的角色，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等国际社会存在较大分歧的单边行动中，英国不惜偏离欧洲国家的整体立场，积极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在英国总体外交战略稳定的前提下，英俄关系很难在美俄关系总体改善之前出现明显好转。

^①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10.

另一方面，英国国内对于俄罗斯的基本认知没有改变。在苏联存续的70多年里，英国是那些苏联政权“反叛者”最理想的聚集地。经过数十年的累积，反苏群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其影响力也已经深深地嵌入英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苏联解体之后，海外俄罗斯群体对于新生的俄罗斯政权的民主化程度仍然提出强烈的批评，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在普京执政之后，大批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失势的金融寡头、国内反对派、车臣分裂主义分子，以及部分希望将来路不明的财产合法化的俄罗斯官员，大多选择流亡英国。他们在英国媒体上的反复宣传，进一步加深了英国社会舆论对于俄罗斯的敌视态度。^①目前，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构成了英国学术界、媒体以及政府层面对于俄罗斯的主流立场，反映了英国社会坚实的反俄基础。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英国与俄罗斯的民间交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英俄双边贸易额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增长态势。^②但由于认知分歧与对外战略这两项源自冷战时期的关键要素的限制，后冷战时代的英俄关系始终在低位运行。双方虽曾几次尝试改善双边关系，但最后都无果而终。

在苏联解体之初，叶利钦（Борис Ельцин）选择了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乐观地希望在短时间内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因而对英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1992年1月30日，苏联解体刚刚两个月，叶利钦就实现了对英国的访问，并且获得了2.8亿美元贷款的承诺。在1992年底发布的《对外政策基本概念方案》和1993年发布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都将发展同英国的友好关系作为俄罗斯与西欧合作关系的优先目标之一，并坚信“双方将由一般合作关系向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发展”。^③

但好景不长，由于西方承诺的援助大多口惠而实不至，导致俄罗斯经济改革陷入僵局，国内经济情况恶化，也促使俄国内对于完全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提出反思。1994年车臣问题逐步趋于尖锐，西方国家以保护人权为借

① 罗海东：“英国：俄罗斯颠覆者的大本营？”，《世界知识》，2008年第9期，第42-43页。

② 英俄双边贸易额变化情况参见<http://www.rusexporter.com/research/country/detail/4531/>

③ 霍军摘译：“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和平与发展》，1993年，第1期，第60页。

口，对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严厉批评。^①也是在这一时期，英国与俄罗斯之间具有浓厚冷战色彩的“间谍战”再次出现。英国于1994年1月逮捕一名俄国商人，指控其为俄罗斯间谍，随后俄罗斯驱逐一名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也于当年4月驱逐了一名俄罗斯外交官。1996年，俄罗斯再次以间谍名义驱逐9名英国外交人员。作为回应，英国了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②随着90年代后期的北约东扩、科索沃危机等事件的发生，俄美关系跌入低谷，英俄关系也随之走低。

冷战后英国第一次主动试图改善英俄关系的尝试，出现在工党执政时期。2000年初，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访问圣彼得堡，并与普京（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一同观看歌剧表演，主动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坚冰。2001年，“9·11”事件爆发之后，美俄关系在短时间内快速升温，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总体关系得到了改善。而布莱尔利用之前与普京交往所建立的良好个人关系，使英国在这一轮关系改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英国的推动下，俄罗斯与北约签署了《罗马宣言》，并建立了“俄罗斯—北约委员会”。2003年6月24日，普京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第一位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俄罗斯国家元首。这短暂的蜜月期也成为英俄关系在冷战后的最好的一段时间。

然而，后冷战时代的英俄关系缺乏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双方之间高度的猜忌与不信任，随时可能打破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友好气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2003年当年，导致英俄关系破裂的各种事件就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算得上是第一次考验，俄罗斯与德国、法国成为欧洲反战阵营的核心，而英国基于英美特殊关系的考虑，选择与美国一同出兵伊拉克，双方关系出现第一道裂痕。

同样在2003年，英国政府决定允许2001年移民英国的前俄罗斯金融寡

① 双方相关立场分歧可参见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The UK and Russia”, <http://www.fco.gov.uk/servlet/Servlet?pagename=OpenMarket/Xcelerate/ShowPage&c=Page&c id=1007029394365&a=KCountry Profile&aid=1019744935436>

② 英俄之间在冷战后的间谍战情况，可参见 Jeremy Page and Richard Beeston, “British’ spy operation found lurking under a rock”, *The Times*, January 24, 2006.

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以及车臣分离主义分子艾哈迈德·扎卡耶夫（Akhmed Zakayev）政治避难，此举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

2006年，已经加入英国国籍的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中毒身亡，英方指责是俄罗斯特工实施了这一行动，并要求引渡犯罪嫌疑人。这一要求遭到俄罗斯方面的断然拒绝。^①利特维年科事件的发生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对于俄罗斯政府的批评和指责铺天盖地。英国政府宣布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并且中断了两国政府层面的多项合作。作为报复，俄罗斯也宣布驱逐4名英国外交官，并且中止了与英国的反恐合作。利特维年科事件是此次英俄关系改善进程的转折点，自此，英俄关系迅速跌落，至今未能得到转圜。

2006年7月，布莱尔和普京在圣彼得堡八国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但此时俄罗斯与英国的分歧已经无法调和。2007年，俄罗斯以税务问题为由，宣布将于次年1月1日中止英国文化委员会在莫斯科之外的所有办事处的活动。英俄关系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就跌入了更加严重的低谷。

随后的4年时间里，英俄关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谴责与批评成为两国关系的主题词，在2008年的南奥塞梯冲突中，英国表态支持格鲁吉亚。直到2011年，借助梅德韦杰夫（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出任总统之后美俄关系“重启”的有利时机，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短暂访问俄罗斯，两国领导人才恢复接触。然而，由于英国舆论和反对党的巨大压力，卡梅伦只能十分小心谨慎地将英俄关系解冻的希望寄托在稳定增长的经贸关系上。然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这次恢复两国关系的尝试尚未开始便告结束。2014年，在克里米亚事件和马航飞机被击落事件之后，英国宣布停止与俄罗斯的一切军事合作，并且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2016年，特蕾莎·梅（Theresa Mary May）接任英国首相后，英俄双方都表达了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普京与梅在杭州G20峰会期间实现会晤。但正如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当美国的对俄态度与英国的对俄态度出现背离时，英国将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

^① 利特维年科事件的相关报道数量众多，对于该事件前后发展及影响的分析已经十分深入，相关报道集合可参见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alexander-litvinenko>

在美国国内反俄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英国希望恢复英俄关系的努力注定困难重重。2017年1月，特蕾莎·梅访问美国，在同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会晤之后，表示将继续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将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支持。随后，原本计划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访问计划，他为自己找的理由是，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Bashar Assad）政权。^①

在冷战结束的那一刻，虽然俄罗斯和英国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帝国历史，但却没有办法与过去那顽固的记忆轻松告别。冷战的结果赋予了英国人更多假想的道德优势，使其无法以平常心看待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发展模式。但是英国并没有办法恢复足以支撑这些心理优势的物质力量，既无法改变俄罗斯的态度，也没有足够的政策空间调整两国关系的结构。可以说，在冷战结束至今将近30年的时间里，英俄两国都无法摆脱冷战遗留下来的旧思维与旧格局的限制。双方在互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略显迷茫地寻找两国关系的合理定位，试图为近年来近乎停滞的英俄关系注入新的前进动力，但迄今为止双方努力的成效并不明显。

互动与互构：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

英俄关系的历史是一篇漫长而曲折的故事，在这段横跨5个世纪的旅程中，英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在人类历史上都留下深刻印记的国家，通过持续不断的交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在相互学习、合作与竞争中发现并塑造了自己。英俄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两国在互动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于国家身份的互构。归纳整个英俄关系的发展的历史，其背后隐藏的历史逻辑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为海洋文明的学习者，俄罗斯是通过不断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而成长为世界大国的。

从17世纪末开始，俄罗斯一直就从西欧国家学习新的文明，并逐步将

^① 约翰逊原计划4月10日访问俄罗斯，但在4月8日突然宣布取消访问。相关信息参见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7_04_08_402673.shtml

其吸收内化成为支持自我发展的养料。作为 17—19 世纪海洋文明的代表，英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先进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俄罗斯学习的主要目标。在历史上，俄罗斯每一次综合国力的进步，都离不开对英国和欧洲的学习和模仿。从彼得一世改革到 19 世纪下半叶的农奴制改革，俄罗斯每一次重大进步的背后，都有英国和欧洲文明的影子。可以说，英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器物层面上的俄罗斯，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的扩张，都仰赖于这种对于海洋文明的习得。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僻处欧洲边缘的大陆帝国，俄罗斯的崛起具有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向东方扩张的现代性意义。^①

其二，作为海洋文明的竞争者，俄罗斯在不断挑战英国的过程中也强化了“他者”的身份认同。

虽然在物质文明方面始终在向海洋文明学习，但俄罗斯在精神层面对于文化身份意识的坚守是相当坚决的。从基辅罗斯受洗开始，俄罗斯始终将自己视为东正教的正统代表，强烈的弥赛亚意识使其始终保有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骄傲。^②在学习英国和欧洲的过程中，俄罗斯从未试图改变自身的宗教与文化身份，反而将俄罗斯社会内生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有效手段。俄罗斯虽然学习了海洋文明的器物形态，却没有接受其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核。虽然与海洋文明山水相邻，但却始终是海洋文明世界的“他者”。虽然始终在寻找出海口，但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式的大陆帝国”。^③因此，在历史上俄罗斯帝国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即便不去刻意挑战英国的霸权，也会被英国视为异质性文明的扩张。对于俄罗斯来说，这种挑战行动构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强化，竞争的胜利所带来的荣耀，成为延续大陆帝国的重要手段，几百年的竞争也使得俄罗斯和西方都已明确了俄罗斯特殊的“他者”文明的身份。

①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

② 参见 Judith E. Kalb, *Russia's Rome: Imperial Visions, Messianic Dreams, 1890-194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③ Dominic Lieven, "Empire on Europe's Periphery: Russian and Western Comparisons", in Alexei Miller and Alfred J. Rieber (eds), *Imperial Rule*,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8.

其三，作为大陆帝国的代表，俄罗斯无力对抗作为整体的海洋文明，直接的挑战最终都会以俄罗斯的失败而告终。

从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在 19 世纪上半叶和 20 世纪中叶先后两次拥有欧陆霸权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时期，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陆上强权。在两次达到国势顶峰的时候，俄罗斯帝国都尝试对海洋文明发起整体的挑战，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的结果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俄罗斯内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远不及它想挑战的对手。即便一时处于上风，相持日久也必定因为力有不逮而走向失败。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所言，俄罗斯的发展史始终处于“学习西方——帝国崩溃——重新崛起——陷入停滞——再次学习”^①的历史周期之中，而每次失败都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严重的伤害。

其四，英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失去了海洋文明代表的地位，使得英俄关系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北方战争结束以后，英俄关系就拥有了非常明显的超出了双边层面的意义。18 世纪，英俄关系的走向就已经能够对整个欧洲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到了拿破仑战争后，英俄关系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到全世界，海陆帝国的竞争成为 19 世纪国际关系的主线。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国国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随着 20 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英国遍布世界的殖民体系难以维系。20 世纪 50 年代，被迫退回英伦三岛的英国失去了全球大国的地位，海洋文明的接力棒彻底交到了美国手中。从这一刻起，英俄（苏）关系实际上失去了全球性的意义，逐渐回归到双边层面，而在历史上属于英俄关系的全球性内容大多被纳入美苏关系的框架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从冷战后期开始，全球性议题已经很少在英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英苏关系本身也被美苏关系的大框架所限制，部分失去了独立性。这种性质的改变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当前英俄关系的总体模式仍然延续了冷战后期的状况。未来英俄关系的意义和定位是否会发生新的转变，主要取决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是否会出现明显变化。

①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99-300.

其实，所谓历史逻辑就是在经历了时间的洗刷和沉积之后，最终仍然能够保持不变的那些核心要素。如果把英俄关系比喻成一条奔涌的大河，那么这些隐藏在繁冗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条河的堤岸。虽然有时河水会因为特殊的原因溢出或者改道，但在宏观时段上仍然会沿着堤岸的走向而前行。在我们分析和思考未来英俄关系的发展状况时，这些历史逻辑会与当代英俄关系中新出现的各种要素叠加在一起，对英俄关系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逻辑的当代意义：不容乐观的前景

与纯粹的历史学研究不同，国际关系研究者史海钩沉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解读今日世界的钥匙，希冀对长时段的研究能够为理解当代事务提供更加深刻的观察视角。

这一视角的引入，对于当前英俄关系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如果我们仅仅将观察的范围停留在近几年英俄两国的具体事件上，那么一定会困惑于两国糟糕的互动方式。双方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却始终在为一些偶发事件争执不休，而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能带来的共同收益视而不见。但只要我们理解了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就会发现当前英俄关系的状态所蕴含的深刻时代背景，而未来英俄关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受制于下列这些由历史逻辑演绎而来的重要体系性因素：

首先，英国国内对于俄罗斯的负面认知将长期存在。

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眼中的“他者”，这是英俄交往历史中遗留下来的重要结论。从 19 世纪开始，英国国内舆论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就已经明显转向负面。进入 20 世纪以后，这种身份认知的差异又增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英国成为自由主义的旗手，而同时将苏联体制扣上了“奴役”的帽子，英国

成为反苏人士的天然集结地。^①英国国内对于俄罗斯的负面认知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已经渗入到英国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批评俄罗斯”，在英国舆论场已经具有政治正确的意味，而对俄的积极态度在英国主流社会舆论中会受到严重的排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状态很难改变。

其次，英俄关系受制于美俄关系的基本结构将长期存在。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英国失去了全球性大国地位情况下，重新调整而形成的英俄关系结构至今仍在延续。在现存结构下，英国的外交政策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核心，整体上会遵循和配合美国的国际战略，以此来争取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种结构的存在，意味着只有在美俄关系出现改善迹象的情况下，英俄关系才有可能获得突破。而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即使希望推动英俄关系有所改善，也将会囿于美方态度而被迫停止。2017年在特蕾莎·梅和特朗普会晤之后，英国暂停改善对俄关系的行动，就是这种结构性限制的表现。这种结构性制约将长期存在，美俄关系决定了英俄关系发展的“天花板”。

最后，英国与俄罗斯相互依赖较低，且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提升。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已不构成对英国的重大安全威胁，而英国更不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随着英国国际影响力的萎缩，加上对外关系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在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也几乎没有合作的空间。双方在军事、政治和全球议题上的相互依赖程度都很低。实际上，多年来称得上支撑英俄关系的基础就是两国相对稳定的经贸联系，但由于英国石油自给能力较强，英俄两国贸易额总量较小，最高年份也不超过250亿美元，且俄罗斯的贸易顺差很大。双边贸易大体上只能作为英俄关系的晴雨表，而不能承担起两国关系压

^① 早在19世纪，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欧洲思想家大多将俄国作为西欧国家的威胁，在他们的文章中不断提醒英国政府要对俄罗斯帝国的活动加以警惕和限制。而在苏联成立之后，这种反对的声音达到了顶点。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政治上的反苏力量之外，在思想、文学等领域，英国都是苏联坚定的反对者。例如，对于苏联模式最辛辣的讽刺小说《1984》就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在经济学领域，旅居英国的哈耶克也将苏联模式称为《通向奴役之路》。

舱石的责任。^①综合来看，受限于英俄较低的相互依赖程度，在英俄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缺乏足够坚实的支撑性因素。

所有这些限制性因素集结在一起，几乎已经注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俄关系发展仍将处于曲折前进的艰难时段。虽然近年来英俄两国中央政府显然都有意促使英俄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特蕾莎·梅执政以来更是不断在对俄关系上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是，美俄关系仍在持续恶化，欧洲国家对俄制裁又进一步延长，制约英俄关系改善的外部障碍仍然巨大。而英国国内舆论的态度也很负面，媒体对于俄罗斯的批评与反对声浪此起彼伏，反对党在对俄问题上对政府的行动也产生了极大的牵制。更严重的是，由于相互依赖程度较低，英俄关系的改善对于两国政府来说，都没有特别迫切的需求。因此，英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推进将会慎之又慎，而俄罗斯政府也基本上不会在克里米亚等很多关键问题上做出主动让步。最终，徘徊与反复将成为未来英俄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常见现象，很多时候都将出现在不同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的复杂状态。

一言以蔽之，当前英俄关系的结构是历史逻辑自然沉淀的必然结果，如果英俄两国不能跳出由冷战时代延续至今的历史逻辑，那么英俄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即便因为一些突发原因出现短暂好转，也会很快被拖回原有的逻辑陷阱之中。英俄关系的根本性改善需要两国领导人拥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充分的战略信任和坚定的战略定力，但在现行英国政治体制下产生的领导人很难制定和执行长期战略，英俄关系的改善进程恐怕仍将在困顿与挑战中艰难前行。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began in 1553. In the 400 odd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has undergone complicated changes. In the 17th and the 18th century, symbolized by

^① 1991-2008年，英俄双边贸易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2008年达到220亿美元的高点。但由于格鲁吉亚战争爆发，双边贸易在2009年骤降到110亿美元。随着2009年以后两国关系的好转，贸易额也逐渐增加，到2012年达到240亿美元的新高点。然而，好景不长，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参与对俄制裁，从2013年开始，两国贸易额明显下降，到2015年已降至102亿的历史低点。英俄贸易额变化情况参见<http://www.rusexporter.com/research/country/detail/4531/>

Peter the Great's reform, Russia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and imitated Britis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ystem. With British connivance, Russia replaced Sweden as the strongest country in Eastern Europe. Both countries maintained enough tacit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y relations. After the end of the Napoleon War, the Russian Empire became the overlord of Europe,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ea empire and land empire led to the European pattern in the 19th century. Finally, both countries resorted to arms in Crimea and deprived Russia of hegemony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both British and Russian empires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rise of modern nation states. The British voluntarily abandoned its empire statu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lost its position as a global power.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maintained the real existence as a continental empire with new ideological discourses. Nevertheless, failing to cope with the overall competition against marine civilizations and exhausting its internal vitality, the Soviet Union ended in disintegra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any restrictiv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hav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Both countries have made several attempts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yet none of them has been accomplished. The historic logic accumulated by 400 odd years has, to a great extent, restricted current developments of bilateral relations. Domestically, the British negative perceptions towards Russia w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ies still continue taking its special relations with the U.S. as a core.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Britain and Russia is still rather low. If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med by history, do not change, it will be hard for both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Great Britain-Russia Relationship, Continental Empire, Marine Empire, British Diplomacy, Russian Diplomacy

【Аннотация】 Обмены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начались в 1553 году, 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более, чем 400 лет истор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претерпела сложную эволюцию. Накопленн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ограничила основн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России, накопленное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родлитс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будет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на особ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по-прежнему будет на низком уровне. Если э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е основные условия не изменятся, в будущ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не будет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ситуация с изменением положения вряд ли буд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зменен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держава, морская держава, дипломат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1947年旅大问题与苏联的“双轨”策略*

郝江东**

【内容提要】1947年初，旅大问题再度吸引了美苏国共的高度关注。莫斯科根本无意将旅大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接收，但为应对美蒋的压力，采取了一种“双轨”策略：即，一面同美蒋在外交层面周旋，一面授意驻旅大苏军“扶共拒蒋”，借助中共力量阻挠接收，实现了对旅大的控制。国民政府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立即接收旅大，却没有太多选择余地。期间，驻旅大苏军的做法，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分歧与不满。新近解密的多方档案与文献，揭示了1947年美苏国共就旅大问题的互动过程。苏联的应对策略及产生的影响，值得关注。

【关键词】中苏关系 苏联对华政策 苏联外交 美苏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9**【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5-0118(19)

二战后初期，旅大问题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常呈现为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的互动。虽然1945年8月中苏就旅大问题有过专门协议，但斯大林要控制旅大的意图与二战后初期国际和中国局势的演变，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化。美国在1947年初重提旅大问题，并非要为国民政府火中取栗，而是着眼于该年的莫斯科会议向苏联施压。莫斯科根本没有将旅大行政权交还国民政府的意愿，但鉴于1945年中苏条约关于旅大行政权问题的规定，不得不对来自美蒋的压力。藉由一种“双轨”策略，苏联最终实现了对旅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5@ZH00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第62批）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郝江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博士后。

大的控制。大连因此成为二战后东北地区始终未出现国民政府行政权力的大城市。本文意在通过揭示 1947 年美苏国共围绕旅大行政权接收问题的互动过程，探讨苏联的应对策略及影响。^①

随着多国档案的公开，学术界对战后初期旅大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关于 1947 年旅大行政权接收问题的探讨仍较薄弱，尤其缺乏对此期间苏联应对策略的探讨。许多学者将 1947 年旅大接收问题视为国共之间的一次政治斗争，突出中共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影响。这种观点对中共在旅大问题中的地位以及所能够发挥的影响作了过高的估计。此外，多数研究将关注点放到了旅大地方层面，分别研究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中苏两党关系等等。这种研究固然有利于对每一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却很难全面地理解二战后初期旅大问题的复杂性。^② 本文将充分利用新近解密的多方档案资料，以这一时期美苏国共关系的演变为线索，探讨莫斯科针对旅大行政权接收问题采取的应对策略及产生的影响。

① 关于苏联对 1947 年旅大问题的态度，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1947 年的《真理报》没有出现任何涉及旅大问题的专门报道，参见《真理报》数据库（来源：UDB STFTISTICS 数据库 <http://dlib.eastview.com/>）；（2）1947 年被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的议题中，关于中国问题的有 5 个，但均不涉及旅大，参见 Адibeков Г.М., Андерсон К.М., Роговая Л.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ВКП (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гг. Каталог. Том III. 1940-1952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г.

② 汪朝光：“战后中共与苏联在旅大关系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8 年第 4 期，第 113-125 页；汪朝光：《战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金冲及教授，2009 年 10 月；潘玲：“抵制国民党接收大连的斗争”，《兰台世界》，2001 年第 8 期，第 38-39 页；王真：“苏军进驻旅大与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党史研究资料》，2000 年第 11 期，第 21-31 页；党霞：“旅大视察团视察旅大——抗战后国共的一场政治较量”，《党史纵横》，2009 年第 9 期，第 23-25 页。

郑成探讨了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的互动，认为在这种互动中，苏联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共只发挥了辅助性、配合性的职能。参见郑成：“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与苏军的经济合作——以大连为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03-127 页；郑成：“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的中苏关系——以旅大地区苏军〈实话报〉为例”，《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7 辑（2008 年冬季号），第 151-182 页。

关于这一问题，有许多回忆性文章颇有史料价值，参见张殿选：“粉碎国民党接收旅大的阴谋”，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大连卷》（大连：大连出版社出版，1998 年，第 323-336 页；夏振铎：“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三辑），第 125-153 页；韩光：“旅大八年”，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99-381 页。等等。

别有用心：美苏重提旅大问题

控制旅大是斯大林远东战略的核心环节。早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确保苏联在大连的“优先利益”与租借旅顺港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取得了美国的保证。^①在此基础上，中苏两国就旅大问题达成两个专门协议。关于大连问题的协议规定，大连是一个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在平时不包括在“基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旅顺协定所定之海军根据地章程效用范围之内”，仅在对日作战时期受驻旅顺苏军的“军事统制”。关于旅顺问题的协议规定，旅顺港作为“纯粹海军根据地”，仅供中苏两国的军舰及商船使用。其中，苏方负责“海军根据地之防护”，中方负责“区域内之民事行政”。^②由上述两则协议可见，国民政府在法理层面保有了对旅大的行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45 年莫斯科谈判中，斯大林曾坚决要求对大连实行类似旅顺港的“军事统制”，只是到谈判最后阶段才做出妥协。1945 年 8 月后，驻东北苏军坚决拒绝、阻挠国民党军从大连登陆进入东北，同时默许、协助中共部队经大连进入东北，对日后东北局势的走向发挥了重要的影响。^③其中虽有苏军中下层机构对中共党的朴素的意识形态认同，但其行为体现了苏联控制旅大的意图。此后，国民党军虽然经山海关打出东北，一度将东北民主联军驱至松花江北，但始终没能染指旅大。中共则得到了驻旅大苏军

① Громыко А.А.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Том IV. Крым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рех союзных держав – 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4-11 февраля 1945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4 г., С.261-26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第 541 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 661-665 页。

③ АВП РФ. ф.0100. оп.40. д.7. п.248. л.28-30.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ига 2: 1945 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г. С.262-26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 120-121 页。

的支持与帮助，并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援助。^①在解放战争中，旅大地区实际上扮演了中共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②

1947年，旅大行政权接收问题最早由美国正式提出。^③1947年1月6日，即驻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中国的当日^④，美国驻华大使馆分别照会中苏两国政府，敦促“迅速履行有关大连及铁路之协定”，使旅大地区能结束当前“不正常之状态”。^⑤很难说美国人此举是为蒋介石政府“火中取栗”。自从马歇尔调处失败后，美国政府对中共问题的热情已经迅速降温，呈现走着瞧的态势。^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除战后欧洲局势的发展“要求人们采取紧急而专注的行动”，美国对华“任何有效的帮助”，尤其涉及中国内政问题，都会使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不仅会在中国“引起抱怨情绪和增加混乱”，还可能“受到其他大国的敌视和报复”，危害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义务的能力。^⑦

基于1945-1946年同苏联人交涉的经历，并考虑到旅大地区为数众多的中共部队，国民政府决策者并不相信能够顺利接收旅大，决定旅大“不宜即取”。1月16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向王世杰提出了解决旅大

① 关于苏联在国共内战中对中共提供援助的情形，参见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Борисов О.Б.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гг.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п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77 г. С.82-114; Самохин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КПК(1945-1946 г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7 г. №3. С.61-66; 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 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осква: Вонпиздат, 1975 г. С.85-113.

②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十年”，载于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第13页。

③ 1946年底，关于接受旅大的传闻在中国国内“甚嚣尘上”。参见“接收大连说甚盛旅大居沈人士准备返籍”，《申报》，1946年12月4日，第2版。

④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7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18页。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493页；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585页。

⑥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

⑦ 同上书，第175页。

问题的四个途径：（一）利用国际关系，寄望于美苏关系破裂；（二）运用外交方法，接受苏联的经济要求，承认中共的东北政权；（三）采取政治途径，与中共和谈；（四）凭借军事力量。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是第四种。鉴于当时国共争夺的焦点在苏北，熊式辉建议对美国缓提大连问题。他还告诉蒋介石，大连“如不略取，虽似有负美国通告之善意帮助”，但“同时经略南北，便即取之，否则力量不足收拾”，建议“暂时搁置为宜”。蒋介石亦认为“取之将更多事”。^①

不过，为不辜负“美国通告之善意帮助”，国民政府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姿态。国民政府外交部一方面复照美国驻华大使馆，称大连港将对国际贸易“一律开放”，并暗指苏联是国民政府迄今未能接收旅大行政权的“现实障碍”^②；另一方面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已派定接收人员，并令饬率同地方保安团队前往接收大连行政”，表示希望驻旅大苏军能“惠予交通通讯及其他便利”。^③2月5日，王世杰通告美国政府，称国民政府将“全力排除‘事实的障碍’，以完成接收”。^④然而，在此之前，当熊式辉在私下询问王世杰“何辞以对美国之通告”时，王世杰曾表示对美国的复照“无甚重要”。这从侧面证明，国民政府在给美国的照会中阐述的关于接收旅大行政权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而已。^⑤

鉴于中苏两国在旅大行政权问题上有着明确的协议条文，莫斯科在分别接到中美两国政府的照会后，并未立即就旅大行政权问题本身提出异议，只是对美国介入这一问题的做法大表不满。2月27日，苏联外交部公开表示，

①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10年，第345-346页。

② АВП РФ, ф.100, оп.34, п.129, д.6, л.62;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г. С.260.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494页。

④ 1947年2月5日日记，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六册：民国三十六年一月~民国四十九年十一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影印，第19页。

⑤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345页。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旅顺大连以及中长铁路等问题都有明文条款，苏联政府一向准备采取适当的步骤，并决心尽一切可能，切实履行上述条约的各项条款，但坚决拒绝对“远东不正常之状态”负责，认为没有对这种状态担负责任的“任何理由”。苏联外交部还特别强调，旅大问题属于中苏两国政府的“职权范围”。^①与此同时，驻旅大苏军增加了对美国船只进出大连港的限制。^②

作为对美国的回应，莫斯科再次提出了驻华美军的撤退问题，要求重新审视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落实情况。苏联外交部指出，苏联政府认为美苏两国切实履行上述决议“暨莫斯科协议所规定之其他各条件”，对“树立中国境内之正常状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强调苏联方面已经履行了“凡上述协议所要求于苏联者”，撤出了驻中国东北的苏军。^③莫斯科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藉此迫使美国势力退出中国，早从1946年中期开始，莫斯科就不断表达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要求撤退驻华美军以及停止对华援助；二是回应美国在旅大问题上对苏联施加的压力，这是更主要的目的，一个重要的佐证是，这一时期远东苏军情报机构没有提出任何关于驻华美军的威胁问题。^④

莫斯科还对中国局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份3月11日前被递交至苏联外交部的报告称，中国国内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一）“国民政府反动集团”不仅拒绝执行1945年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还拒绝执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迫害国内的民主党派与人士；（二）国共关系已经破裂，1945年底的局部冲突已经演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内战；（三）美国单方调停中国内部事务的努力并未改善中国局势；（四）大批驻华美军

① АВПРФ. ф.06. оп.9. п.67. д.1038. л.3.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4 г. С.371.

② *FRUS*, 1947, vol.7, pp.482-484, 490; АВП РФ. ф.0100. оп.40а. д.22. п.264. л.4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49-250.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495-496页。

④ Магросов В.А.(отв. ред.).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май 1945-195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5 г.

完成日侨遣返任务后仍驻留中国，并对国民党军提供援助。报告指出，苏联政府严格遵守了 1945 年 12 月莫斯科外长会议提出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建议莫斯科应当在有中国外长出席的非正式会议上，同美英两国讨论 1945 年底莫斯科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①

基于这份报告，莫洛托夫公开要求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讨论 1945 年底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②3 月 10 日，他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示：自从 1945 年 12 月外长会议以来，“中国局势尚无改进”，建议“听取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之协定的参加者作关于会议决定实施情形的报告”。^③《消息报》称，莫洛托夫的提议“适合时宜”，是“维持普遍的和平与安全”与“保障中国国内和平与民主”所必需的，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实践国际诺言的关心”。^④

然而，美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英国政府也以中国问题是美苏之间的问题为由，婉拒了莫洛托夫。^⑤2 月 2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 1947 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并无讨论中国问题之具体计划”。^⑥马歇尔还表示，莫洛托夫所提 1945 年底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非外长会议之声明，而实为苏联、联合王国及美国三国外长之声明”，鉴于作为外长会议成员国的中国没有参会，“如加入中国问题，殊属不当”。在同中国政府沟通后，3 月 16 日，马歇尔正式拒绝了莫洛托夫的提议，拒绝在会上讨论中国

① АВП РФ. ф.0431/4. оп.4. п.6. д.27. л.65-6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77-280.

② АВП РФ. ф.0100. оп. 40а. д.7. п.262. л.4-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73-274.

③ “莫洛托夫在外长会上建议：上届外长会议关于中国决定应提实施情形报告”，《解放日报》，1947年3月11日，第1版。

④ “消息报赞扬讨论中国问题建议：不容延迟报告履行情况”，《解放日报》，1947年3月12日，第1版。

⑤ АВП РФ. ф.0431/4. оп.4. д.27. п.6. л.17-1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76-277.

⑥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国民政府照会苏英美法不得在未来外长会议中提及中国问题”，载于《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7年，第46-47页。

问题。^①对于莫洛托夫提到的驻华美军问题，马歇尔表示，驻华美军正在撤退，但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仍将有 6000 余名美军继续留驻中国“负责警卫与安全保障”等工作。^②

马歇尔的强硬态度令苏联人大为不满。《真理报》3 月 17 日刊文指责美国“加强对外扩张”与“干涉中国内政”。^③莫洛托夫在给马歇尔的信中指出，“外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只会使中国内战扩大，只有美苏均“不干涉中国内政”，1945 年 12 月关于中国问题的莫斯科决议才能得到真正的施行。他指责美军不仅没有完成撤退工作，而且仍然不知何时才能完全撤出中国。^④《真理报》4 月 2 日用半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在此前后苏美英就中国问题的往来沟通，并刊文谴责美国武装国民党军以及在华设立军事基地、采矿等行为，称美国“正在使中国奴役化”，使“中国内战更为激烈”。^⑤4 月 7 日，塔斯社批判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称：“凡中国之重要城市，美国皆设立军事基地。……美国情报人员遍布中国”。^⑥

翻云覆雨：苏联的“双轨”策略

在同美国交涉的同时，苏联还在外交层面与国民政府周旋。对莫斯科来说，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根据 1945 年 8 月的中苏条约，国民政府对旅大行政权享有法理依据。由于上述条约连同该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维系着关乎苏联重大安全利益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合法性，

①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载于《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7 年，第 60-61 页；АВПРФ. ф.0431/4. оп.4. п.6. д.27. л.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75-276.

②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д.7. п.262. л.8-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86-287.

③ Правда. 17 марта 1947 г. №.66 (10457). С.4.

④ АВПРФ. ф.0100. оп. 40а. д.5. п.202. л.3-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87-289.

⑤ Правда. 02 апреля 1947 г. №.84 (10475). С.3.

⑥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塔斯社评论美国协助蒋介石建立军事的情况”，载于《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7 年，第 83-84 页。

决定了莫斯科不可能公开拒绝将旅大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虽然这不意味国民政府将顺利完成接收。3月7日，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要求国民政府加紧组建旅大行政机关的同时，拒绝就协助接收做出任何保证，并要求对国民党军控制的中长铁路南段立即实行“中苏共管”。^①次日，苏联驻华武官约见蒋经国，提出对国民党军控制下的中长铁路南段“履行中俄协定中共同经济铁路之条款”。对此，蒋介石认为，苏联对旅大行政权，“形式上已不能不允交还于我，因此我政府更增困难矣”。^②

不过，美国国内及对外战略出现的变化，鼓舞了国民政府决策者对苏强硬的信心。3月6日，司徒雷登告诉王世杰，因希腊“受共产党及苏联之压迫形势严重”，美国对苏政策“正在考虑重大的变更”。对此，王世杰认为，“此种变更自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马歇尔在赴莫斯科之前拟订的对希腊、土耳其的政策则显示了美国政府将“放弃妥协方式应付苏联”。他甚至将此视为“国际形势之转折点”。^③3月17日，美国重申了对旅大问题的立场，督促苏联将大连交还中国。^④艾奇逊还要美国驻苏联大使史密斯敦促苏联政府遵守1945年中苏关于旅大问题的协议。^⑤美国政策的变化迹象增强了国民政府决策者对苏强硬的底气，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实影响于我国与世界安危之前途甚大也”^⑥，由此，“决心收复旅大，此其时也”。^⑦

3月8日，蒋介石紧急电令熊式辉等人返回南京商谈旅大接收问题。3月9日，国民政府内部决策会作出决议，决定组建接收部队，以击溃旅大地区的中共部队；同时召集旅大行政干部，筹组接收事宜。^⑧3月23日的会议

① АВП РФ. ф.0100. оп.40а. д.21. п.264. л.91-9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71-273.

②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第八册），第627页。

③ 1947年3月6日、7日日记，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六册），第43-44页。

④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1978年，第408页。

⑤ *FRUS*, 1947, vol.7, p.501

⑥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第633页。

⑦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第423页。

⑧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349页。

上，与会者多认为苏联“还我动机，似非友善”，“接收似难期顺利”，认为应采取军事与外交相结合的方式，要求苏方解除旅大地区“非法武装团体部队等”，并且在完成接收前避谈铁路合作问题。^①陈诚还在提交蒋介石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故作撤退姿态”的目的，是“作长期占领之部署”。^②4月1日，蒋介石指示采取政治与军事两种方式进行接收，并指示，要就“解除奸匪武装”与“保证我行政人员之安全”争取驻旅大苏军的保证。^③他还令陈诚将国民党海军主力集结于渤海湾，“特别注重由虎头湾、龙口、烟台、威海卫及长山列岛，通往大连、朝鲜沿海之海道”。^④根据上述决议的原则与精神，王世杰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了照会。^⑤

面对国民政府的接收要求，莫斯科一方面在外交层面努力周旋。4月2日，塔斯社发表声明，驳斥了对苏联阻挠国民政府接收的指责，称苏联政府自1945年底以来多次建议国民政府接收大连，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⑥4月5日，苏联副外长马立克以电报传译出现问题、“尚未收到准确的备忘录全文”为由，拒绝答复国民政府3月31日的照会。^⑦4月6日，驻旅大苏军代表查列斯基少将向到普兰店商谈接收问题的国民党军代表周璞等人表示，苏军尚未就金州、大连接防问题接到“上峰指示”，对中苏两国政府有关这一问题的交涉“并无所闻”，强调在旅大地区“不存在其他非法武装部队”，拒绝国民党军派代表前往视察，称“不能负责安全”。^⑧另一方面，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468-471页。

②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第421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477页。

④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第645页。

⑤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38-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625页。

⑥ Правда. 02 апреля 1947 г. №. 84 (10475). С. 2.

⑦ АВП РФ. ф.0100. оп.4а. д.19. п.264. л.12-1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 1946-1948 гг. С.291-292.

⑧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479-481页；“接收旅大曲折多我有通知致苏尚未获复苏承认在长山列岛驻军”，《申报》，1947年4月9日，第2版。

莫斯科指示驻旅大苏军进行拒蒋接收的相关部署。^①政治上，苏联元帅梅列茨科夫亲赴大连，于4月3-4日主持成立了关东公署。^②除将维护治安的任务交中共负责外，苏军完全控制了旅大行政权。据时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关东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回忆，公署“大小部门都有一个苏军代表，大小事情都要他们同意才能办。一切都是命令式的，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也不准有不同意见。苏军不仅掌控了旅大地区的政权工作，甚至党的关系他们也插手”。^③经济上，苏军加紧抢运物资，将原属满洲车辆株式会社的机车，鞍山制造厂、瓦房店滚珠厂等工厂的机器设备运回苏联。军事上，苏军举行了海空军演习。虽然蒋介石等人最初也曾估计接收“尚非指顾间事也”^④，但没有料到，这场接收自一开始就注定了将会无果而终。

4月10日，在驻旅大苏军“拒蒋”部署基本完成之后，彼得罗夫向王世杰提交了对国民政府3月31日照会的复照，称莫斯科已经指示驻旅大苏军司令“全力协助”中国行政机构履行职能。针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派军进驻旅大的要求，彼得罗夫的表示是：（一）强调旅大地区“从未有过，以及现在也没有”反政府的非法武装；（二）援引1945年中苏关于旅大问题的协定中有关旅顺防务“委托苏联政府管理”的规定，否定了国民政府提出的该港“由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的条款，坚决拒绝国民党军进入旅顺；（三）以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为由，强调“旅顺军港之军事管制仍及于大连”，反对国民党军进驻大连。彼得罗夫一再强调，苏联方面

① 虽然目前没有档案证明莫斯科对苏军有过直接的指示，但很难想象，在二战后初期苏联的政治环境中，驻旅大苏军在没有得到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敢贸然实施文中所提到的一系列行为。

② 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陈文登编著：《1947年3月29日，刘顺元、边章五、寒（韩光）关于旅大地区成立政权及人选问题向辽东分局、东北局、中央的报告》，《旅大特殊时期老票证（1945-1955）》，大连：大连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③ “刘顺元〈中共大连党组织与驻连苏军关系〉”，载于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76-77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497-498页。

不追求超出 1945 年中苏条约规定范围的任何权益，同时，要求立即共管那些“具备条件”的中长铁路路段。^①

蒋介石认为，“俄对我交还旅顺、大连之交涉”，意在“对美国作态”，而“绝无诚意交换”，莫斯科会议后可能对旅大问题“置之不理”或“延宕不决，而仍虚与我委蛇”。^②果不其然，随着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结束，莫斯科对旅大问题的热情迅速冷却。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莫斯科开始传达出将旅大问题放到东北地方层面、交由地方机构处理的信号。5月5日，彼得罗夫照会中国外交部，同意国民政府派员赴旅大视察，称莫斯科已训令当地苏军对国民政府视察人员“予以必要之协助”，建议将旅大问题交中苏东北机构协商解决。^③5月12日，彼得罗夫再次建议中方“从速”成立旅大机构以“解决实际问题”，强调“不见有恢复旅大中国行政权之障碍之存在”。^④5月16日，苏联副外长马立克告诉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傅秉常，旅大地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非政府部队”。^⑤

5月17日，旅大苏军司令部向关东公署和中共旅大地委通报了国民政府视察团将于6月初到大连。除了命令关东公署与旅大地委对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措施，苏军还要求关东公署在旅大地区立即推行货币改革，并限令在5月23至27日之间完成。具体做法是：由关东银行负责“对流通于关东地区之满洲票及苏军指挥部票（即苏联红军券）加盖印记”。^⑥每张军用券上会以贴纸条的方式增大面值，从而达到人为的

①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д.21. п.264. л.110-116;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д.31. п.364. л.116-12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293-29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504-507页；“1947年4月17日日记”，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六册），第48-49页。

②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第444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508-509页。

④ 同上，第513-518页。

⑤ АВП РФ. ф.0100. оп.40а. д.19. п.264. л.15-2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306-309.

⑥ 陈文登编著：《旅大特殊时期老票证（1945-1955）》，第7页。

货币贬值的效果。^①苏军还要求关东公署签署石油、电业、渔业、盐业、造船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实现了对旅大所有重要厂矿企业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5月30日，彼得罗夫还信誓旦旦地向王世杰保证，旅大不存在“致使中国行政机构推迟成立”的任何障碍。^②

在驻旅大苏军的精心布置下，国民政府派出的视察团最终无功而返。^③担任视察团团长的董彦平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指出：（一）苏军已经完全控制旅大，“纵使我在接收行政权后，彼仍能实际统治”；（二）苏军可能利用中共“使我无法建立名实相符之政权”；（三）苏军可能利用条约有关“主要行政人员之任免须顾及苏联之利益”的规定，“令我接收大连亦名存实亡”；（四）接收旅大，既不能制止当地苏军援助中共山东部队，还将引发中长铁路的共管问题，“对我军事上加多顾虑”。^④6月25日，中国外交部公开谴责苏联政府“一再拒绝中国政府军入驻旅大”与援助中共，“阻挠中国政府之接收”。^⑤6月28日，苏联驻华外交代办费德林在给中方的照会中强调，苏联对旅大问题的立场不变。^⑥加上同时爆发的“北塔山事件”，蒋介石认为，中苏关系“已无回旋余地”。^⑦

① 许多中共回忆录提及，此举是为防止国民政府视察团携带大量军用券进入大连，扰乱当地经济秩序，但目前没有任何档案能够证明国民政府的这一意图。最关键的是，货币改革的推动者是苏军，如果真有这一考虑，也是苏军的考虑。参见丁群：《刘顺元传》，第183-184页。

② АВП РФ. ф.0100. оп.40а. д.21. п.264. л.143-14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317-320.

③ 该团于6月2日由沈阳乘火车至葫芦岛，换乘“长治号”炮舰起航，于1947年6月3日抵达旅顺港。成员包括：国民政府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张剑非，行营秘书邱楠，国防部代表陈思永、叶南，中长铁路理事长王竹亭，大连接收人员徐第善、王洽民、朱新民及秘书三人，厨役等。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520-521页。

⑤ 同上，第541-543页。

⑥ АВП РФ. ф.0100. оп.40а. д.21. п.264. л.1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С.332.

⑦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第485页。在苏联方面，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于6月19日启程经新疆返国，直至1948年年中罗申就职新任驻华大使，苏联驻华大使一职空缺长达一年。

通过拒蒋接收，驻旅大苏军最终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操纵成立关东行政公署，严密掌控了旅大地区的行政；组建合营企业，取得了在中苏经济谈判中未能取得的重大利益；进行货币改革，造成了旅大地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中赚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可以说，在这场注定成为“闹剧”的接收事件中，驻旅大苏军是最大的受益者。在苏军一系列部署中，“拒蒋”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借口。莫斯科非常清楚，由于中共部队的存在，国民政府除直接派军进驻，根本无法接收旅大行政权，更遑论接收旅大地区的厂矿企业。至于中共东北局和旅大地委许多负责人提到有关国民政府视察团蓄意造成通货膨胀的做法，则缺乏史料佐证。^①

1947年年中，国际与中国局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冷战在欧洲爆发，极大地牵制了美苏关注远东问题的意愿与精力。苏联方面，如果中共面临“灭顶之灾”，斯大林所愿做的，只是派飞机接中共领导人到苏联避难而已。^②美国方面，美国对华军援“借故拖延、缓急倒置”，提供的多是“不急之物资”。美国政府还取消了5亿贷款的协议^③，明确通告国民政府，只有当中国“保证援助确属有效之时，才能加以援助”^④。另一方面，国共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肃清了吉林、长春以南、四平以东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打通了东、西、南、北满地区之间的联系。国民政府内部“人心动荡异甚，……多数主张放弃东北撤守关内”。^⑤此后，国民党军再也无力派军进驻旅大。^⑥

① 至于国民政府视察团“妄图大连投放苏币扰乱市场”的说法，只见于中共方面的回忆录中。在国民党方面的档案中，并未有任何相关的记录。

②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51-252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战后初期的伊朗北部阿塞拜疆事件中，斯大林对阿塞拜疆分离运动领导人的做法亦是如此。Салех Мамедоглы Алиев. История Иран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ИВ РАН-Крафт+, 2004 г. С.224-225.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第488页；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美取消国民政府五亿贷款之议，改拨子弹一亿三千万”，《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7年），第126页。

④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第493-494页。

⑤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八册），第695页；“1947年6月18日日记”，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六册），第92页。

⑥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3-124页。

苏联“双轨”策略对中共的影响

旅大地区在中共争夺东北以至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45年8月后，驻旅大苏军一面阻挠、拒绝国民党军从大连登陆进入东北；另一方面默许、协助中共部队自大连登陆东北，为中共抢占东北赢得了先机。1946年间，驻旅大苏军不仅对当地中共部队机关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援助，还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关内各解放区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被服物资的重要供应地。驻旅大苏军还在国民党军发动的南满攻势中，对中共部队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并充当了中共部队事实上的大后方。据时任旅大地委副书记的柳亚光回忆，“在内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林一山与辽南省委及军分区退到普兰店，其机关、电台、机要人员都进入旅大地区。国民党进到这儿就不敢往前进了”。^①

1945年8月后，苏军最初接触并帮助中共部队进入东北时，确实存在苏联中下层机构对中国革命朴素的意识形态认同。然而，双方互动的持续，则源于反对美蒋进入东北的共同目标。在苏军看来，蒋介石的军队正在美国的支持与援助下，在东北地区进行“反共反苏”的战争，严重威胁到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安全与利益。^②与此同时，美军在远东的部署也对苏联的远东战略构成了威胁^③，往返旅大的苏联货船正受到美军舰与飞机的频繁骚扰。^④对苏军来说，中共只是适时出现的、维护苏联在中国东北利益的政策性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根本无意将旅大行政权交与国民政府，“拒蒋”部署完全体现了苏军的意志。3月29日梅列茨科夫“突然”抵达大连主持

① “柳亚光〈我所了解的苏军〉”，载于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83页。

②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май 1945-1950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С. 604-605, 607-610.

③ «Из доклад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об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СССР в первом полугодии 1946 г.»(14 августа 1946 г).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май 1945-1950.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С.613.

④ 仅在1947年4月26日至12月30日期间，类似事件就发生了28次。参见«Справка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СССР о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кораблей и самолёт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ветских судов в открытом море»(7 января 1948 г.).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май 1945-1950.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С.635-636.

成立关东公署时，中共虽然感觉到“不论在交接时形势如何”，苏联都必将确保大连行政权“在苏方影响之下”，^①但没有意识到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完成接收。5月4日，中共东北局还就旅大问题做出专门决议，称“旅大政权蒋必接收”，要求旅大地委的“一切布置以服从苏方之外交为主，作长期打算”，尤其要“取得苏方有力支持”。决议还要求中共旅大地委“谨慎清理并坚决转变”现有的工作，并对具体工作作了详细的指导。^②

苏军充分借助了中共的力量，将自身一系列做法冠以“关东行政公署”的名义，努力避免落下阻挠接收的口实。6月3日，在国民政府视察团抵达大连的前夜，驻旅大苏军司令部为检查应付国民政府视察团的一系列部署，举行了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干部依次站立起来，向苏军司令官格里格耶夫上校汇报工作。会后，格里格耶夫上校命令地委书记刘顺元代表公署作公开广播，并提供了苏方事先拟定的广播文本，内容包括：

（一）关东公署是“经过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二）关东公署“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职权”；（三）关东公署“为旅大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等等。虽然刘顺元不愿“昧着良心去欺骗中国的老百姓”，拒绝做这样的广播^③，但苏军这一行为反映了他们主要着眼于掌控当地局势的本意。

苏军的表现中共党内引起了许多不满。^④对于中共而言，由于战争仍在继续，争取革命胜利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东北局因此努力统一思想，避免反苏情绪蔓延，并向苏军传递出坚定的友好信号。9月17日，苏军司令巴申向到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表达不满，抱怨旅大地

① “1947年3月29日，刘顺元、边章五、寒（韩光）关于旅大地区成立政权及人选问题向辽东分局、东北局、中央的报告”，载于陈文登编著：《旅大特殊时期老票证（1945-1955）》，第81页。

② “1947年5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大连工作的决定”，载于陈文登编著：《旅大特殊时期老票证（1945-1955）》，第86页。

③ 丁群：《刘顺元传》，第191页。

④ 甚至在中共方面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时期许多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以合营企业为例。韩光的描述是，中方占股51%，苏方占股49%。而刘顺元的描述则是，中苏分别占股50%。至于成立合营企业的原因，韩光认为是为了活跃市场与贸易，搞活当地经济的需要。而刘顺元则认为，这是苏军控制大连企业与厂矿，并防止国民政府接收的“一举两得”的行为。参见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

委没有处理好同苏军的关系，指名要求撤换刘顺元、唐韵超两人，以韩光作为交涉对象。^①东北局做出了妥协。9月25日，在苏军代表监督下，旅大地委举行内部会议，做出在旅大“为建设与巩固苏军海军军事根据地而斗争”的决议，将刘顺元、唐韵超调离。^②韩光在会上强调，旅大地区的基本特点是“苏联海军基地”，“一切其他特点都应服从这一基本特点”。^③12月6日，南满分局委员江华还在给韩光的信中称，那些质疑苏联的观点都是“狭隘的民族观点”。^④

1948年春，由于贸易问题，旅大地委与苏军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⑤1948年3月，旅大地委在给旅大苏军司令的报告中，委婉地表示，“希望联共同志特别是各地苏军军事当局，能在作风上、态度上有些改进”，同时也表态称，“在关东地区，联共党处于领导地位，因之，其政策原则是决定性的，中共应全力保证其实现”。针对1948年6月旅大地委“六月会议”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以苏为主’就是‘以我为奴’”的说法，以及针对地委领导与苏方“一鼻孔出气”的指责，东北局召开了旅大干部会议。张闻天在会上强调，“以苏为主是对的”，称“苏联管制”“对我们，对东方都有好处”，要求反省盲目的反苏情绪。^⑥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东北局坚定的对苏友好立场，给苏军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48年初，苏联远东各军区边防军的文件中已将国民政府称为“蒋介石匪帮”。哈巴罗夫斯克边防军的报告中则将国共内战直接描述为“进步与反动”两股力量的斗争，称“国民政府根据美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指示，正努力夺取满洲，并在中国人民中间散布关于战胜人民解放军以及美国将进

① “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载于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78-280页。

② “关于刘顺元、唐韵超两同志撤退问题的报告”，载于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1-283页。

③ “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1947年韩光在地委10月会议上的总结）”，载于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4-286页。

④ “江华给韩光的信”，载于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7页。

⑤ “东北贸易总公司第一季度对外贸易工作总结与第二季度对外贸易意见草案”（1947年2月-1948年7月），载于朱建华主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3），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82-305页。

⑥ “洛甫（张闻天）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旅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载于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8-289页。

攻苏联的谎言”。^①针对 1947 年 9 月东北局大批解雇苏联铁路职工的做法，滨海军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为东北局作了辩解，称东北局此举目的是防范国民党间谍，指出“反动的国民政府”为控制东北，在美国驻华情报机构帮助下，将间谍派到了苏联边境。^②1948 年底，针对盛传的美国“决心同共产党接触”声音，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报告指出，苏联与中共在东北互动的“实践经验”，决定了新政权不会“依附美国”。^③

本文通过揭示 1947 年美苏国共围绕旅大行政权接收问题的互动过程，探讨了苏联在此过程中采取的应对策略及影响。本文认为，莫斯科根本无意将旅大行政权交国民政府接收，为应付美蒋的压力，采取了一种“双轨”策略：即一面同美蒋在外交层面展开周旋，虚与委蛇；另一面授意驻旅大苏军“扶共拒蒋”，借助当地中共力量阻挠国民政府接收，最终实现了对旅大的绝对控制。驻旅大苏军在“拒蒋”部署过程中的不少行为，在中共党内引发了分歧与不满。中共东北局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大局考虑，及时平息了党内的不满情绪，向苏方传达出了坚定的亲苏信号，对双方关系的继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1947, the issue of Lv Shun and Da Lian agai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U.S., the Soviet Union,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Moscow did not intend to give the executive power of Lv Shun and Da Lian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u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pressur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ang Kai Shek, it adopted a “two-track” strategy, that is, to conte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ang at the diplomatic level on one hand and to support the Soviet troops in Lv Shun and Da Lian to “help the CPC and refuse Chiang” aiming at controlling Lv

① «Из доклад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об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 участке округа за 1947 г.»(20 января 1948 г.).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май 1945-1950.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С.640 -641

② «Из доклад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об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СССР 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ойск округа за 1947 г.»(12 января 1948 г.).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май 1945-1950.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С.636-640.

③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1948 年 12 月 27 日），载于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 323-324 页。

Shun and Da Lian with the help of the CPC.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neither the capacity nor the willingness to receive the Lv Shun and Da Lian immediately, but actually it did not have any other alternatives. During that period, what the Soviet troops did in Lv Shun and Da Lian caused differences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in the CPC. The recently-decrypting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from various parts reveale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U.S., the Soviet Union, the KMT and the CPC. The Soviet Union's countermeasures and its impacts deserve attention.

【Key Words】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Soviet Union Policy towards China, Soviet Diplomacy, Soviet-U.S.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ачале 1947 г. проблема Порт-Артура и Дальнего вновь привлекла к себе внимание Гоминьдана, КПК, США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совсем не намеривалась передать права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Порт-Артура и Дальне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КР, но в ответ на давление США и Чана, приняла «двухколей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то есть,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ША и Чаном,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дохновила находящуюся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Дальнем советскую армию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КПК,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Чану»,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власти в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ередаче, реализовывая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и Дальн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Р не имело н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и желания сразу получить Порт-Артур и Дальний, но и большого выбора не было. Действ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Дальнем в это время вызвал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и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внутр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едавн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архивы проливают свет на процесс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ША, СССР, Гоминьдана и КПК в 1947 г. вокруг проблемы Порт-Артура и Дальнего. Советская ответ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и влияние достойны вним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 争论、原因及影响*

陈梦莉 张强**

【内容提要】“北方四岛”问题是日俄关系的症结所在。日本一贯主张“北方四岛”是其固有领土，坚持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的政策，日俄关系很大程度上因此而陷入僵局。为突破现实困境，日本国内政界、学界和民众围绕“北方领土”问题有着不同看法。日本国内政界和学界主要形成了激进的和温和的两种看法，不同地区的日本民众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对“北方四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争论的内容不尽相同，争论本身也都具有特定的原因，争论还会对领土问题的解决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北方四岛” 日俄关系 日本内政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5-0137(29)

长期以来，“北方四岛”^①问题是阻碍日俄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 感谢匿名审稿人及《俄罗斯研究》编辑部的中肯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自负。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及其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6BGJ038）的阶段性成果。

** 陈梦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主要探讨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即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和择捉岛的归属问题，俄称“南千岛群岛”。参见李凡：《日本“北方领土”问题政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国内外专家学者已经对“北方四岛”问题进行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讨论^①，但是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国内对“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的关注相对较少。然而，日本国内的有关争论，对“北方四岛”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讨论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原因及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有关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和调查成果，本文首先将从日本政界、学术界和民众三个层面对“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进行分类阐释。其次，笔者将结合争论主体的核心特性，对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之原因进行初步探析。最后，文章将从过去和未来两个时间维度讨论日本国内争论对“北方四岛”问题的影响。通过上述讨论，本文旨在从日本国内视角进一步完善对“北方四岛”问题的基本认知。

一、日本政界、学界和民众围绕“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

通过对“北方四岛”有关档案、学术资料和调查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日本国内政界、学界和民众对“北方四岛”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日本政界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大体可分为两派，即激进派和温和派，双方政

① 中国学者论述可参见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编写的《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论文及资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该书通过原始资料详细分析了“北方领土”问题的来龙去脉；李凡的《日本“北方领土”问题政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是目前国内专门围绕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进行研究的非常详实的著作。基米·奥哈拉（Kimie Hara）和杰弗里·尤尼斯（Geoffrey Jukes）撰写的 *Northern Territorie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Aland Experience*, Routledge, 2009，以阿兰岛屿争议解决方案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日俄领土争议的解决方案。日本木村汎、袴田茂树、名越健郎等研究“北方四岛”问题的激进派学者，从日俄领土交涉史、国际法角度等要求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参见木村汎『北方領土問題を考える』、北海道新聞社、1981年；高野雄一『国際法からみた北方領土』、岩波書店、1986年；明石康、吹浦忠正、袴田茂樹编写『日本の領土問題（虎ノ門 DOJO ブックス）』、自由國民社、2002年；名越健郎『北方領土の謎』、海竜社、2016年。和田春树、岩下明裕等温和派学者，从日俄双边关系角度，主张基于现实利益尽快解决“北方四岛”问题，参见和田春樹『北方領土問題を考える』、岩波書店、1990年；和田春樹『領土問題をどう解決するか』、平凡社、2012年；岩下明裕『北方領土問題——4でも0でも、2でもなく』、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岩下明裕『日本の「国境問題」（現場から考える）』、藤原書店、2012年。

客在“北方四岛”主权和日俄关系方面形成争论。学界争论也大体可分为激进和温和两派，双方学者在“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时间、方式和手段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①。同时，北海道岛民和全国民众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看法也有所不同。笔者在这部分将以阐述日本政界、学术界和民众对“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为核心，旨在明晰日本国内在争议领土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一）日本政界对“北方四岛”问题的主要分歧

日本政府对“北方四岛”的政策上一直缺少连贯性和稳定性，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政府内部的官僚和政治家对“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严重分歧。日本政界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两派，即激进派和温和派。其中，激进派政客在阁僚和自民党内部长期占统治地位，主张立足于历史和法律事实，采取强硬方案解决领土问题。温和派政客则居少数，主张立足于日俄双边关系和现实利益，采取折中方案以尽快解决领土问题。

第一，激进派政客立足于历史与法律事实，坚持要求返还“北方四岛”主权。激进派政客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方案有“一揽子返还四岛”、“政经不可分政策”、“扩大均衡政策”、“多层次接触政策”和“阶段性解决论领土政策”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前首相田中角荣、佐藤优、前外相田中真纪子、日本驻俄大使丹波实等。

首先，历史依据是判定领土归属的重要依据。历史资料自然也就成了日本激进派政客将“北方四岛”视为日本固有领土的重要依据。日本最早于1635年（宽永十二年）进入“北方四岛”，当时日本松前藩的藩主村上广仪对“北方四岛”进行视察后，开始经营这些岛屿。1644年（正保元年），松前藩提出为日本全国国土绘制地图——《正保御国绘图》，这是日本最早的全国地图，其中就包括了“北方四岛”。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有关“北方四岛”的地图，当时日本已经认为“北方四岛”是其领土。沙皇俄国则直到

^① 日本学界对“北方四岛”的争论没有明确的划分，笔者根据政界档案资料、学术资料对领土争论进行归纳，将政界、学界有关“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划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

1691年在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才“发现”堪察加半岛以南海域的这些岛屿，并命名为“千岛群岛”^①。日本激进派政客认为日本最早发现这些岛屿，因此，“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其次，现代条约体系也为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重要依据。二战后，美苏两极对峙，“北方四岛”问题成为美国控制日本并遏制苏联的工具，美国否认《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将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苏联的内容，并在单独起草的《旧金山媾和条约》中要求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的领土主权，但又不写明日本放弃这些领土的归属。日本激进派政客据此认为，《旧金山媾和条约》中未规定“北方四岛”的归属，并以1855年《日俄友好通商条约》（又称《下田条约》）和1875年《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交换条约》^②为依据，强调日本拥有“北方四岛”主权的合法性，要求俄方归还“北方四岛”。日本激进派政客认为，“北方四岛”一直被俄罗斯（苏联）非法侵占，坚持要求返还全部主权的“一揽子返还四岛”和“政经不可分”的政策。

第二，温和派政客主张应该超越争夺四岛主权的狭小视野，构建稳定友好的日俄关系，采取折中方案。折中方案主要包括“平分四岛论”和“新思维”两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首相森喜朗、前首相麻生太郎、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前外务省欧亚局长东乡和彦等。

首先，着眼于安全战略，改善双边关系，以应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温和派政客主张应尽快与俄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妥协，甚至搁置“北方四岛”问题，先与俄罗斯建立密切的安全关系，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周边安全环境。进入21世纪后，面对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衰落，

① [美]弗·阿·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2-1850）》，陈铭康、严四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4-89页。

② 1855年日俄两国签订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日俄友好通商条约》（又称《下田条约》），首次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国界线，规定两国的边界线应在得抚岛和择捉岛之间，因此“北方四岛”划归为日本。《下田条约》从法律上明确了日本对“北方四岛”的统治，也成为现在日本主张国后、择捉二岛不属于千岛群岛的根据。1875年日俄签署《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日本以北纬50度库页岛南部换取俄国拥有的千岛群岛得抚岛以北的18个岛屿，两国之间第一次完整解决了所有边界划分问题，明确了日本完全控制千岛群岛，“北方四岛”归属于日本。

日本当局深感自身安全环境受到巨大冲击，因此，谋求对华战略优势成为日本外交最重要的课题。同时，“慰安妇”和独岛等历史和领土问题成为日韩关系中的掣肘因素，使得日韩关系长期不能稳定发展。此外，日本约有百分之十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这关系到日本的能源安全。因此，温和派政客认为，基于安全战略，构建稳定友好的日俄双边关系对日本尤为重要。但“北方四岛”问题是发展日俄关系的主要障碍，因此应尽快采取折中的方案解决领土问题，以构建稳定友好的双边关系。2006年12月，在日本国会议外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就提出，应尽快采取折中方案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以构建稳定的日俄双边关系。麻生外相提出“面积均分”的折中方案，日本可据此获得“北方四岛”中的三个岛屿和1/4择捉岛，俄罗斯可获得距离其最近的3/4择捉岛。这样的话，俄罗斯可不必返还日本“北方四岛”，只要向日本返还其中的“3.25个岛屿”即可。

其次，着眼于现实的经济利益，与俄罗斯建立密切关系。温和派政客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认为发展日俄双边经济、科技和能源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要胜过继续在领土问题上僵持。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陷入衰退，发展经济成为历届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安倍上台后以稳步推进“安倍经济学”为基础，以“经济外交”、“能源外交”等为手段，全力扭转日本经济颓势。日本拥有资金和技术，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日俄间存在着很大的经济互补关系。安倍二次执政后，为发展日俄双边合作，改善国内经济，放弃了日本政府坚持多年的政经不分离原则，放弃了日本政府在“北方四岛”问题的一贯立场，取而代之的是优先发展经济合作，甚至提出搁置“北方四岛”问题的“新思维”，不断探索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深化日俄双方合作。2013年4月，安倍晋三首相访问俄罗斯，成为十年来首位访问俄罗斯的日本首相。安倍希望修复停滞数年的日俄关系，以加速解决领土问题^①。2016年5月，安倍首相访问俄罗斯，提出八项对俄经济合作计划，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2016年12月普京访日时，安倍首相首次公开谈及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新思维”，意在在远东地区与俄罗斯开展

① 「第183回国会参议院予算委员会会议録第18号」、平成25年5月15日、第24页，<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koho/183/keika/ke2700027.html>

经济合作，在争议岛屿建立“特别制度”，开展联合经济活动。温和派政客的领土解决方案立足于安全 and 经济利益，更加强调改善日俄双边关系。

（二）日本学界对“北方四岛”问题的主要分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木村汎、和田敏明为代表的日本学者^①开始关注“北方四岛”问题，随后研究“北方四岛”问题的学者逐渐增多，并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看法。目前“北方四岛”问题已成为日本学界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根据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学术资料和学者观点，可以将其大体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学者意在长期争取“北方四岛”主权；温和派学者则认为可以不用全部返还“北方四岛”，主张基于互惠互让的原则解决“北方四岛”问题。

激进派学者意在长期争取“北方四岛”主权，拒绝采取折中方案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他们主张“一揽子返还四岛”解决领土问题的强硬方案。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木村汎、新潟县立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袴田茂树、欧亚大陆 21 研究所理事长吹浦忠正、名越健郎、落合忠等。

首先，激进派学者坚持长期争取“北方四岛”主权。他们主张以“等待”的姿态静待变化，争取“北方四岛”的主权，认为谁等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木村汎作为研究“北方四岛”问题第一人，曾为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中心研究所所长。他认为，虽然现在返还“北方四岛”面临困难，但随着国际形势和俄罗斯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有利于返还四岛的形势将会出现。2012 年 12 月 4 日，木村在众议院冲绳及北方问题相关特别委员会提出：“日本要坚持忍耐再忍耐的战略，应该等待机会的来临，当机会来临时一定抓住机会”^②。而在此之前，“不实现四岛返还而仅以返还两岛告终是不划算的妥协”^③。

① 参见木村汎『北方領土問題を考える』、北海道新聞社、1981 年；和田敏明『北方領土と日ソ打開』、叢文社、1982 年；和田敏明『北方領土の幻覚』、叢文社、1981 年。

② 「第 185 回国会衆議院沖繩及び北方問題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議録第 3 号」、平成 25 年 12 月 4 日、4 頁，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2518520131204003.html

③ 同上。

欧亚 21 研究所理事长吹浦也同样认为：“等待是最有利的选择”“不能对返还四岛做出妥协，如果轻易做出让步的话，会使日本在国际社会其他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①。新潟县立大学袴田茂树教授认为，“现在即使返还两岛也不现实”，“对日本的政治家、媒体、舆论完全忽视俄罗斯现实状况而抱有过于乐观的幻想，表示深深忧虑”^②，“将来时机可能来临，但从客观情况看现在还不合适”。他认为，首先应该明确日俄双方在领土问题中的基本意图，在此基础上促使俄方同意将双方领土交涉范围扩展到色丹岛和齿舞岛之外的国后和择捉两岛。^③

其次，激进派学者拒绝相关妥协方案。木村汎认为，作为下下策的妥协政策不可能实现返还四岛，最后肯定以返还两岛告终，因此不应降下返还“北方四岛”的旗帜^④。木村对日俄双方在“北方四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方案予以否定。他认为开展联合经济活动不仅给俄罗斯带来很多现实经济利益，还为其依据俄罗斯法律裁定现有争端提供了机会，此外，会使日本为经济利益最终放弃返还“北方四岛”，对俄罗斯而言，可谓“一石三鸟”，何乐不为。木村认为，对“北方四岛”进行共同经济开发，“可能会给日本带来危险”^⑤。

激进派学者主张长期坚持“北方四岛”主权，而温和派学者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提出了不同于激进派学者的主张。

温和派学者认为，并不一定要求全部返还“北方四岛”，主张基于互惠互让的原则解决“北方四岛”问题。温和派学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有“二岛返还论”、“2+ α 理论”、“三岛返还论”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和田春树、岩下明裕、孙崎亨等。

① 吹浦忠正「安易な譲歩は禁物、「天の時」を待て」、『外交』2013年第19卷第5号、102-103頁。

② 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日ロ関係研究会編『東京とモスクワ—改善のチャンスは近いのか—』、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2013年、134頁。

③ 袴田茂樹「毎日新聞の世論調査は設問自体に問題あり」、『議論百出』，[http://www.gfj.jp/cgi/m-bbs/contribution_history.php?form\[no\]=2303](http://www.gfj.jp/cgi/m-bbs/contribution_history.php?form[no]=2303)。(上网日期2016/12/2)

④ 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日ロ関係研究会編『東京とモスクワ—改善のチャンスは近いのか—』、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2013年、221-222頁。

⑤ 木村汎「プーチン氏の水も辛い北方領土」、『産経新聞』2012年2月7日。

首先，温和派主张并不一定全部返还“北方四岛”。包括岩下明裕、森本良男、原辉之等在内的历史学家均支持“二岛返还论”，仅要求返还色丹和齿舞两岛。和田春树主张的“2+ α 理论”中“2”是返还齿舞、色丹二岛，而“ α ”有多个版本，一种是择捉岛和国后岛二岛也一并返还，一种是把择捉岛和国后岛作为特别经济区共同开发，还有一种是将二岛移交给联合国或海牙国际法院托管。岩下明裕教授提出“三岛返还论”，认为这种理论成功解决了中俄之间的领土争端，而解决中俄问题的经验同样也适用于解决“北方四岛”问题。

其次，温和派学者认为，稳定友好的日俄关系比日本拥有四个小岛更具有意义，主张立足于互惠互让的原则解决“北方四岛”问题。温和派学者主张，要尝试采取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政策，在政治互让和经济互惠的基础上解决领土划分问题，并建议以择捉岛南部边界为限，划分日俄之间的边界^①。岩下指出，“历史在争论中缓慢前行，应该从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再等待合适时机采取具体方案。

（三）日本民众的主要分歧

日本《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北海道新闻》、北海道大学以及国后、择捉新闻等媒体和机构曾就“北方四岛”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反映了日本民众的相关民意诉求。日本国内民众根据与自身利益相关程度，在“北方四岛”返还的时间、方式和手段上存在不同看法。由于“北方四岛”问题与全国民众自身利益相关度较低，因此，全国民众仅仅出于民族尊严主张强硬的领土政策，并不急于争取领土归还。然而，与此相反，作为领土纷争所在地的北海道民众则更倾向于“先行返还两岛”的妥协政策，希望尽快解决领土问题。

第一，全国民众对“北方四岛”返还运动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倾向于采取强硬的领土政策。2008年，日本内阁府做了一项针对“北方四岛”问题的特别世论调查，这是自1969年以来日本政府首次就“北方四岛”问题进行

① 岩下明裕『北方領土問題—4でも0でも、2でもなく』、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122頁。

的世论调查^①。本次调查以全国 20 岁以上的三千人为调查对象，调查项目包括“北方四岛”问题的认知度、对“北方四岛”返还要求运动的认知度、参加返还要求运动的积极性和看法、不想参加返还要求运动的理由。调查结果显示，95%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北方四岛”问题，80%以上受访者对其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85%以上受访者表示听说过“北方四岛”返还要求运动并有接近 50%的受访者表示对此比较熟悉；但仅有 34.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北方四岛”返还运动，仅有 2%的受访者表示能积极参加，但参与积极性并不高。由此可见，大部分日本人实际上对“北方四岛”问题并不关心。坚持返还“北方四岛”，坚持对俄强硬的领土政策，更多是出于民族夙愿和民族尊严。

第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北海道地区民众对“北方四岛”的关注度也存在差异。由于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领土争议区的民众对“北方四岛”的关注度最高，反应最为激烈。首先，在北海道地区内，民众受到利益关系、距离远近和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对“北方四岛”的认知呈现多样化特点。2005 年，北海道大学与北海道新闻就政府的“一揽子返还四岛”方针，对北海道居民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根室、别海、中标津、标津、罗臼等根室管辖区各 100 人，札幌、函馆、钏路、小樽、稚内各 100 人，共计 1000 人。根室管辖区 5 市有 42%的市民表示需要重新考虑政府“一揽子返还四岛”的方针，后 4 市有 73%的市民表示支持政府“一揽子返还四岛”方针。在根室管辖区主张重新调整方针的改革派中，标津占到 30%，罗臼占到 26%。其后 5 市靠近根室的钏路市主张改变路线的占到 31%，函馆和小樽基本不受北方领土问题影响，主张改变路线的被调查者，函馆占到 19%，小樽占到 16%^②。由此看来，与“北方四岛”距离远、没有利害关系的地区，缺乏解决问题的“紧急性和迫切性”。因为“北方四岛”对自身生活基本不造成影响，比较容易坚持原则派，支持政府“一揽子返还四岛”的方针。相反，从事渔业的相关地区更主张改变思路，灵活应对。因此，不仅不同地域间民众立场存在差异，

① 参见石郷岡建著、ユーラシア研究所ブックレット編集委員会編集『論点整理 北方領土問題』、東洋書店、2012 年、171 頁。

② [日]「北口四島の口括返還の調査」、『北海道新聞』2005 年 11 月 21 日。

从事不同职业的民众也存在差异和影响。总之，对于那些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民众来说，更希望尽早尽快解决领土问题。

其次，根室一带的原岛民更主张“先行返还二岛”。战前居住在“北方四岛”的原岛民现大多居住在根室一带。从战前战后“北方四岛”岛民分布可以看出，战前日本人在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群岛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14、4.94、4.14、55.59（单位均为：人/平方公里），战后俄罗斯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87、5.36、11.6、0（单位均为：人/平方公里）。战前仅占北方领土面积2%的齿舞群岛居住人口达到5000人，而战后齿舞群岛仅有军人驻扎，并且仅有3000俄罗斯人居住在色丹岛。自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签订后，色丹岛就被视为“抛弃的岛屿”，因为岛屿返还问题而一直未得到开发。现在俄罗斯人明显倾向于选择居住在择捉岛北部，而战前日本人口明显倾向于居住在靠近根室的地域。根室地区与色丹、齿舞两岛从战前就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根室地区更希望采取“先行返还二岛”的灵活方针。

2013年2月，日本政府派前首相森喜朗到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会谈，双方就《日苏共同宣言》再次交涉。在出发之际森喜朗通过CS卫星广播，寻求民众“在国后和择捉岛之间划定界线——即三岛返还论”的意见。东京有报纸就认为，“根室肯定会反对该提议”。但事实正相反，大多数根室民众作为原岛民，在内心更支持妥协政策。近年来，根室地区居民并没有将“北方四岛”捆绑为一个整体，主张先行返还色丹和齿舞二岛的声音非常强烈，更期待政府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策略。

总而言之，日本国内围绕“北方四岛”问题形成了许多争论。在日本政界，激进派政客长期主导“北方四岛”问题的决策权，在与俄罗斯的领土交涉谈判中坚持强硬政策。随着“北方四岛”问题久拖未决，日本政界出现了越来越多为尽快解决领土问题而主张妥协的温和派。在日本学界，随着研究议题的转变，围绕“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变得愈发激烈。全国民众和北海道民众对“北方四岛”问题的认知也有明显差异。然而，种种争论皆有其背后的原因，为了进一步探讨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案，突破领土困境，对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争论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十分必要。

二、日本国内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争论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北方四岛”问题悬而未决，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内政界、学界和民众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争论有关，而这些争论的产生都各有其独特的原因。笔者根据每个争论主体的核心特性，对产生争论的原因进行初步探析。大体而言，日本政界产生争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实力的变化两个方面。日本学界产生争论的原因则可以从研究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理解。此外，由于对“北方四岛”不同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也使日本民众在领土政策上形成争论。

（一）政界产生争论的原因

二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政界围绕“北方四岛”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很大程度上与国际环境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变化有关。一方面，美国的制约和中国的崛起影响俄罗斯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这是日本政界在领土问题上产生争论的重要外部因素。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实力的变化成为影响日本政府领土政策的重要内部因素。

第一，随着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日俄（苏）双边关系和“北方四岛”问题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同。首先，冷战政治结构和美国因素对“北方四岛”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日本政界关于领土问题产生分歧的根源之一。“北方四岛”问题很大程度是美苏两极对峙的产物。从战后到 50 年代初，日苏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并未凸显。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认为国后和择捉两岛属于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的南千岛群岛。但是，在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由于美苏冷战，美国和日本国内亲美派抛出“北方四岛”问题，竭力遏制日苏关系改善。在日本政界，主张调整日苏关系的“鸠山派”与坚持追随美国的“吉田派”，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开始形成争论。民主党“鸠山派”主张在“北方四岛”问题上进行弹性交涉，希望日苏双方能尽快达成妥协；“吉田派”自由党则主张同时返还“北方四岛”，反对尽快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争论的结果，日本最终改变在“北方四岛”问题的态度，确认“‘北方四岛’不属于千岛群岛的历

史事实”，首次提出“北方四岛”问题，要求苏联归还包括国后和择捉两岛在内的北方领土。冷战时期，日本在美国的安全庇护下专注于发展经济，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基本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缺少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意愿。在“旧金山体制”下，美国和日本亲美派主导了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领土政策。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反苏反共的重要堡垒之一，因此，美国绝对不允许日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达成和解。其次，日本为防备崛起的中国争夺东北亚主导权，积极改善日俄关系，以求分裂中俄关系，牵制中国，力图打造新的“实力平衡”。^①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日本为了提升自身处在下滑趋势中的政治地位，积极改善日俄关系，以拉拢俄罗斯来牵制中国。安倍第二次执政后，为应对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亚太力量平衡的变化，提出了立足日俄双边关系先行发展经济的“新思维”，欲与俄罗斯加强经济合作，甚至搁置“北方四岛”问题，促使两国签订和平条约，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因此，以安倍为代表的温和派政客与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和返还四岛的激进派政客形成争论。总而言之，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是日本政界在领土问题上产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日本试图利用经济上的相对优势，迫使或推动俄罗斯（苏联）在“北方四岛”问题上让步和谈判。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政府试图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在领土问题上的话语权，利用自身经济优势迫使苏联（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做出让步。田中首相提出关于领土政策的“政经不可分”原则，成为冷战时期日本对争议领土的主要政策。但事实证明，日本尚无能力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并因此错失了在苏联解体时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以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和森喜朗为代表的一部分政客提出逐步返还“北方四岛”的灵活政策，加强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国内坚持强硬领土政策的政客形成争论。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提出先行发展日俄双边经济关系的“新思维”，意在为解决“北方四岛”问题营造良好的氛围，推动俄罗斯与日本在领土问

^① 有学者也认为是日本战略需求促成日俄关系接近，日本对俄关系接近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牵制中国。详见阎德学、孙超：“日俄接近新态势评估”，《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

题上的谈判，与国内激进派政客形成争论。

（二）学界产生争论的原因

日本学界研究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变，导致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日本学者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产生争论。日本学界研究议题从“高级政治”到“低级政治”的转变，导致主张发展日俄间经济合作关系的学者与原来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的激进派学者形成争论。同时，温和派学者采用了原先使用的历史研究路径和文献解读之外的其他研究方法，如运用调查访问和个案研究等社会科学方法，使得认识领土问题的角度和内容更为广泛和丰富，从而在领土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研究议题从“高级政治”到“低级政治”的转变，是日本学者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产生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学界，对苏研究议题逐渐由原来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低级政治”范畴，研究议题更丰富和更具现实意义，而不再单纯地局限在领土和安全领域。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两极对峙结束，日本学界原来围绕如何对抗苏联的中心议题消失，研究活动逐渐超越传统的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国际环境和研究议题的转变使日本学者不再狭隘地关注领土和安全问题，而是基于国际环境中增加的新因素和国内现实因素，主张试图通过日俄间经济、科技、文化等低级政治的合作外溢到政治、领土等领域的高级政治合作，由被动的领土对抗政策转向积极的经济合作政策。冷战对峙的结束为领土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全新的时代背景，在“北方四岛”问题研究上出现了许多新动态和新进展，出现了更多呼吁灵活处理争议领土、发展与俄经济关系的声浪，与坚持“政经不可分”和返还四岛政策的激进派学者形成争论。

第二，日本学界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是日本学者在“北方四岛”问题产生争论的又一重要原因。激进派学者主要采用历史研究路径和文献解读方法，以此找到最有利于证明“北方四岛”归属于日本的历史史实和证据，并从以往与俄罗斯（苏联）交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为制定相关强硬的领土政策寻找依据。温和派学者则更多运用调查访问和个案研究等社会科学方

法。温和派学者不再从国家的整体视角来研究“北方四岛”问题，而是着眼于如何从国家内部的经济和技术等领域为解决“北方四岛”问题创造条件。温和派学者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呈现出以实现日俄双边关系改善为目标，以有效运用国家经济实力为手段，调动所有资源，以实现领土问题的解决。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温和派学者对日本领土问题决策机制的探索具体到了个人层次，以个人层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重视官僚政治对领土政策的影响，试图利用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为解决“北方四岛”问题创造机会。因此，日本学界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促使激进派政客和温和派政客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产生了更多的分歧。

（三）日本民众产生争论的原因

国内外学者研究日本国内民众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看法时，往往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实际上，日本民众在领土问题上的看法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日本全国民众更多出于民族尊严，坚持采取“返还四岛”的强硬政策，坚持贯彻原则论而非考虑现实性。而在利益纷争所在地的北海道地区，则更多是从现实利益考虑，希望尽快解决领土争端。根室一带的很多民众与日本政府立场不同，他们支持“二岛返还”的领土政策。这反映了日本民众就“北方四岛”问题产生争论的主要原因：即象征着民族尊严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记忆导致强硬民众立场的产生，而现实经济利益则导致民众温和立场的产生。

第一，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影响全国民众对“北方四岛”问题的认知和看法。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历史记忆则是人们对历史的解读，并渗透进普通民众的社会政治意识之中。历史上日俄通过战争改变领土划分，战后签署的条约和协定，成为日本民众的共同政治遗产，而这些政治遗产又成为了日本争取领土主权的历史依据。日本民众对“北方四岛”和日俄关系史的记忆和解读，影响其对俄罗斯和“北方四岛”问题的认知，形成了“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民族意识，并对俄罗斯充满敌意。也因此，岛屿的回归被民众视为一种国家使命，否认这种国家使命就是对民族尊严的严重损坏。因此，日本民众一方面不愿意妥协，另一方面推行诸如历史和法律等原则，将俄罗

斯置于“公理”的对立面。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被日本民众视为在俄罗斯面前维持民族优越性和独特性的重要标志。

第二，日本北海道根室的边境居民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倾向于采取灵活的领土政策。作为领土纷争所在地的民众，受到领土争议的影响较为强烈，强硬的领土政策使争议领土区域的民众很难实现现实的经济利益。因此，靠近领土争议区的民众希望通过舆论工具来影响政府的政策，主张从本国经济发展出发，呼吁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认为有必要敲定某种折中方案，促使彼此关系早日实现正常化。领土争议区民众相信，日俄关系的正常化是实现其自身现实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之一，从而与全国民众所主张的强硬策略显不同。

日本政界、学界和民众对领土问题产生的争论都各有其原因，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为日本政府所忽略。因此，日本在与俄罗斯的博弈中，既要考虑俄罗斯的诉求，又不得不考虑这些国内因素对解决领土问题的深刻的影响。

三、日本国内争论对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影响

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使日本政府陷入了“双层博弈”之中，在过去和未来都对日俄双方解决领土问题产生重要影响。从过去看，日本国内争论使日本政府错失了解决领土问题的许多良机，导致日俄双方的“北方四岛”问题逐渐固化。从未来看，日本政府依然要考虑国内争论，日本要在未来对俄博弈中寻找国内支持，就不得不面对如何协调国内争论的问题。

（一）日本国内争论与日俄领土问题的固化

简要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日本国内的有关争论对日本政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政界和民众的争论，让日本在对俄（苏）博弈中裹足不前，从而错失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机会，并进而逐渐导致了领土问题的固化。

第一，日本政界争论使日本政府几次错失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时机，导致领土问题固化。尽管日本政界的争论可以归为激进派和温和派，但实际上日本政界的内部争论涉及范围极广，主要涉及日本政党、政党内部派阀、外务省内部派阀等等。正是由于日本政界牵连甚广的争议，导致了日本一直在争取归还两个岛屿还是争取归还四个岛屿上犹豫不决，在岛争问题上患得患失，飘忽不定，缺少连贯性和稳定性，进而在对俄（苏）博弈中丧失主动权，导致领土问题陷入僵局。在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都曾出现过解决领土问题的机会，但是日本政界分歧较大，错过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机会。此后日方虽采用各种对策力图实现返还四岛，但苏方在领土问题上不肯再做出让步，结果交涉都归于失败。1955年6月到1956年10月间，日苏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日本国内首相和外相为争夺外交权限相互争论，深刻地影响了日苏谈判进程。在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从“希望同日本采取睦邻政策的愿望出发”，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将齿舞和色丹返还日本。苏联立场的松动为解决“北方四岛”问题提供了机会。然而，日本国内则陷入了“返还四岛”与“先行返还二岛，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两种方针的斗争之中。日本代表松本俊一提出“先行返还齿舞、色丹两岛”领土交涉的最低条件，但外务省以“追加训令”方式增加了与苏联在领土交涉方面的新条件，否定了松本俊一“回避对齿舞群岛、色丹岛以外的领土归属问题”，坚持要求返还“北方四岛”，阻止日苏两国伦敦谈判达成妥协，最终使得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谈判无果而终。

第二，政治精英为争取国内民众选票，更倾向于坚持强硬的领土政策，导致领土问题固化。随着政党派阀在政党选举中影响力的减弱，政党的国会议员更加顾虑国民情绪而不是派阀影响力。冷战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趋强烈，外交领域的政策议题更容易聚集选民的政治共识，领土议题成为政治精英争取更多选票的集票工具。政治精英逐渐意识到领土问题是在选举中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筹码，而在领土问题上越坚持强硬的主张，越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因此，公众舆论成为日本各路政治精英制定“北方四岛”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正如前文所述，因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坚持“返还四岛”的强硬政策的日本民众占多数，这就决定了政党选举的大局。而关心现实经

济利益、主张采取温和政策的民众占少数，他们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政党选举的局势，因而其诉求往往被忽略。因此，日本政府很容易在领土政策上“一边倒”，倒向“返还四岛”的强硬政策，从而导致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难于妥协，进而陷入僵局。

（二）协调国内争论以寻找对俄博弈的国内支持

自“北方四岛”问题形成以来，日本国内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日本国内争论在日本对俄博弈中实际上起到了负作用，导致“北方四岛”问题逐渐固化。如果未来想要在对俄博弈中寻求国内支持，那么日本就需要协调国内争论。根据前文对日本国内争论阐述，大致可以就日本未来如何协调国内争论，寻求对俄博弈中的国内支持，进行初步的推断。

根据激进派和温和派相关领土争端的主张，双方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方案主要有以下七种，其中包括四种激进派方案和三种温和派方案。（见图示 1）激进派的方案主要包括：①一次性返还“北方四岛”；②分两部分返还，继续就剩余部分进行交涉；③先行返还三岛，继续就剩余一岛进行交涉；④先行返还二岛，继续就剩余二岛进行交涉。温和派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相关方案主要包括：⑤根据面积均分四岛；⑥返还三岛后妥协；⑦返还二岛后妥协。在这七种方案中，第①到④种解决方案的前提都是承认“北方四岛”归属于日本，其后在日俄间达成协议，故而属于激进派方案；第⑤到⑦种解决方案没有明确归属地，因为日本急于妥协，所以不能达成返还四岛的要求，故而属于温和派方案。

在这 7 个方案中，日俄间最容易达成妥协，又不会在双方接壤地区引起纷争的方案，是在第⑥种方案基础上双方共同统治择捉岛，在第③种方案和第⑥种方案之间达成妥协。虽然日本最希望采取激进派的第①种方案，但其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最不可能接受的。按照此方案，日俄间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而温和派的第⑦种方案，把仅占北方四岛 7% 的色丹和齿舞两岛归为日本，对日本来说是最不可能接受的方案，日俄间也不可能达成妥协。对日本来说，最低限度的交涉条件是激进派的第④种方案，返还二岛后继续就剩余领土进行交涉。对于温和派的第⑤和第⑥种方案，北方四岛全面积为 5036

平方公里，择捉岛面积为 3184 平方公里，因为择捉岛已超过北方四岛的一半，所以第⑤种方案要比第⑥种方案对日本更有利。但第⑤种方案实际上会使日俄国境线发生变更，进而产生经济难民、不法入境者等问题，使日俄关系再度恶化，形成日俄对立的新因素。而激进派的第②种方案，因俄罗斯在对日领土交涉中不可能转让其在择捉岛海域的权利，所以第②种方案的结果很可能与第⑤种方案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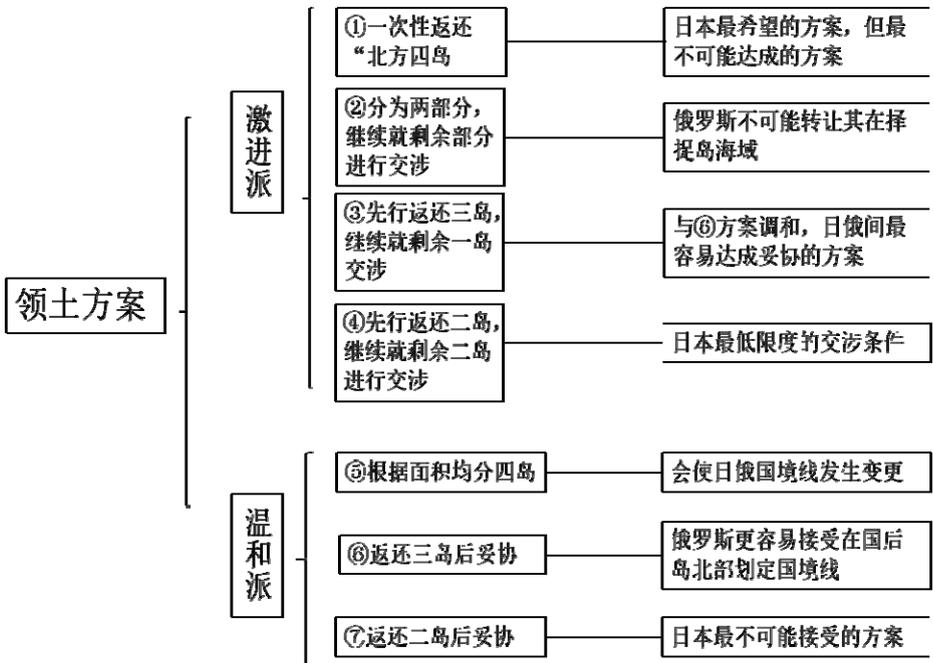


图 1 日本国内的七种领土解决方案及可能结果

对于温和派的第⑥种返还三岛的妥协方案，与根据面积划分四岛相比，俄罗斯更容易接受在国后岛北部划定国境线。因日俄间不存在陆地接壤，所以不涉及国境警备，对于不法入境者等问题也会很容易处理。但这种方案，日本做出的妥协和让步会比较大。其实，即使按照最不可能实现的第①种解决方案，达成一次性返还“北方四岛”，但让所有的俄罗斯岛民离开岛屿也

是不现实的，至少在争议领土会存在日俄岛民混住或者承认双重国籍。这种方案虽然承认了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但实际在统治形态上与第⑤和第⑥种方案接近。综合以上7种解决方案，日俄间最能达成妥协的方案是在第③种方案和第⑥种方案之间达成妥协。如果能调和国内争论，在激进派的第③种方案和温和派的第⑥中方案之间达成妥协，那很可能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但如果继续坚持激进派的“一揽子返还四岛”的政策，领土问题将继续陷入僵局。

日俄两国是互补性很强的邻国，如果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相互妥协的方案，势必对两国的发展都更加有利。因此，当前日俄两国都认为有必要敲定某种折中方案，促使彼此关系早日实现正常发展。日俄双方重启领土问题的相关谈判和安全对话机制，表明了双方缔结和平条约问题的态度。尽管日俄双方都希望共同探讨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案，并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不断深化合作，但是由于受国际环境和国内争论的制约，“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依然困难重重。

【 Abstract 】 “The Kuril Islands” issue is the key problem to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hip. Japan has consistently advocated that “the Kuril Islands” are its inherent territory and insisted that Russia return them. The Japan-Russia relationship has, to a great extent, been trapped in an impasse.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different views on “the Kuril Islands” issue appear among Japanese political elites, within academic circles and Japanese people as well. Radical and mild views have been formed within Japan’s domestic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Japanese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views regarding “the Kuril Islands” issu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ontent of these debates is not the same and there are specific reasons to these debates. Besides, debates will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issues.

【 Key Words 】 “the Kuril Islands”, Japan-Russia Relationship, Domestic Politics in Japan

【 Аннотация 】 Проблема «север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 это суть япо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всегда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что «север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вляются её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и настаивает на политике возвращения Россией «север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Япо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зашли в тупик. С цел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нынешней дилеммы во внутри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в среде учёных и в обществе Японии стали высказываться различн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тике «север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круги Япон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два типа взглядов: радикальный и умеренный. Японские граждане в раз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и в раз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ериоды также высказывали разные мн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евер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одержание этих дебатов не только схоже, сами дебаты имеют конкретные причины, но они также оказываю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евер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Япони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苏）认同**13-14 世纪中俄文化认同的趋同性***

郭小丽**

【内容提要】中俄两国正式交往不过四百年的历史，却往往彼此为镜，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尽管中俄两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及民族性格并不相同，但在国家治理方面曾经具有某种相似性。早在古代时期，草原文化就影响过东斯拉夫和华夏民族，到 13-14 世纪，中俄两个民族都处在蒙古帝国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其文化和治理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俄两国，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也经蒙古人传到俄罗斯。因此可以说，在中俄两国正式成为邻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彼此影响和相互认知了。

【关键词】中俄文化认同 俄国民族心理 俄国民族性格 蒙古帝国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5-0157(28)

13-14 世纪，蒙古鞑靼人^①统治了罗斯和中原大地，他们首先建立了金帐汗国（1219 年-1502 年，中国史书上称为“钦察汗国”），之后迫使罗斯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本我与他者——中俄关系中的形象与认知问题”（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5）的阶段性成果。

** 郭小丽，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承担者、兼职研究员。

① 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惯例，哪个部落强盛，就以其部族名称来概称草原诸部。在铁木真（成吉思汗）崛起前，塔塔儿部最强盛，整个漠北于是概称“鞑靼”。而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崛起后，整个漠北草原又概称“蒙古”。可能因为“蒙古”和“鞑靼”之间存在一种强弱兴替的历史联系，所以直到现在，在俄语和其他语言中，仍把“蒙古鞑靼”放在一起混称。

依附于它，即史上称为“鞑靼桎梏”的时期（1243-1480）。^①在东方和南方，蒙古人在中国开启了新的时代——元朝（1271年-1368年）。金帐汗国名义上是属于元朝的“宗藩之国”，^②承认元朝大汗为其宗主。另一方面，罗斯诸公国与金帐汗国是“依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金帐汗的“宗藩之国”，所以说，中俄两个民族都曾处在蒙古人建立的草原帝国的治下，分别属于西部兀鲁思（术赤兀鲁思）^③和东部的中央兀鲁思，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诸王特别是金帐汗国与中央兀鲁思的依附关系越来越弱。根据《元史》的记载可以判断出，1260年，蒙古帝国的中央政权解体，金帐汗国基本独立。1302年，金帐汗的脱脱汗协助元朝出兵并打败敌人后，归顺元朝，1308年，元武宗册封脱脱汗味宁肃王。1314年，继位大汗的月即伯也受到元仁宗的册封，双方经常派遣使者往来。1337年，元朝专门设置了总管府，用以掌管术赤后王平阳等处分地岁赐。俄文中“中国”（Китай）一词，就是从突厥语和蒙古语传到俄语中去的。俄罗斯学者萨莫伊洛夫（Н.А. Самойлов）指出：“到俄罗斯的第一拨中国人很可能是在蒙古人远征军时期。在拔都汗率领的到达东欧的那些人当中，就有‘中央帝国’^④的人。（中国）最早提到俄罗斯（鞑罗思）的也是120卷的《元史》，里面提到蒙古人远征、包围和攻占俄罗斯城市。”^⑤伊凡诺夫的汉学研究也表明，中国历史

① 目前俄罗斯有了新的说法，叫作“依附”。

② 在元代的汉文史籍中，常把金帐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统称为“西北诸王”，出这些汗国之外，还有中国史书少有提到的克里米亚汗国。其中，金帐汗国离罗斯最近，离中国最远。14世纪末，金帐汗国呈现衰败局面。花刺子模、克里木汗、保加尔逐渐从金帐汗国中分裂出去，金帐汗国同时又遭到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侵袭。到15世纪时，金帐汗国已经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小汗国。金帐汗国在名义上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自称是“宗藩之国”，但实际上具有较高的独立地位。

③ 俄罗斯最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中写道：“当时北部罗斯的公国并非有主权的占有地，而只是向鞑靼人纳贡的兀鲁思。”参见《俄国史》，贾宗谊、张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二卷第33页。

④ 俄罗斯学者巴热诺夫将“中国”一词翻译成“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中央帝国，并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

⑤ Самойлов, Н.А. От баланса к колониализму.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т их зарождения до 1917//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я---четыре век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М., 2013. С.15

上首次出现与俄罗斯相关的信息是在蒙古人入侵时期。^①俄罗斯学者卢金认为，中国 14 世纪史料中提到过俄罗斯军团，很可能是由被驱赶的俄罗斯居民组成的。^②关于俄罗斯军团，中国也有相关记载。当时金帐汗国与元朝是“宗藩”关系，早在窝阔台时，就有驿道从中原通向金帐汗国，据当时欧洲商人、教士和阿拉伯旅者说，走这条道路非常艰难，但很安全。据载，很多中国工匠被迁到金帐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金帐汗国俄罗斯士兵和工匠入居元朝的更多：“钦察（金帐汗）贵族至成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权臣。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收聚境内斡罗思人（罗斯人）一万为军，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以总之，于大都境内给田一百顷屯种。大批斡罗思人（罗斯人）移居中国，为历史上前所未有。”^③这些研究意味着，中俄两国在蒙古鞑靼时期就有直接交往并对彼此产生了概念。

由此可见，当时分别处在欧、亚大陆的中俄两国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可以说，中俄两国在彼此相互认知之前，就已经通过蒙古人对彼此的文化产生过影响，一方面草原帝国同时对中俄两国文化产生了影响，尤其在政治方面，如国家治理方式；另一方面，中国以较高的文化势能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征服者，并通过征服者将中国文化的部分因子传递到了俄罗斯。以上两点使得中俄两国在相互认知之前，就在文化认同上具有了某种共性。俄罗斯和中国学界对本国 13-14 世纪时期的历史都很关注，但大多局限在蒙古对俄罗斯或中国的影响上，比如蒙古鞑靼对古代罗斯的影响以及成吉思汗帝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蒙古给两国文化带来的共同影响还较少有人关注。也许 13-14 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就为中俄两国在文化认同以及国家建制方面的某种相似性打下了基础。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内，蒙古人同时控制了罗斯民族和汉民族，这客观上使得两个民族在成为邻居之前就开启了直接对话、相互了解和相互影响的进程。

① Иванов.А.И. Походы монголов на Россию по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Юань-ши// Записки разряда воен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археограф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15.

② [俄]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刘卓星、赵永穆、孙凌齐、刘燕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③ 韩儒林等著：《元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118-119页。

一、俄罗斯对蒙古鞑靼的认知及评价

毋庸置疑的是，蒙古人灭亡了大宋，建立了新的王朝，对此中国学界并不存在争议，但蒙古鞑靼人对罗斯的控制问题则是存在争议的。俄罗斯历史上将鞑靼的统治称为“鞑靼桎梏”（*татарское иго*，又译“枷锁”），尽管有人已经建议教科书将其改为“对蒙古的依附”，但桎梏的概念毕竟使用了若干世纪，体现了大时段内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据波兰编年史家杨·德鲁戈什（Ян Длугош）考证，早在15世纪，俄罗斯就出现了“桎梏”一词。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列兹尼奥夫（Ю.В. Селезнев）研究了俄罗斯编年史后，认为第一个使用“桎梏”一词的俄罗斯人是拉季舍夫。^①达里词典对“桎梏”的定义为“精神上的负担，管理上的压迫，异族的控制和奴役，奴隶制度。”奥热果夫（Ожегов）字典解释得比较泛泛：桎梏是指一种压迫和奴役的力量。

在众多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中，关于蒙古鞑靼人及金帐汗国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对于蒙古鞑靼统治的性质和评价，俄罗斯的主流思想界一直在发生变化，18世纪之前，对鞑靼的统治较多持否定态度，因此才用“桎梏”来称谓这段历史时期，人们强调的是蒙古人对于俄罗斯文化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影响。

鞑靼罗斯时期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反映的大多是鞑靼进犯时罗斯人民顽强反抗的历史。在整个200余年的鞑靼统治下，罗斯人民始终没有放弃抗争。无论是主沦陷区，还是弗拉基米尔城或者东北罗斯其他城市，虽然有的大公为了私利依附于汗国的统治，但在整个罗斯大地上，一直有一股不屈的力量暗潮涌动、此起彼伏，顽强地抵抗着异族的统治，特别是西方和西南方的罗斯地区，如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洛棱斯克、波洛茨科等地。比如丹尼尔大公（Даниил галицкий），曾给予鞑靼人好几次致命的打击。最重要的是，罗斯民众万众一心，坚决抵抗侵略者。在俄罗斯古代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有大量作品描绘蒙古鞑靼人的入侵以及罗斯人民奋起反抗的场

^① Селезнев Ю.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понятия «монголо-татарское иго»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замет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2. №4.

景，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俄罗斯大地覆灭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大多讲的是鞑靼人如何毁灭罗斯城池。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中讲道，拔都收下梁赞大公儿子费德尔送来的礼物后，还要梁赞王公们把自己的姐妹女儿也送给他，特别要费德尔进献妻子。费德尔愤然道，只要你打败我们，就可以占有我的妻子。拔都大怒，杀死了费德尔一行人，大公年轻貌美的妻子闻讯后，抱着怀中的婴儿坠楼而亡，绝不给敌人侮辱的机会。梁赞大公和梁赞人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战场。杀敌时“一当千，千当万”。尽管给敌人以重创，但梁赞人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在这场大战中，梁赞人全部战死，尸横遍野。这时，梁赞人耶夫巴基·克罗夫拉特从外地回到梁赞，看到悲惨的景象无比愤怒，他设法召集了 700 名将士，一路追赶蒙古人，并英勇战死。他的行为甚至赢得蒙古将领的尊重，蒙古人没有加害其他劫后余生的将士，而是让他们带着统帅的尸体回去安葬。这样一个惨烈失败的故事，在俄罗斯人看来，丝毫没有“失败”的气馁和妥协，恰恰相反，弥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让读者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民族：即使可以在肉体上彻底消灭罗斯人，但在精神上永远都不能摧毁他。这样惨烈的景象不仅出现在以历史事件为依据的文学作品中，也发生在现实被攻克的城池中。比如 1238 年 2 月 13 日，弗拉基米尔城被攻陷了，教堂中烟火四起，藏身在这里的居民全部遇难。

如果说文学作品或有夸张的成分，那么历史文献一般相对客观。据俄罗斯学者 В.В·波利托夫 (В.В. Политов) 考证，对于 1237 年拔都入侵俄罗斯的历史，不同地域的编年史作家描绘得并不一样。比如，南部罗斯的编年史描绘的鞑靼入侵惨不忍睹，充满了仇恨，而苏兹达里的编年史作家表达得则相对委婉，口气缓和，这是因为，编年史往往代表了官方观点，鞑靼治下的罗斯是无法指责统治者和大公们的。而且很多编年史对罗斯诸公和金帐汗国之间的关系也闭口不提，只有特维尔和莫斯科地区的编年史比较符合金帐汗国官方观点。因此，在金帐汗国势力范围内的罗斯诸公国，普遍承认拔都的权力，历史上记载下来的内容，也常提到蒙古大汗赋予罗斯大公的荣誉和尊重。

由此可见，古代罗斯时期就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常见于民间，将蒙古鞑靼人视为带来毁灭性破坏的敌人，一种常见于半官方的话语叙述之中，

对蒙古人的统治基本认可。

18世纪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蒙古鞑靼时期的历史。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Карамзин）认为，莫斯科公国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没有蒙古鞑靼，就没有后来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早期的欧亚派代表特鲁别茨科依公爵（Е.Трубецкой）在其经典作品《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因素》中指出，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因为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比如俄语中出现了大量的蒙古语词汇，邮驿制度、军事制度、税收和服饰也是从蒙古学的。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方式也是借鉴蒙古人的，所以莫斯科的强大归功于蒙古。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Ключевский）的观点是，俄罗斯之所以能够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的功劳。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科学院还就蒙古统治的问题组织过全民竞答，20世纪初的欧亚派对该问题的论述也颇多。在俄罗斯思想史上，该问题一直是属于显学，因为它涉及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

近些年来，俄罗斯人对于“我是谁”的认同问题颇感兴趣，历史研究也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与蒙古鞑靼相关的学术著作不断推陈出新，而且在俄罗斯非常畅销，有些经典书籍也一版再版。关于蒙古鞑靼人在俄罗斯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范式：

一是通史性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反复再版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经典著作，而且还有一些颇具争议但受众面很广的历史著作。如欧亚派学者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的系列作品，他的《古罗斯与大草原》、《欧亚节奏——不同时代与多种文明》、《从罗斯到俄罗斯》、《中国的匈奴人》等著作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尽管褒贬不一，但他有一个观点是学界普遍接受的：他认为，俄罗斯的各个历史时期（一般分为六个时期，即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苏联以及后苏联时期）都有其特点，但鞑靼罗斯时期尤为重要，因为其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是俄罗斯面向东方的开始。鞑靼罗斯取代基辅罗斯是“必然发生的偶然”。因为在蒙古人到来之前，罗斯已经开始走向退化——“基辅有天才建筑师，有精明的商人，有识文断字的修士。基辅人在诺夫哥罗德和维亚特卡经商，修建城堡和教堂，至今都保存完好。但遗憾的是，

罗斯人却没能回归基辅在此前对于俄罗斯大地的意义。因为罗斯富有‘激情’（*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品质的人太少了，所以就没有创新，为本国人民和国家牺牲个人利益的品行还没被唤醒。”^①这必然会招致异族的统治。鞑靼人给罗斯带来的刺激，恰恰可以提高民族凝聚力，振奋使民族走向强大的“激情”。因此，列夫·古米廖夫本人对蒙古人持完全的肯定态度，他甚至为自己的身世感到自豪：“我的祖先是细眼的鞑靼人，凶猛的匈奴人！”^②

二是断代史的研究成果，包括两类，一类研究蒙古鞑靼入侵初期的历史，一类研究后期的历史。例如赫鲁斯塔列夫（Д.Г. Хрусталеv）于2008年再版了一度脱销的《罗斯：从进犯到“统治”——13世纪30-40年代》，专著详细介绍了蒙古鞑靼入侵之前罗斯国家的情况，分别论述了1237-1238年、1238-1240年、1240-1242年蒙古人进犯的具体事件，分析了蒙古人对西南罗斯和北部罗斯造成的影响；第二类是对蒙古鞑靼人统治的后期及其后代的研究，包括卡尔加洛夫（В.В. Каргалов）多次再版的《金帐汗国的终结》（2010年）以及《推翻蒙古鞑靼的统治》（2010）等著作，作者不但梳理了古代罗斯人是如何开始解放运动的，如库里科沃战役的详细过程，还分析了后金帐汗国时代俄罗斯与其他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苏尔丹诺夫（Т.И. Султанов）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代》（2007年）中不但描写了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在东西兀鲁思的统治，而且详细介绍了突厥斯坦和哈萨克汗的蒙古国家建制。库尔宾（Э.С. Кульпин）的《金帐汗国：后代的命运》（2008年），从蒙古人的第一代研究到第七代。波切卡耶夫（Р.Ю. Почекаев）的《金帐汗国的大汗们》（2009年）更是具体，以在俄罗斯地区统治过的各个时代和公国的诸汗为线索，揭示了蒙古人对罗斯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三是历史-地理学视域的蒙古鞑靼研究。除了日常生活和文化、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等角度的研究外，蒙古鞑靼的历史-地理学视角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如叶格罗夫（В.Л. Егоров）在《13-16世纪金帐汗的历史地理学》（2010年）中，详细介绍了金帐汗国及其他汗国所管辖的俄罗斯的地域范

① Гумилев. Л.Н.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 М., «Сварог и К», 1998. С.115.

② Лев Гумилев. «Сонет»: Мне сняться королевские алмазы...И весь в крови широкий ятаган...Мой предок был татарин косоглазый...Свирепый гунн...<http://www.stihi.ru/2010/09/05/604>

围。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空白，其研究不仅涉及线性历史时间维度的问题，还关涉到民族融合的空间地域问题，涉猎的问题包括国家领土的面积与内部行政结构的关系，以及辽阔的地域与经济方式的问题。

四是借助文学领域的作品，还原蒙古鞑靼时期的重点人物原型和重大历史事件，如两位库比亚金（О.Ю. Кубякин и Е.О. Кубякин）在《拆解与转型》（2011年）一书中，通过梳理蒙古鞑靼时期前后的俄罗斯文学和文献，分析蒙古鞑靼统治时期俄罗斯国家建制的变化和转型。

五是借助中国、蒙古等历史文献资料的详细记载，挖掘蒙古帝国在俄罗斯及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发展轨迹。如巴扎洛娃（Б.З. Базарова）于2006年出版了《蒙古编年史——文化遗迹》，把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蒙古编年史也纳入其中，通过中俄蒙三种编年史，考察蒙古鞑靼的历史。

总之，俄罗斯的鞑靼历史观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存在桎梏且对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人强调正面意义，有人强调负面意义。第二种观点认为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并不大，理由是俄罗斯受到先进的西欧社会思想的影响大于东方影响。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否认鞑靼给罗斯带来了政治方面的影响。例如波列沃依（Полевой），尽管他认为推动俄罗斯历史前行的是欧洲思潮，但也不否认鞑靼统治“转变了罗斯以前的秩序”，“并推翻了此前的社会生活”，而且桎梏还给罗斯带来了新的政治特性。^①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是第三种观点。2014年，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文稿中提到，将之前使用的“蒙古-鞑靼桎梏”（татаро-монгольское иго）改为“俄国依附于汗的体系”（система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усских земель от ордынских ханов）。^②避免使用“桎梏”这类带有修辞色彩的词语来概述和判断这段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修辞中性的词语，说明俄罗斯学界和社会各界对蒙古鞑靼统治的历史有了新的、比较统一且更加客观的认知和评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使用哪一种语汇来概括，对于俄罗斯来说，蒙古鞑靼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俄罗斯文化及其认同，就如同蒙古人对中国的入侵一样。

① Полевой Н.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1833. Т.5. С.11.

② 孙嵩霞：“蒙古统治俄罗斯历史新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3期。

二、中俄遭到蒙古入侵和摆脱压迫的时间节点契合

与俄罗斯学界的争议不同的是，中国对于蒙古人统治时期及其统治前后的历史记载非常详细，单只一部洋洋洒洒上千万字的《元史》（120卷），就详尽地记录了蒙古人统治中国的缘起、过程、事件等等，蒙元时期的相关研究从当时至今就未曾间断过，相关文献可谓浩如烟海。如同俄罗斯一样，对蒙元的评价，历史上持否定观点曾经比较多，但近三四十年来，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也开始变得客观，主观评价开始减少。^①如同在古代罗斯一样，蒙古人在中原连年发动战争，所过之处，人民惨遭屠戮，农田受到破坏，工匠被奴役，财物被掠夺。但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较高的文化势能改写了入侵者的文化。蒙古人起初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管理方式来管理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并不成功。忽必烈推行“汉法”后，社会经济走上了发展的道路。由于地域辽阔，对外开放，所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所有发展，特别是邮驿制等社会管理方法，通过蒙古人传播并影响到俄罗斯等地。

成吉思汗（1162-1227）于1206年在亚洲腹地建立了蒙古国，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征伐狂飙，同时对中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蒙古铁骑奔驰在草原，踏平中俄无数城镇，建立了旷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它一边向西进犯罗斯，^②一边向东向南入侵南宋。1223年，罗斯和蒙古鞑靼人在卡尔卡河上发生冲突并败于鞑靼人。这次战役，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大元开疆扩土的经历，所以罗斯大地上发生的数次著名战役，《元史》都有记载，关于卡尔卡河上的战役是这样描述的：“（速不台）又至阿里吉河（卡尔卡河），与斡罗思（俄罗斯）部大、小密赤老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③1237年，蒙古大军入侵，先后征服梁赞、东北罗斯和西南罗斯，之后苏兹达里、

① 参见韩儒林等著：《元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

② 成吉思汗的两名大将哲别诺颜与速不台阿秃儿奉大汗之命，率两万五千骑兵追赶当时兵败的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后继续向西方进军，先侵略了格鲁吉亚，又进犯了阿塞拜疆，之后开始攻打高加索北部，遭到当地联军反抗，于是蒙古人首先使用离间计，使钦察人倒戈，战胜敌人后又反击钦察人，于是钦察人向罗斯人求助。1222年，罗斯各公国大公出战但不敌对手，失败而归。

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66页。

弗拉基米尔都遭到进攻。再后来，雅罗斯拉夫和特维尔也沦陷了。到 1238 年，拔都占领了诺夫哥罗德之外的整个东北罗斯。当时基辅罗斯内部各个王公之间的内讧不断，波洛伏奇人（又译“波罗维茨人”）又不断进犯。1240 年蒙古鞑靼征服基辅，1239-1241 年，西南罗斯也相继被征服。至此，蒙古鞑靼人已经将罗斯南部草原据为己有。1231-1247 年，蒙古鞑靼又踏入高加索、干札和格鲁吉亚等地。关于蒙古人攻打罗斯这段历史，《元史》虽然着墨不多，但都有记载，例如：“太宗甲午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即‘钦察’）、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亦命宪宗往焉。岁丁酉，师至款田吉斯海旁，钦叉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生擒八赤蛮，遂于诸王拔都征斡罗思，至也列赞（梁赞）城，七日破之。岁丁巳，出师南征，以驸马次真之子乞歹为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阿思。岁癸丑，括斡罗思、阿思户口。”^①与此同时，窝阔台（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还派出 15 万大军远征欧洲，名义上是远在咸海与乌拉尔草原的拔都指挥的（俄罗斯的文献记载均是“拔都”），实际上真正的统帅不是拔都，而是速不台，是他率兵征服了波斯和基辅罗斯以及中国的北方。1243 年拔都大军在伏尔加河下游扎营，建立了蒙古国家，俄罗斯史称“金帐汗国”，中国史称“钦察汗”。蒙哥汗（1209-1259）统治时期，东、西兀鲁思都承认大汗的宗主地位，但根据《出使蒙古记》记载，帝国已经开始分为两大势力范围，蒙哥汗控制东部，拔都汗控制西部，^②俄罗斯与金帐汗在形式上是宗藩关系。蒙古人在中国与俄罗斯统治的性质和形式并不一样。在中国，蒙古人完全控制了汉人并建立了新的王朝。首先，元朝和金帐汗的关系是“宗藩之国”，后者是前者的藩属国，对前者具有依附性。而俄罗斯与金帐汗的关系也具有依附性，它虽然不像中国那样被彻底改朝换代，但同样处于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蒙古人也向中国南方进军。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后，在进攻西方的同时，也把视线也转向了东方。公元 1209 年，成吉思汗把西夏收入

① 《元史》，卷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1044 页。

② [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著：《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吕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帐下。1211年开始进攻金国，尽管直至1227成吉思汗去世都未能完成心愿，但1234年他的继任者完成了他的遗愿。金亡后蒙古随即发动对宋的进攻，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即“元世祖”）改国号为大元，创建了元朝。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朝代。蒙古国初起时各据一方的金、夏、西辽、大理、吐蕃等政权，经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七十余年的征讨兼并，被全部征服，完成了旷古未有的统一大业。也许正因为此，蒙元被一些外国学者视为中国的“征服王朝”。^①

中俄摆脱蒙古人统治的时间节点也非常契合，元朝的衰败时期恰好也是金帐汗国没落的开端。元朝末年，贫富分化、财政困难、腐败严重、天灾不断、抗税斗争此起彼伏，元末农民红巾军起义声势巨大，时间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正二十七年，即1351年-1367年。此时罗斯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西南罗斯许多城市和乡村遇到战争灾难，罗斯人纷纷逃到东北罗斯，逐渐地，莫斯科公国得到发展，1328年，其王公伊凡·卡里达依靠蒙古鞑靼汗的支持登上大公的位置。俄罗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因为伊凡·卡里达经常给金帐汗国进贡，所以才有了40多年的太平。这段时间，蒙古人从未骚扰过莫斯科罗斯。而事实上，此时正值蒙古帝国走下坡路的时段，被称为“鞑靼”的大汗统治在俄国的管控也日渐削弱，所以，这也是莫斯科王国得以顺利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中原的红巾军起义如火如荼时，金帐汗国内部也出现了争端，从1357-1381短短24年时间里，共更换了20个汗。不但花刺子模、克里木、保加尔逐渐从金帐汗国分裂出去，而且还遭到中亚帖木儿的侵袭。因此1380年库里科沃战役中，德米特里大公能够战胜蒙古军队是历史的必然。从此，金帐汗国出现衰败局面，尽管仍试图频繁征税。至15世纪，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汗国之后，1480年，阿合马再次出兵进攻莫斯科公国，强迫其纳贡，后在伏尔加河下游被诺该帐汗国人杀死。长达240年之久的鞑靼统治到此结束。但是，俄罗斯和蒙古人之间的互动并没有就此结束，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期，卡马河沿岸和乌拉尔地区被罗斯公国占领。16世纪50年代，伊凡四世先后占领了喀山汗国（中国史书记载为“喀桑汗”）、阿斯

^① “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是由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提出的一个概念，日本等国学者相继使用，指辽、金、元、清等数个以武力征服中国的王朝。

特拉罕汗国和克里木汗国。后来，俄罗斯人反过来向各个汗国征税，西伯利亚汗就是哥萨克人以征收亚萨克税为由，进行军事远征并最终被征服的。也就是说，尽管蒙古鞑靼统治俄罗斯仅仅两个多世纪，但俄罗斯人与蒙古人之间各种形式的交往和融合时间却长达四五个世纪，由此可见，东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是持久且深远的。

三、俄罗斯、蒙古鞑靼和蒙元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和血缘关系

对于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研究，俄罗斯学界有不少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欧亚派学者列夫·古米廖夫的研究。他不惜笔墨，详细描写了这位蒙古大帝。他还参考了中国历史中的相关记述，因此所述内容与《元史》记载并无很大出入。^①在他看来，俄罗斯民族不但与蒙古人有血缘上的联系，而且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受到蒙古人的影响。

成吉思汗与正妻孛儿帖（或“孛儿台”*Боргэ*）共有四个儿子。术赤（*Джучи*）、察合台（*Чагагай*）、窝阔台（*Угедэй*）、拖雷（*Тулуй*）。成吉思汗在世时，赐予每个儿子一个兀鲁思（即一个封国领地）^②、一个禹尔惕（一片草原）以及一个因出（一项贡赋）。长子是术赤，先于父亡。生前获得了额尔齐斯河以西的草原，还有伏尔加河以西的钦察（波洛伏奇）境内的领土。术赤之子是拔都^③，他继承了父亲领土的管辖权。并在征战中扩大了其统治的疆域，包括黑海以北的纵向草原地带，即乌拉尔河流域、顿河流域、顿涅茨河、第聂伯河诸河的下游，高加索北部也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此外，伏尔加河中游及其支流卡马河浇灌的耕地和森林地带也在其辖内。梁赞、苏兹达尔、特维尔、基辅罗斯诸公国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金帐汗国的属国。大汗掌握着罗斯王公的废立大权，被拔都认可为“罗斯诸王公之首”的弗拉基米尔的雅罗斯拉夫大公，曾亲自到大汗营帐前行叩首礼，并且以属国君主的身分参加过窝阔台之子贵由在东方的登基大典（据《元史》

① 参见《元史》与 Гумилев. Л.Н.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 М., «Сварог и К», 1998. С.95-113.

② 兀鲁思也有“国家、人民”之意。

③ 拔都的含义是“善良的汗”，但在俄罗斯，人们认为他是残暴的征服者。

的记载)。由此不难看出，在早期，罗斯与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为比较严格的封臣关系。直至 14 世纪中后叶，术赤的后裔们开始争夺王位，金帐汗国陷入全面混乱。1361-1380 年马麦掌权时，蒙古人的威信已经不复存在，从 1371 年开始，罗斯王公不再来大汗这里朝觐，甚至不再纳贡。1373 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第一次挫败了蒙古人的进攻，1378 年对马麦的战争再次获胜，1380 年在库里科沃战役中大获全胜。此后，打败了马麦并入主金帐汗的白帐汗脱脱迷失重新统一了术赤的领地，令北方的罗斯王公们以传统的形式向他效忠。在遭到拒绝之后，脱脱迷失入侵罗斯诸公国。所以，在 1382 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统治时期铸造的一种硬币上，一面写的是：“大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另一面则写的是：“脱脱迷失苏丹万岁”。这说明，库里科沃胜利之后，俄罗斯仍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新的莫斯科王公仍需面见大汗，求他准许他们继承王位，一直到瓦西里二世时，他自己任命了继承者，瓦西里三世则彻底拒绝对金帐汗国的臣服。而此时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开始衰落，已经没有力量来进行回击，蒙元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在蒙古帝国的东部，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儿子和将领们于 1236 年进攻成都、襄阳、汉口和黄州，并于 1241 年最终让高丽称臣纳贡。窝阔台去世后，他的妻子在 1242-1246 年摄政四年。1246 年，窝阔台的妻子希望儿子贵由继承王位，并召集成吉思汗家族的所有王子，还有许多外省的总督和属国的王子^①，其中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赫赫在列，这说明，在元朝建立(1271 年)之前，罗斯被蒙古视为自己管辖的地域。及至元朝建立之后，“立国于钦察、斡罗思之地的术赤兀鲁思（即金帐汗国）和立国于波斯的伊利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承认大汗为其宗主，朝聘使节往来频繁。”^②当时大会选举窝阔台的儿子贵由继承王位。1246 年 8 月 24 日举行了已经汉化的继位仪式。蒙古王公们行的是可汗大礼，而参加大会的大臣则向新的大汗行三跪九叩之礼。但是不久，沉迷酒色的贵由突然去世，避免了与拔都之间的战争。之后蒙哥继位，他和弟弟忽必烈开始觊觎更多的宋朝领土。蒙哥

① 只有与贵由早已产生芥蒂的拔都没有前来。

② 韩儒林等著：《元史》，第 118 页。

病死之时（1259年8月8日），忽必烈及其将领正率军南下，包围了鄂州，另一股部队从云南进入广西，攻下桂林，进入湖南，包围了长沙，此时，宋朝四面受敌。蒙哥的死正好使得双方签订了停战和约，约定以长江为界，互不干扰。蒙哥之后，忽必烈被视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蒙古大汗，与此同时，他也被视为元朝的第一任天子。在他统治时期不断征战，并强迫窝阔台王室和察合台王室臣服于他。的确，窝阔台王室和察合台王室从他那里获得了册封，就这样，忽必烈不但成了中国的统治者，同时还成为突厥斯坦名义上的宗主。因此马可波罗曾说，迄今为止，忽必烈是自亚当以来在世界上占有人口、土地和财富最多的君主。忽必烈在位时，金帐汗国的别儿哥汗表示承认他的大汗地位。早在窝阔台时期，驿站就已经可以通往拔都营帐，忽必烈时，罗斯公国通往东方的交通更是日益发达。虽然道路艰难，但非常安全。不少中国工匠被迁至金帐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金帐汗国和罗斯将卒入居元朝的也不乏其人。金帐汗贵族成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重臣，而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收聚境内斡罗思（罗斯）人一万为军，^①韩儒林先生认为，此时“大批斡罗思人移居中国，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②

由此可以看出，事实上在12-13甚至14世纪初期，中俄都是蒙古帝国权力范围内掌控的一部分。基辅与诺夫哥罗德位于蒙古帝国的西部，而中国是蒙古帝国的东部兀鲁思，也就是说，中俄两国曾经是一个帝国掌控下的东西两个部分。早在蒙古统治时期，加里茨克-沃伦（Галицко-Волын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的编年史作者就认为，“罗斯是蒙古皇帝和金帐汗拔都的大地”。^③这里，“蒙古皇帝”和金帐汗的拔都是不同的概念，“蒙古皇帝”指的是大汗汗国皇帝，即元朝的皇帝。在《俄罗斯历史地图册》中，14世纪的蒙古帝国的范围是包括大汗汗国（元朝）在内的。^④在中国人绘制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金帐汗（钦察汗）虽然被划在大元的行政区域之

① 《元史》，卷32，本纪第32，文宗一，第475-489页。

② 韩儒林等著：《元史》，第119页。

③ Голицко-Волын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Библиоте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Т.2 С.256.

④ [英]马丁·吉尔伯特：《俄罗斯历史地图》，王玉涵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外，^①但《元史》却是将金帐汗的历史纳入其中的。

俄罗斯著名欧亚派学者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说：“欧亚的东部平原，包括西部平原，都被一个巨大的国家——汉族的帝国掌控。”^②他认为蒙古帝国给俄罗斯带来了进步的力量。尽管古米廖夫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学者，^③也许他的观点并不完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一些理论和结论至今仍被认为是颇具建树的。他仍被视为“俄罗斯杰出的思想家、大学者”。

“他是伟大的俄罗斯学者列夫·古米廖夫，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和尼古拉·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Гумилев）的儿子，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科学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④普京总统也曾说过：“他（列夫·古米廖夫）的学术作品不仅对历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明确了若干世纪都具有共性的思想，揭示了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再到太平洋的民族间的相互联系。”^⑤也就是说，历史上中俄两国确曾在同一个帝国的影响之下，这使得中俄两国至今都能在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上找到共同点。

另一方面，也有中国学者指出，蒙元时代的中国是“世界帝国”和“全球化秩序的雏形”：“从蒙元帝国版图的发展和延伸来看，它不仅把欧亚大陆的主要地区囊括在内，而且首次使东西方世界由相对隔离走向彼此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空前畅通和日趋密切。在这个意义上，也算逐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前全球化秩序’。诚然，蒙元的全球化秩序与当今的全球化相比，毕竟有本质的差距，不能相提并论，故而暂称其为‘前全球化秩序的雏

① 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

② Гумилев. Л.Н.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 С.7.

③ 由于在其作品中有些主观臆想的成分，以至于差点儿毁掉了学术名声，甚至一度被某些人称为“伪学者古米廖夫”。甚至俄罗斯学界一度曾有一种观点，似乎引用了古米廖夫的论点，在学术上就是错误的。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不能因为他的著作有瑕疵就否定其一切成就和观点。“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古米廖夫的批判者对他的理论的了解程度都很肤浅，且常常转述别人的观点，而对于他的东方学和地理学作品更是没有任何概念。”对他的种种质疑，或者是因为他的一句“我是俄罗斯人，但一生都在捍卫鞑靼人，不让人毁谤他们”，或者是因为对他生平和观点的误读所引起的。

④ Татьяна Лазарева. Лев Гумилев-великий евразиец// Суворовский натиск. 13-ое октября 2007. №.118.

⑤ Там же.

形’ ”。①

俄语中有一个词叫作“民族共同体（этнос）”，它既不是指民族，也不是指宗教，既不是阶级也不是国家，它指的是某种共性。根据这种共性，既可以分辨出谁是“我们的人”，谁不是“我们的人”，它是认同产生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罗斯人是这个民族共同体一部分，中国人也曾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与前朝不同，这个帝国或者民族共同体，给中原大地带来草原民族的文化习俗，包括部分较为落后的制度，同时也注入一些新鲜元素，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受到蒙古的影响是巨大的，且不仅仅是在13-15世纪蒙古统治时期。波切卡耶夫（Р.Ю. Почкаев）研究了金帐汗的历史，以金帐汗国及其分支的历任统治者为主线，揭示了俄罗斯及中亚地区人民与蒙古人的亲缘关系。他的研究显示，金帐汗国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以某种方式被后人继承下来了。俄罗斯疆域内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罕）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都是蒙古人的，这些蒙古贵族后来大都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据统计，俄罗斯有蒙古血统的大公有92位，还有300多个贵族姓氏也有蒙古血统。比如，马麦（Мамай）的直系后代是立陶宛大公国的著名格林斯基家族（Глинские），虽然名字已经俄罗斯化，但家族是蒙古血统。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一直到18世纪，该家族又成为俄罗斯大贵族。出自该家族的女性叶莲娜·格林斯卡娅（Елена Глинская）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并为他产下一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伊凡雷帝。也就是说，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沙皇的血液里，就有蒙古成分。此外，莫斯科大公们的附属国卡西莫夫汗国的统领也是兀鲁葛-穆霍马特（Улуг-Мухаммад）和鞑靼可汗阿赫马德（Ахмад）的后代，其他汗国的“皇子”（俄罗斯官方的传统称谓为“царевич”）和“大公”（俄罗斯官方的传统称谓为“князь”）也成为俄罗斯的军事将领和俄罗斯大贵族。在为俄罗斯效力时，这些具有蒙古血统的人与莫斯科贵胄联姻攀亲，包括留里克皇室成员。因此，俄罗斯许多大公、大贵族和宫廷贵族都具有蒙古血

① 李治安：《元史十八讲》，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页。

统。^①

除了俄罗斯皇族具有蒙古血统外，欧亚地区大部分地区的统领都能追溯到其鞑靼祖先。例如，波切卡耶夫的历史研究就表明，金帐汗国分裂为诸多小汗国，但主要的继承者是克里米亚汗，其统治者史称大兀鲁思汗和迪什特-基普恰克汗(Хан Великого Улуса и Дешт-и Кипчак)(在1783年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之前，这些统治者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除克里米亚汗国外，布哈拉(Бух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和希瓦汗国(Хиви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的统治者也是蒙古鞑靼人的直系后裔。蒙古人在希瓦的统治持续到18世纪中叶。之后，同是金帐汗兀鲁思后裔的哈萨克苏丹来这里进行统治。里海、咸海以北，伏尔加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诺盖金帐汗(Ногайская Орда)及其各个分支，在15-18世纪之间也是由鞑靼人叶基盖依(Едигей)的后裔统治的。^②

不少俄罗斯人把自己视为成吉思汗的后裔。比如，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俄罗斯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曾在作品中写道：“一天晚上，被人收买的俄罗斯人谋杀了我的祖先阿赫玛托夫，据卡拉姆津记载，这件事终止了蒙古人在俄罗斯的统治……据说，这个阿赫玛托夫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有的时候女诗人还把她的太奶奶写成“成吉思汗的后裔”。^③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也曾在诗中写道：“我梦见王冠上的钻石，还有那血泊中的利剑……我的祖先是细眼的鞑靼人，是凶猛的匈奴人……”^④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文学作品说明，蒙古人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们统治的结束而衰落。相反，无论是在血缘上还是在文化上，蒙古元素都是俄罗斯文化认同中挥之不去的影响。难怪俄语中会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揭开俄罗斯人的面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所以，在俄罗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成吉思汗被视为俄罗斯先王。连中国也曾有类似的认知，比如鲁迅曾在杂文《随便翻翻》中不无讽刺地提到，是俄国人的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

① Роман Юлианович Почекаев. Ханы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Изд. ООО «ИПК. Бионт». 2009. С.379-381.

② Роман Юлианович Почекаев. Ханы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Изд. ООО «ИПК. Бионт». 2009.

③ См. Черных.В.А. Родословная Анны Андреевны Ахматовой.-«Памятники культуры. Новые открытия». 但有学者指出，阿赫玛托娃的太奶奶并非鞑靼公主，而是俄罗斯贵族。阿赫玛托夫家族是古老的贵族，其出身有可能是鞑靼人，但早已经俄罗斯化了。

④ Сергей Беляков. Лев Гумилев// Новый мир. 2012. №.4.

“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①

四、蒙古人对中俄两国的国家管理制度产生了影响

17-18 世纪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塔季舍夫（В.Н. Татищев, 1686-1750）是较早研究蒙古人在政治方面的影响的人之一。他研究时使用了《往年纪事》以及各个地区撰写的编年史、大事年表等文献，今天有些文献已经失传。所以，塔季舍夫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俄罗斯历史》中指出，恰恰是专制的衰微，导致了蒙古人的入侵和掠夺。此外，入侵还致使教会权力的增强，更加削弱了政权。^②

18 世纪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谢尔巴托夫公爵（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Щербатов）认为，鞑靼统治给俄罗斯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建制带来深刻影响。^③受其影响，“俄罗斯历史学领域的哥伦布”卡拉姆津（М.Н. Карамзин）指出，鞑靼统治对俄罗斯政治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拔都的进犯推翻了俄罗斯。接下来在罪恶中发现到善因，在破坏中显现出整体的优势。”^④也就是说，“桎梏”带来的积极作用是，它结束了罗斯的分崩离析，恢复了权力的大一统。所以“除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弗拉基米尔城以及其他地区，韦彻的钟声不再敲响……莫斯科的强大应归功于大汗。”^⑤研究卡拉姆津的学者科斯特马洛夫（Н.И. Костомаров）总结说，蒙古鞑靼人促使俄罗斯从一种“封建-韦彻”性质的体制转型到莫斯科大公“统一控制”（единодержавие）体制，促进了专制制度的形成。

俄罗斯 18-19 世纪的学者伊洛瓦伊斯基（Д.И.Иловайский）指出，公国的权力恰恰是在蒙古金帐汗国的外部压力下得以加强的。也恰恰在这一时

① 鲁迅：“随便翻翻”，<http://www.niubb.net/a/2015/05-03/396648.html>

② Татищев В.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7. М., 1994.

③ Столович Л.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Республика», 2005. С.42-43.

④ Лачаева М.Ю.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до 1917 гда. Т.1. М., 2003. С.208-209.

⑤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н.2. Т. 5. СПб. 1842. С.215-219.

期，“俄罗斯”从世袭领地的概念转变成了国家的概念。鞑靼的统治不仅削弱了韦彻制，而且抬高了公国的权力和地位。人民担心来自外部的危险，希望公国出面保护，由此，“公国”的概念在鞑靼统治时期提升到“国家”理念。^①

在国家经济管理方面，蒙古人也给俄罗斯留下了痕迹。特鲁别茨科依公爵写道：“蒙古的国家建制对俄罗斯国家建制的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搞明白。但可以确认的是，俄罗斯被纳入到蒙古国家的财政体系中，到今天俄语中还继续用着从蒙古或者鞑靼语中借用过来的词汇，如官产、官产总管、钱、阿尔滕铜币、海关，这说明，蒙古的财政制度不仅被俄罗斯接受和确立下来，而且经受住了鞑靼桎梏的考验。”^②由此可见，俄罗斯的经济管理体系借鉴了蒙古的经验。

19世纪的1826年，俄罗斯科学院曾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蒙古人在俄罗斯的统治带来了哪些影响？对国家政治、管理形象、民众的内部管理、启蒙和教育的具体影响是什么？”^③就这个问题科学院组织了一场竞答，在当时吸引了俄罗斯国内外学者的注意，甚至有德国人投稿写文章回答这个问题。六年后，1832年，科学院就该问题再次举办有奖竞答活动，奖金的数额也有所提高，1835年，科学院收到德国东方学家哈梅尔(Хаммер-Пургшталь)长达1272页的论著，并授予作者奖金，尽管这部著作中有不少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但仍被视为该研究领域的巨大进步。^④该论著肯定了蒙古帝国对罗斯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俄罗斯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方面，接受的不仅仅是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正教)，而且还有帝国的管理和统治方式。而蒙古鞑靼对罗斯二百多年的统治，让东方的草原文化、特别是蒙古的管理制度，在这片大地上扎下根来。蒙古鞑靼对俄罗斯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观点得到现当代许多俄罗斯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认可。俄罗斯文化学家孔达科夫认为，俄罗

① Иловайский Д.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2.М., 1884. С.412-413.

② Тизенгаузен В.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истории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Т. 1 СПб., 1884. С.554.

③ Там же.

④ Греков Б.Д, Якубовский А.Ю.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и ее падение. М., 1950.

斯的“专制制度为引入制度，模仿了金帐汗国的贡赋制度。”^①别尔嘉耶夫也曾经指出，罗斯国家始于莫斯科大公的崛起，莫斯科王国的性质属于东方文化类型，是基督教化的鞑靼帝国的文化类型，是在长期对抗西方和异种风俗中形成的。的确，著名的“莫诺马赫王冠”就说明了这一点，莫斯科君主登基时头戴的王冠，并非源自拜占庭帝王康斯坦丁·莫诺马赫的皇冠，而是鞑靼国家穆尔扎的头饰，说莫诺马赫王冠来自于拜占庭不过是一种杜撰，这项帽子明显带有蒙古大汗的王冠的特点，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象征着东方式专制和拜占庭式独裁的结合体。^②作为拜占庭和蒙古两种他者文化结合而形成的独特文明，俄罗斯文化认同在此时又具有了双重性的特征。引用汤因比的观点来说就是，正在形成的莫斯科王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家，它把自己看成历史的终点和最高的文化价值。^③如果说先前的罗斯诉诸的是拜占庭式的罗马帝国的国家类型，那么此时又带有了蒙古君主专制政权的帝国性质。

吸收了蒙古元素的俄罗斯专制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俄罗斯政权被神圣化。无论是伊凡雷帝时代、彼得大帝时代、苏联时代还是当下的俄罗斯，被神化的政权都具有了现实意义；二是具有家国天下的象征，沙皇是“人民之父”，是整个民族大家庭的家长，是某种图腾；三是绝对精神以及无限权力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与民族心理深层结构相关的文化认同。

有趣的是，中国也有学者提出，蒙古人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最重要的事物就是“专制制度”。众所周知，在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关键性转变，即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都有显著差异。最明显的，如土地制度和城市结构的不同形态等。到了晚明和清朝，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元朝在“唐宋变革”与晚明到清鼎盛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中国历史学家李志安先生指出，蒙元虽然因袭了很多汉

① [俄]孔达科夫：《文化学视域的俄罗斯文化史》，郭小丽译，第一编第四节，北京：三联出版社，正在编辑中。

② Джеффри Хоскинг. Россия: народ и империя. Смоленск «РУСИЧ», 2000. С.13.

③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52-358页。

文化的传统，但却带来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唐宋时期，专制独裁并不严重，特别是宋朝，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总体上承续着唐朝的“贞观”遗风，皇帝和士大夫官僚的关系比较融洽，甚至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而从蒙元开始，“专制皇帝的独裁野蛮，譬如对臣下‘廷杖’和滥杀，以及百姓徭役的死灰复燃等，‘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元朝和明初，其影响恶劣而深远。”^①所以，蒙古人虽然带来广袤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推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但也“留下了社会关系和专制主义等方面复杂沉重的遗产。”^②李志安先生认为，全民服役当差与君臣关系的主奴化，是蒙古人对汉民族带来的深刻影响。例如劳役（又称徭役）制度。劳役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汉之后，劳役制度由重到轻，宋朝时期已基本不见了。但到了元代，劳役制度重新加重，也就意味着百姓对官方的人身依附关系再度恶化。这点类似于前文提到的俄罗斯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蒙古人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奴役”，还带来了“农奴制”。

李志安先生还指出，在君臣关系方面，蒙古人带来的是“主奴化”。在金文中，“臣”含有战俘和奴隶的涵义。春秋以后，职业官僚制度确立，韩非把君臣关系诠释为雇佣关系，是雇佣双方履行义务。后来，汉代董仲舒“纲常”学说兴起后，“君”变成了臣的“纲”，主从关系被凸显和强化。但是唐宋时期，基本上是属于开明型的。宋代一些皇帝曾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在人格上受到尊重。元朝就不一样了，忽必烈将草原主奴关系带入君臣关系，大臣似家奴，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捶击大臣的事件不胜枚举。“在忽必烈的心目中”，宰相也好，一般臣僚也好，都是自己的奴仆。”^③君臣关系的主奴化一直沿袭到明清。历史学家何兹全曾断言：“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④

无独有偶，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乌斯特利亚洛夫也指出，蒙古人给俄罗斯带来了严苛的酷刑，以及贡赋制度和严格的律法。对人的审判、鞭

① 李治安：《元史十八讲》，第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33页。

④ 何兹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刑、拷打、死刑等等，使得俄罗斯人变得粗鲁，道德退化。^①加斯杰夫说，在蒙古人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变成了亚洲人，继承了很多亚洲人的特点，比如对异族的不信任，对女性的奴役以及一些结婚的习俗。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严酷”并非中国人的性格，而是草原民族的性格，应该说，蒙古人同时使得中俄的政治治理更加严酷。

除了政治体制外，蒙古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蒙古人征服中国后，推行自己的蒙古语和八思巴字，而中国人学习八思巴字，基本都是出于仕途升迁等功利性目的，有的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蒙古名字，但由于这种文字并未深入人心，所以不具备生命力，八思巴只是在元朝官方文书中大量使用，元灭亡后，连蒙古人都不使用这种文字了。当然，蒙语中有 200 多条词汇曾一度进入汉语，但主要集中在“元明戏曲”中，后来就不常见了。此外，蒙古人给中国北方带来了风俗习惯上的某些改变，如收继婚，即兄长或叔叔去世后，弟弟或侄子可以继娶嫂子或婶娘，这曾经是草原民族匈奴人的习俗。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胡风胡俗”进行过整肃，所以胡人风俗又终止了。

总之，在国家治理方面，蒙古人使得中俄原有的专制制度更加严酷，而在文化方面，由于中国本土文化势能更高，所以与俄罗斯相比，蒙古人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

五、蒙古文化的汉化及其西进

中国学界的研究表明，蒙古人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更加严酷，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也影响了蒙古帝国，并通过蒙古人间接传播到俄罗斯。草原突骑的武力自然强大，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但文化却落后许多。即便是蒙文，也是借回纥文字和藏文，且由外来的知识人创制的。而其原始的萨满教与中原各地的规范、行为、伦理、思想相比，更是原始。整体而言，蒙古人比较尊重个人以及地域信仰，日久以后，几乎没有信仰系统的蒙人分别同化于当地文化。比如，今天在西亚和中亚的蒙古后裔，大多是伊斯兰教

^① 何兹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

徒，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则信仰藏传佛教，而传统中国汉地的蒙古后裔，大都改了汉姓，消融于华夏民族之中。儒生士大夫的力量，虽有起伏，但从未中断。统治理念，也仿照中国前朝，加上更严酷的专制制度，王权根深蒂固。

可以说，蒙古鞑靼在影响罗斯的同时，也不断接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早在蒙古人统一中国之前就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视为最著名的帝王之一，《元史》卷一本纪第一就以“太祖”为名撰写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①尽管他是蒙古族而非汉族，尽管他以野蛮和暴力的方式开疆拓土，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即他能够接受定居民族的文化，把回纥人塔塔统阿、穆斯林人牙刺瓦赤和契丹人耶律楚材都留在身边。一方面，蒙古人从回纥人那里借鉴了语言和文字，包括宗教信仰景教和佛教；另一方面，又从汉文化中借鉴了管理方式。据《元史》记载，耶律楚材长期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断向成吉思汗灌输有关汉文化的知识，特别是仁政的精神。耶律楚材虽然出身契丹，但他的精神已经汉化，所以变成了被压迫民族与压迫者之间的调停人。比如，成吉思汗在甘肃打完最后一仗后，打算杀掉一千万汉人，这样可以将腾出的土地改造成骑兵的牧场。因为有近臣建议说：“不若尽去之，使草木茂盛，以为牧地。”^②耶律楚材则建议说，如果留下这些人，每年就可以在田赋和商税中，征收五十万两白银，锦缎八万匹，谷物四十万袋。成吉思汗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并令他制定相应的纳税法。^③正是因为有了耶律楚材这种推行汉文化的人才，蒙古帝国行政制度的雏形才逐渐建立起来。在耶律楚材以及其他汉人出身的官员努力下，蒙古接受并学习了汉文化。耶律楚材自己曾言，他最关心两件事：一是保护被攻打城市的书籍，二是防止瘟疫散播，而这恰恰是成吉思汗帝国得以稳固的根基。世界上很多历史学家之所以对成吉思汗有颇多赞誉，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够“大破”，更因为他有能力“大立”，认为他不断吸收他者文化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蒙古帝国的行政事业，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蒙古帝国制定的严格的纪律，

① 《元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

② 苏天爵：《元史类》，卷57《元故领中书省耶律公神道碑》，扫叶山房刊本影印。

③ 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件事发生在窝阔台统治时期。

制止了部落之间不断的战争，使得从北京到里海的商路得到有效的保护。他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了某种成吉思汗的和平。

成吉思汗去世后，三儿子窝阔台成为最高统治者。他完全信任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并委以重任。耶律楚材一直致力于将蒙古人的军事化同汉人的行政化相结合，并且实施了很多改革举措。比如，扶植利用汉世侯地主武装，由汉人管理所在辖区。改革了蒙古帝国的邮驿制度，在驿路上设立了能提供粮食的正式驿站。他还制定了财政预算细则，规定每户汉人要缴纳现金、丝织品和谷物等赋税，而蒙古人只需缴纳十分之一份额的马牛羊。1230年，他把蒙古人认为可以随意抢劫的空地和被征服的中国土地划分成十部分，交给蒙古官员和汉族的文官管理。他还在北京和平阳开办了两所向蒙古青年领主传授知识的儒学教育学校，学习孔子的经典。在行政治理方面，也借鉴了汉人的经验，并谏言窝阔台：可以在战马上打天下，但不可在战马上治天下。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相继完成了对中国北方、俄罗斯南部和波斯征服。其国家行政治理方式和手段，也传播到蒙古人所到之处。尽管耶律楚材晚年被冷落，且抑郁而终，但他对蒙古汉化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忽必烈作为元朝的第一任国君，从小就欣赏汉文化，他不但保留了前朝的制度，而且旧朝官员也留职录用。忽必烈建元朝、行汉法、立朝仪、劝农桑、办学校，举办各级儒学及书院。而经过辽金统治的北方人大多持有“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的看法，对于华夷的观念，不像江南人士那么计较。相反，成吉思汗的后裔——西北诸王则质疑忽必烈的举措，因为成吉思汗的遗训是不能违背蒙古人的旧俗旧规，尽管他们的汉化过程不如忽必烈来得迅速和彻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否遇到阻力，在元代，汉文化和儒学仍然得到广泛的推广和普及。许衡等汉人始终积极在蒙古贵族间传播儒学，认为汉化过程非两三代人努力不可。所以，他格外用心地教育真金太子以及其他蒙古达官贵人的孩子。经过努力，一批蒙古贵胄，如不忽木、安统等及其后裔，儒化和汉化程度已经比较深了，对后世的影响意义深远。连朱元璋都认为：“当是时，元得一士而立纲纪，明彝伦，半去胡俗，半用华仪，中国得生全者，我汉儒许衡是也……人虽不为名儒，昔之

不效者，今识字矣。”^①由于许衡等人的努力，至少蒙古人懂一些汉字了。汉文化的传递不仅止于此，很多古代的民族思想或者传统不但得到了保留，且在元朝发扬光大，比如“释”。《元史》记载：“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②也就是说，在蒙元时期，蒙古出身的人也对汉文化的思想传统可谓推崇备至。

当然，蒙元被汉化的同时，中国也被蒙古化着，比如上文提到的专制制度变得更加残酷。而等级制度也更加苛严，比如中原大地的人被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一等人等，还有其他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但不容置疑的是，蒙元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承袭宋朝的架构，以中书省总理政务，枢密院掌管兵权。中书省统领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与工部，内有尚书、侍郎），主持全国政务，组织架构也是继承南宋体制。

莫斯科公国时期的枢密院与宋朝体制也大致相同。结束了蒙古桎梏的莫斯科罗斯沙皇伊凡三世也通过枢密院等管理方式加强了中央集权。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文化认同的另一个源头是东正教和拜占庭传统，但蒙古鞑靼的国家建制的确影响了俄罗斯国家建制，而俄罗斯原有的宗教和宗教情感非但没有弱化这种建制，反而在情感上使之得到加强。有利于专制制度的机构很容易被接受并纳入行政管理之中，这是因为，此前中俄两国都有专制制度的传统，两国的专制传统支持的都是君主个人，专制的程度取决于皇帝个人及其个性是否强大，无论是秦皇汉武时期，还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或者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统治者个人的意愿就是国家的决定，皇帝强大则国家强大。也恰恰是这种专制制度压制着民族和群体的个性，专制制度只承认自身的个人和个性因素，不容许大权分散和旁落。中国曾借助这种制度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又通过蒙古人把管理国家的理念带到莫斯科罗斯。这种制度对莫斯科公国有着巨大的诱惑，因为基辅罗斯时期的内讧和分崩离析，是导致异族入侵的原因之一，所以当有一种似曾相识、但更先进的管理机制时，很

①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16《辩答禄异名洛上翁及谬赞》。影印古籍资料。

② 《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卷二百二，卷89，第3021页。

容易被莫斯科罗斯接受下来：“也正是金帐汗的绝对权威，使莫斯科的王公们获得了关于专制权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日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被实际地运用了。”^①С.Н·特鲁别茨科伊在其力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因素》中指出，莫斯科公国是在夺得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和西伯利亚汗之后才成为强国的，这些领土都曾是蒙古帝国的辖区，俄罗斯沙皇继承的是蒙古大汗的衣钵。只不过蒙古鞑靼的统治被推翻后，东正教沙皇不但取代了蒙古大汗，而且还把指挥部由可汗的大本营迁移到了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公国相当一部分王公贵族都是鞑靼代表。鞑靼的国家体制成为俄罗斯国家建制的重要源头之一。

列昂托维奇（Ф.И. Леонтович）认为，“遥远的国家”——中国给俄罗斯带来了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蒙古鞑靼人让俄罗斯人的观念由“米尔”转变成“国家”。后来的莫斯科公国的诸多政治和社会制度都源于蒙元，包括下达命令的体系、农奴制、食邑制（依靠百姓供养地方官吏的制度）等。按照他的观点，甚至1649年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沙皇颁布的《会议法典》的诸多内容都源自于成吉思汗帝国。^②他甚至对比研究了一系列制度，认为很多事物的原型都源出于蒙古帝国。比如，俄罗斯的文员（дьяки）类似于成吉思汗的中书令，莫斯科政厅类似于蒙古的行政机构，草原帝国的族系权成了俄罗斯国家农奴制的源泉。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思想家谢尔盖耶维奇指出：“鞑靼人的进犯让俄罗斯各个公国了解了政权的概念，政权不容协商，必须不折不扣地服从……虽然鞑靼人并不在罗斯的境内，而且从遥远的地方实行统治，但他们的统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③这里“遥远的地方”指的是蒙元帝国，而非金帐汗国。

除了国家建制之外，在经济方式、人口普查、驿站等方面，俄罗斯也借鉴了蒙元文化的一些元素。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直接把蒙古人建立庞大帝国的行为部分归功于中国文化：“从中国和其他民族那里学来的

①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② Леонтович Ф.И. К истории права русских инородцев. Древний монголо-калмыцкий или ойротский устав взысканий. Одесса. 1879. С.295. См. Насонов.А.Н. Татарское иго на Руси в освещении М.Н. Покровского. В кн.: Против анти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М.Н.Покровского. М.-Л., 1940.

③ Сергеевич В.И. Русские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Т.2. 1900. С.38.

间谍术、恐怖战术以及先进的攻城装备也是蒙古帝国得以惊人扩张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蒙古人利用新修道路、邮驿制以及为了征税而进行粗略的人口普查等方式，维护着自己对所占领地的统治。”^①可以肯定的是，邮驿制度、征税和人口普查都直接源于中国的管理体制。“罗斯的税收是按照鞑靼人、确切地讲是按照中国的方式进行的，引入中国税收制度的结果是给俄罗斯大地带来了中国行政的某些特定元素。”^②中国文化中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税收制度等为蒙古人所用，并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相对的改造，然后再由蒙古人将政治制度、税收制度、军事制度等管理方式运用在对罗斯的管控中。这些当时相对先进的制度，在鞑靼罗斯之后的俄罗斯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

可以说，罗斯被蒙古征服和奴役后，给俄罗斯认同和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莫斯科大公在领导罗斯独立和统一的过程中，继续按蒙古（元）的方式发展其军事、税收、土地和政治制度，在蒙古（元）日渐削弱的14世纪以及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在莫斯科王国逐渐形成。这样的话，中俄两国尽管还远未相识和相知，但作为蒙古帝国的西部和东部，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共同点，这为近代乃至今天中俄两国的相互理解和认知奠定了基础。相应地，元朝在中国被推翻的后果以及蒙古鞑靼人在罗斯的衰落，实际上中断了中俄两个民族或者国家在高层次上的相互影响。蒙古帝国解体后，中国和俄罗斯就几乎相隔在两个世界里。尽管13-14世纪的认同使得两个国家在制度文化等方面得以接近，但此后二百年间，中俄两国天各一方，至186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互相之间并没有特别密切的交往，但是另一方面，蒙元对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蒙古鞑靼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却是持久弥坚的。

【Abstract】The history of Sino-Russian official exchanges is no more than 400 years, but both countries have taken each other as mirror and found its own shadow within. Although both differ in in-depth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s, they once shared some similarity in national governance.

①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美]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八版，杨焱、卿文辉、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69页。

② Сергеевич В.И. Русские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Т.2. 1900. С.34-35.

Early in ancient times, the grassland culture affected the East Slavic and Chinese nation. By the 13th and the 14th centuries, both Chinese and Russians were under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Mongol Empire. As a result, the culture and governance styles affect both countries to different degrees. Besides, some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were also passed to Russia by the Mongols. It could be said that both countries had begun to influence and know each other before they formally became neighbors.

【Key Words】 Chinese and Russian Culture Identities, Russian National Psychology,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the Mongol Empire

【Аннотация】 Хотя история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не превышает четырёхсот лет, однако эти две страны часто, глядя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видят друг в друге собственную тень. Хотя глубо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народов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отличаются, обе страны в прошлом обладали некоторыми сходствам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Ещё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пастбищ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воздействовала на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и китайские этн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 к XIII-XIV векам как китайские, так и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ы прямо или косвенно находились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ё культура и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ий стиль в различной степени оказали влияние на Россию и Китай, кроме того, некоторые элементы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акже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монголами России.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до того, как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 стали сосе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они уже начали влиять и узна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ультур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России,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импер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日本和苏联的相互认同研究 (1945-1991年)

下米斗伸夫*

【内容提要】日本与苏联（俄罗斯）一衣带水，但在相互认知方面却相当陌生。影响日苏相互认知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有：战争、革命、政治派别、经济联系，以及外部因素。具体而言，日本战俘问题、北方领土问题、日本军国主义问题，一直是影响双方相互认知中的障碍。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影响日苏（俄）相互认知的重要外部因素。整体而言，直到苏联解体，日本和苏联的相互认同，仍然没有达到深入交叉、融合的程度。

【关键词】日苏关系 日俄关系 日本战俘问题 日俄领土问题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7) 05-0185(20)

引言

本文的主题是研究日本和苏联在1945年二战末期至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期间，通过认识相互影响、构建认知的过程。

十七世纪下半叶起，日本和俄罗斯互相视为“陌生人”，从这一时期开始，两国建立起常态化的联系。德川幕府将俄罗斯人称为“棕红色头发的阿伊努人”，也了解到他们来自于亚洲另一个隔绝的世界，他们时常出现在北

* 下米斗伸夫（Nobuo Simotomai），日本法政大学（Hosei University）教授。

方，不断要求建立贸易联系、开放国门。十九世纪初，被称为“俄罗斯海盗”的俄罗斯人，占领了择捉岛和国后岛（与十三世纪蒙古入侵后在朝鲜和中国沿岸地区活动的日本海盗“倭寇”类似）。这一事件使得日本社会感到震惊。

在此后的近现代史中，俄罗斯和日本作为邻居，时而敌对，如日俄战争，时而结为盟友，例如日俄战争结束后签署的日俄协约。黑泽文贵从日本的俄罗斯形象入手分析日俄关系，他认为，在特定情况下俄罗斯被视为“体系改变模式”，也就是改革和革命模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被看作为典型的“落后的危险的国家”。^①相互关系和相互认知变化取决于目标和历史时代：时而作为贸易和事业伙伴，时而作为威胁来源。另一方面，根据俄国旧礼仪派的作品，传说中的“白水国”位于东方日本的位置。由此观之，日本完全可以被俄国看成是现代化落后的“小兄弟”，在荷兰和英国的支持下成为“东方威胁”的来源。^②

十九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迫使俄国解决新问题，即实现现代化。俄国的外交议题是“把国家利益重心转移到亚洲方向”。1855年日本和俄国签署友好条约是特殊的分界线，自此之后，俄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均进入现代化进程。

二十世纪第一场军事冲突——日俄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现在再次引起争论。^③此次冲突深刻影响了之后的两国关系。俄国在战争中遭受了毁灭性失败，包括造成俄国开启另一项进程——1905年革命时期的民主改革。现在有一种观点正在强化，即认为社会变化的推动力量绝不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作为革命先锋的现代无产阶级，而是一场复辟原有的、根源于旧礼仪派的苏维埃和村社的革命。^④

第三国因素使得双边关系和相互认知更加复杂。两国形象受到第三国影响力“磁场”的作用发生变形，甚至受到贬低：江户时期的荷兰，国家开放

① Иокибэ Симотомаи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япо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вызов «паралле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изд-во Редакционного совета Ток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 г. С.11.

② Есикадзу Накамура. Под небом России. изд-во Фукося, 2014 г. С.73.

③ Иокибэ Симотомаи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япо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вызов «паралле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С.68.

④ Нобуо Симотомаи.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 люди, чьи имена стерты из истории. Кавадэ Себо Синся, 2013.

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以及战后的美国。

苏联为了赢得战争付出了 2700 万条生命，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成为世界秩序领导者之一。日本战败，310 万人死亡，超过 60 万人成为战俘。两国战后所走的道路不对称。战争刚一结束，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与东欧国家签订了同盟条约。共产主义也将影响力扩展到亚洲，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具有复杂的双重结构。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中国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宏大目标。亚洲拥有一个革命的中国，中国批判斯大林主义，以及包括文化大革命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后续事件的发生，深刻影响到了日本。中苏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赢家是美国。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经济和核遏制结构的支撑力量、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统治世界。日本在盟国占领时期，曾经短暂幻想爆发“战后革命”。但是 1952 年日本恢复独立地位之后，受惠于无须负担军事开支，为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公民社会”保障了国家稳定。而且伴随着中美关系密切，在战后“进步反对派”中（左翼和中左党派），苏联和社会主义逐渐丧失吸引力。

另一方面，当 70 年代日本成长为“三边委员会”（三个世界力量中心——美国、欧洲和日本）成员之一时，日苏两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苏联作为能源超级大国主导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而日本是拥有高水平能源储备和产业多样化的经济超级大国，领导和引领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但在这一时期，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并没有提高，因为日本加大自身能源储备水平，对于开发西伯利亚的能源资源没有特别的兴趣。同时邓小平时期中国市场开始成长，限制了日苏接近。

伴随着 1980 年苏联经济停止增长，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日本和其他先进国家，甚至在韩国、新加坡和其他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失去了威望。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政府于 1978 年开启经济现代化并取得成功，推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吸引力跌至谷底。由于 1979 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第三世界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潮均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取代。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专家能够预言，戈尔巴乔夫在 80 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将会导致

苏联解体。至于日本，它不仅不可能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一流强国，而且冷战结束后日本失去自己的相对优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饱受着“泡沫破碎”的恶果。90 年代，对于日本和俄罗斯而言，均是“失去的时期”。

综上所述，研究两国间的相互认知，需要找到一个有利视角。两国相互影响的交叉点是关键，即，苏联对于日本现代化的影响，以及日本对于苏联影响，这二者之间的交叉点。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分析两国最有代表性和最权威的专家和学者的观点，即重点分析他们是如何看待日苏之间的认知和相互之间存在的问题的。

一、战争和俘虏，战后革命幻想的破灭（1945-1953 年）

（一）二战结束与革命幻想

日苏战争是大部分日本人亲美倾向得以加强的决定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尽管日本和苏联之间互不侵犯条约仍然具有法律效率，日本甚至请求苏联居中调停与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战争仍然爆发了。也可以说，不同于 5 月 9 日战胜法西斯德国，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战胜日本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深刻。战后苏联的目标是促使战败的日本脱离美国的影响，同时尽可能确保日本中立。苏联试图成为亚太地区政治舞台的重要行为体，但除了占领千岛群岛，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扩展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

1945 年 9 月 2 日，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投降书，斯大林将战胜日本称作为对日俄战争的复仇。斯大林的观点与列宁背道而驰，列宁乐见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他称之为向着革命“迈出了一大步”。斯大林的观点反应出沙皇俄国时期包括革命者在内的俄罗斯人，因为输给刚刚崛起的日本而感受到的屈辱之深。苏联占领了千岛群岛，但美国控制了日本，在日本-美国-苏联的三边关系中，美国比苏联更有优势。但是此时苏联成功地在中国东北巩固了自身影响，在朝鲜获得了据点，这是其在亚洲的优势。

如果说日苏战争的胜利没有引起苏联人太多反响，那么就有一个问题，1952 年从美国占领下独立出来的日本（在“冷战”时期推行亲美民主政策），

为什么会被塑造为苏联自古以来的“敌人”？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使用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术语，不过是一个具有宣传意义的“想象产物”。该术语是由苏共中央一位从事日本战俘工作而后指导对日关系的专家提出的。

苏联的军事胜利，浇灭了日本的革命幻想，并引发了日本对革命的担忧。担忧“起源于苏联的革命”，是1945年8月战争尚未波及日本本土之前便结束的主要原因。至于是什么因素在日本投降上起了主要作用，学者见解有分歧：是美国的核武器，还是红军投入战争？近年来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后者。^①而且结束战争的注定不是红军击溃日本人（夺岛战役以苏军失败告终），而是担忧因为红军参战，导致日本军队中的“激进派”发动革命起义，推翻君主制。

事实上，1945年雅尔塔会议之后，日本最高领导并不担心战争失败会导致革命，而担忧战争会终结天皇统治。1945年2月，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其他政府高官向天皇上《文麿奏折》，提及战败不可避免，建议寻求媾和渠道。原因是担忧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和谣传战后革命的情况下，苏联的影响力可能会相对增强。在战争末期，天皇政权的拥护者们开始害怕在战争焦灼、军队哗变、左派官僚革命和“左派代理人地下活动”的情况下，亲苏情绪增长。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沙皇的命运，是日本天皇的梦魇。

1945年4月，铃木内阁意识到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他向斯大林提出履行义务不要参战。一些曾经见证过俄国革命的日本国务活动家，是1945年8月要求通过苏联调停媾和以结束战争的中坚力量，包括前首相米内光政。^②日本大本营中也存在要求“通过日苏合作结束战争”的一派人。最终，1945年8月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裕仁天皇发表投降诏书，使得对斯大林的期望最终破裂。

（二）战俘事件的影响

在苏联影响下，革命幻想传播在日本的普遍存在，超出了斯大林和苏联

① Цуеси Хасэгава. Тайная борьба. Тюо Корон Синся, 2006.

② Такэтора Огата. Мицумаса Ениаи. Ковадо, 1983 г.; Макико Такада. Тихий щит. Хара Себо, 1990 г.

领导人的期许。一位日本社会活动家石堂清伦（Kietomo Isido, Киётомо Исидо）回忆，战争末期他在哈尔滨会见苏联高级官员时，苏联官员惊异日本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如此广泛。^①日本的知识分子过于沉迷于对斯大林的幻想，他们不了解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特别是战前日本的进步人士对于苏联的了解与事实相去甚远，他们几乎都曾幼稚地请求斯大林居中调停结束战争。苏联的经济神话通过战前对于左派力量具有好感倾向的一批人传播扩散，例如南满铁路的职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战后日本左派和中左运动的中坚。从岸信介到与社会主义政党相关的“左派”人士，都在其中。

革命幻想波及日本社会所有阶层。但是超过 60 万名士兵和军官组成的“西伯利亚战俘”打破了这一幻想。^②在 2000 多本回忆录中，很多战俘写道，对于苏联的幻想与苏联的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他们曾经幻想的“战后革命”事实上呈现给他们的是“集中营”。战俘营影响到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命运。对于战俘营的反响不一。世界语专家高杉一郎早在战前便是斯大林的崇拜者，但是他接触“红色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俘条件之后，体会到一种“迷失”感。^③

作家长谷川伸甚至没有接受中等教育，他是不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察世界的“出身于人民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日本战俘史》一书中，比较了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经常与当地居民和军官交往的日本战俘的经历。^④他在通观日本人沦为战俘和日本人应对外国敌人的千年历史之后写道：“需要祈祷此类事件永远不要再出现。”特别是日俄战争时期表现出来的“骑士精神”和“武士道”，变成了对日军战俘的讽刺。

但是，借助阿列克谢·基里延科等俄罗斯学者开始的前期研究，苏联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的日本战俘研究逐渐清晰起来。自民主党执政以来，日本关于这一题目的研究数量也有所增加（并不清楚为什么自民主党没有直接从事这一问题研究）。但是关于当时苏联人如何看待成为俘虏的日本人，到现在

① Киётомо Исидо. Моя ере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эпохи Сёва. Хэйбонся, 1990.

② Йокибэ Симомаи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япо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вызов «паралле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С.136.

③ Итиро Такасуги. Под тенью полярного сияния –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пленного. изд-во Иванами Бунко, 1991 г.

④ Син Хасэгава. Амбиции японского военнопленного. Синсесэцуся, 1955 г. С.330.

为止成果有限。自然也有一些年高德劭的研究者写过一些作品，例如索尔仁尼琴。维塔利·加涅夫斯基（Виталий Каневский）的电影《死亡与复活》（Замри-умри-воскресни!）是此类题材中不多的作品之一。这部电影描述了在西伯利亚一个村镇成长起来的少年人的生活，在他生活的地方有一座关押日本战俘的集中营。不同于宣传电影，这部电影以一种干巴巴的、冰冷的叙事手法，描述了斯大林时期与日本人有过交往的俄罗斯人眼中的日苏战争。电影中出现的日本人几乎没有说话。以压抑的日本民乐作为背景，电影导演及制片人对日本人的感受，通过多种音乐合成来传达。

尽管日本人被灌输的是建设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但是大部分日本人没有接受苏联是理想社会的观点。60万战俘中死亡人数超过6万的事实，已经足够打破幻想。日本将冷战作为地缘政治现实和经济重建的全部条件。日本战后改革进行得十分彻底，帕诺夫大使（Панов）甚至提出日本的改革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具有革命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具有21世纪精神的表达方式。

（三）革命幻想破灭

起初，革命思想克服一系列障碍之后被人所理解。不同于意大利和法国，日本不存在抵抗运动。在日本，对革命观念的接受，与美军的占领有关系。1946年5月当美苏“冷战”开始之时，本应该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政治家鸠山一郎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吉田茂取而代之，他是职业外交官，历任日本驻英国大使，他以外相的身份组阁，使盟国占领军的政策变成现实。

然而，尽管在战前遭到压迫，共产党还是恢复了活动，在青年人和其他社会阶层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考虑到日苏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1950年，即便是以宫本贤二为首的日本共产党内最为亲苏的“国际主义派别”，当时也调整了政策，主张独立和自主。支持“国际主义”的派别被称为“宫本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佐藤真彦（Tsuneaki Sato）。他作为宫本贤二的秘书和联络人，根据宫本贤二的授意于1950年初在东京会晤了科维任科（Ковыженко），后者在1945年指导过金日成。

50年代后期，科维任科在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日本工作。但是苏共工作主要针对日本共产党中的“主流”。

朝鲜战争爆发后，包括德田球一和其他日本共产党高层领导在内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默许下。将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北京局”）。在中共和苏共的施压下，他们比日本共产党中的国际主义分子更加极端，他们选择了武装斗争路线，也就是革命。^①经斯大林许可，日本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这意味着中苏两国共产党进行了“国际劳动分工”：莫斯科决定全球总体战略，而北京直接领导亚洲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战后日本左派和中左派对此的强烈服从，不仅与中共、苏共的冒险激进策略有关，也与战后日本知识界对于中国的认知有关。日本共产党凭借着监禁时期作为“不屈斗士”积累的声望，战后立即在国会获得39个议席。但是在1952年的大选中却未获得一个席位，主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左派力量分裂。1955年的日共六大，以及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进一步削弱了左派。

战后日本的认同特点体现为，在危机期间日本左派积极分子与知识界之间的分裂。吉宝安多（Jimbei Ando）是一个典型案例，他脱离左派运动，批评“人民社会主义”。^②可以说，吉宝安多为21世纪日本民主党培养了一代政治精英——包括菅直人在内的“人民”派。也可以举堤清二的例子，他是政治活动家，支持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属于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功勋人物。堤清二是全日本学生自治联盟的积极分子，作为著名企业家的儿子，他日后经营企业，并与苏联保持联系。他的父亲持有反苏立场，甚至反对鸠山一郎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他后来对日本左派运动失望，1970年第一次访问苏联之后，他曾写道，他被“对祖国和内心理想的巨大怀疑”包围。第二次访问时值1984年举办“日本设计展”，他震惊于工人国家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学生运动领袖成为战后保守主义拥护者。佐藤诚三郎和小山健一曾经是战后学生运动领袖，之后转变为保守主义理论家。政

① Нобуо Симотомай. История Японии в период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ванами сетэн, 2011 г.

② Память Джимбеи Андо (1927-1928). 1998г.

治观察者森田实、《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苏联》一书的作者清水勇人，以及汉学家中岛岭雄等，他们持守毛泽东思想，抵制苏联。他们也一度支持“民主化和批评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事件期间他们担任中曾根康弘的顾问。之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士向自民党宣传“新左派”观点。1955年，日本共产党“主流”放弃武装斗争的理念，“革命幻想”的时代结束了。在日本经济腾飞的背景下，出现了意识形态融合与集中的新特征。

二、1956–1972 年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和日本的经济奇迹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日本军国主义”明确为敌人。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条约的目标是预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斯大林去世之后，中苏延续了这一政策。事实上，中苏两国的传统敌人是美国，因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只是一个想象（并非真实的威胁）。1952年，在朝鲜战争高潮之时，日本获得了独立地位。得益于美国军队的“特别订单”，日本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经济。中国和苏联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倒行逆施”，反而为吉田茂采取最低军费开支政策提供了依据。应该如何评价日本获得独立地位和日本的经济增长？苏联的日本问题专家给予日本经济增长很高评价。例如负责日本工作的科维任柯，他是科瓦连科的前任。^①事实上，这一部分苏联官员批评日本共产党追随斯大林和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斗争政策。

在日本与苏联之间相互认知形成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双方对待核武器威胁的共同认知。这种认知取代了此前的革命和战争认知。美国对日本投放原子弹之后，苏联也获得了原子弹，苏联完全有可能像美国一样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195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ленков）声明，在核战争中，全人类都将毁灭。这一观点遭到苏共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批评。不过，赫鲁晓夫政府延续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在美苏“冷战”时期，日本公开讨论的一个主题是，需要竭尽全力避免核武器带来的末日（Армагеддон）。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东京杉并区拉开序幕

^① Нобуо Симотомаи.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люди, чьи имена стерты из истории. Кавадэ Себо Синся, 2013.

幕的反核运动，出人意料地演变为大规模运动。关于苏联的核能力是不是防御性的，是不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国内意见不一。和平运动的立场，被指责为偏向苏联。

1954 年底鸠山一郎组阁。不同于亲美的吉田茂内阁，鸠山推崇多边主义的对外政策，也将苏联视为伙伴。同时，在美苏冷战期间，出现了“竞争共存”的口号。社会思想也有所改变。在鸠山执政期间，从 1954 年底日苏关系发生变化，到 1956 年 10 月日苏关系的恢复，为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从恢复外交关系到试图通过向日本移交四个争议岛屿中的两个来解决领土问题，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表现出主动。但是，当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受到威胁后，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放缓日苏关系正常化的速度。在遭到当时仍占领日本的美国和日本外务省的反对后，改善日苏关系的行动时常停顿。例如，战时曾在莫斯科工作的条约司司长下田武三，于 1956 年 2 月突然提出“解决领土问题，则需归还四个岛屿”，结果谈判陷入僵局。

尽管如此，1956 年日苏最终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互设了大使馆，双方关系进入正轨。“读卖新闻”记者早川彻在 12 年之后于 1957 年 3 月回到莫斯科，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灯火管制的莫斯科》。苏联对外友好与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会（ССОД）日本处领导科瓦连柯，曾经说过，这份报纸（读卖新闻）最为反动。尽管如此，早川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俄罗斯还是感受到了类似于“文艺复兴”的现象，或者说是“春天到来了”。他感受到了苏联的变化，例如，（出版了）作家维拉·潘诺瓦的作品。

在日本没有类似的感觉。当时一位知名记者坂本义和在其作品中要求日本寻找中立的路径，重新制定对苏联政策。还有弗谢沃洛德·奥夫奇尼科夫（Всеволод Овчинников）的著作《樱花枝：樱花与静谧》（1971 年）。这本书试图摆脱意识形态，从苏联的视角观察日本。坂本义和（1927-2014）是国际关系专家，是战后“公民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牧师家庭，在上海长大。他童年时在战俘环境中接受教育，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异类。1948 年他考入东京大学法律系，师从丸山政男。大学毕业后，他在芝加哥大学公认的现实主义政治学权威汉斯·摩根索指导下研究国际政治。返回日本后，他起先任教于东京大学，教授国际政治课程。不久

他回到家乡，以政论家的身份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处女作。他支持日本中立，不赞成签订日美安全条约。作为一名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他反对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现实主义者”、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不同于和平主义者，坂本义和发展了安全理论，主张在核时代日本需要中立才能保障和平。

坂本义和始终对核超级大国苏联充满兴趣。他翻译了美国和平主义者迈克尔·舒曼的作品《斯大林外交》。除此之外，他对乔治·凯南的著作《苏联革命和美国》的评价也很高。乔治·凯南先是作为“冷战”先知，而后批评美苏关系意识形态化。坂本义和高度评价当时批评“冷战”思维的信夫清三郎，信夫清三郎认为，朝鲜战争是由美军入侵拉开序幕的。无独有偶，在坂本义和的影响下，60年代在苏联工作的日本外交官中，有一部分人开始担忧日美安全条约，例如西春彦。

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大众社会”形成的背景下，苏联社会抛弃斯大林主义对日本的影响是，看待苏联问题需要避免意识形态化。赫鲁晓夫“解冻”以后，坂本义和及其追随者对于“冷战”的观点与其他人大相径庭。苏联《真理报》记者撰写的《樱花枝：樱花与静谧》（1971）一书中提到，“非政治的”日本现实形象，这一观点非同寻常。即便苏联保守的共产主义学派的日本学专家，也不能否定美国占领前后的日本民主化。^①在奥夫奇尼科夫的书中，他深刻地刻画出了一个没有意识形态虚荣的日本的形象。这本书第一次向日本人展示了，1970年以后在日本生活的苏联人的高教养程度。

日本和苏联建立与发展经济关系的深远过程，开始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1961年和1964年先后两次访问日本。米高扬访问日本一年后，苏日经济委员会开始工作。然而，当1964年赫鲁晓夫因内部变革被罢黜后，这一相对的自由结束了。作家罗曼·金（Роман Ким）出生于朝鲜贵族家庭，毕业于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幼儿园，后来移居苏联，从事文化工作。日苏恢复外交关系后，他曾经对到苏联出差的《读卖新闻》的记者酒田二郎说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代表党内官僚的利益，不能批评他。

^① Латышев И. Япония, японцы и японоведы. М., 2001 г. С.69.

苏联 60 年代中期在罢黜赫鲁晓夫以后，保守主义强化，勃列日涅夫体制诞生。事实上，苏联的国内情势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1963 年以前，日本人实际上没有感受到中苏之间的矛盾。然而，1964 年秋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时，马林诺夫斯基元帅（Малиновский）曾经暗示，下一个（被罢免的人）将是毛泽东，周恩来立即终止访问返回中国，中苏关系正常化迅即陷入困境。

而且，1966 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日本和苏联对此的理解截然相反。当苏联政府以及知识分子开始批判毛泽东时，以丸山真男、武田泰淳和其他人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则乐见文化大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亲台的自民党佐藤荣作政府，认识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局势的认识更为准确。当时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新闻界中高坂正尧等“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和坂本义和等“理想主义”政治理论家之间的分歧。于是，日本对于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更加多样，认为中苏社会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的时代最终结束。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格局进入多极化时代。

三、1973-1985 年：多极世界和“比较社会主义”^①

（一）比较的方法

在中苏冲突加剧的背景下，1965 年上台的佐藤内阁倾向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而不是中日关系。^②当时给人的印象是，日苏之间有可能，也有基础，从意识形态冲突转向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具体来说，比如，日本农林水产大臣赤城宗德访问苏联期间签订了渔业技术合作协议，以及 1965 年开启的领事协议和航空运输协议谈判。20 世纪 70 年代及此后的岁月，苏联对于日本的认知因为一系列冲突事件变得复杂，然而总的来说在朝好的方向改善。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际关系因为美苏的缓和政策而相对稳定。苏日关系的改善，表现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 1973 年 10 月访问苏联。1970 年

^① “比较社会主义”，是指通过比较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认识苏联。

^② Ютака Канда. Перемен в структур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Японии. Иванами Сетэн, 2011.

初，日苏开始在能源领域进行部分合作，从萨哈林岛向外输送天然气的项目也同时开工。^①在樱田武和其他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的企业家的努力下，日苏能源合作积极推进。

普通民众是如何看待邻国的呢？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冷战”和美苏核对抗高峰之时，对于苏联的认知带有一定的围绕着日本自身未来的抽象争论性质，那么现在影响对苏认知的是苏联普通公民的形象，包括持不同政见者。日本民众开始讨论苏联的现实形象。在冷战期间多极化的背景下，当日本与苏联共同开发西伯利亚能源资源而同时与中国接近时，日本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希望建立一个与苏、中共存的“多极”秩序，并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认识他们。

在国际紧张局势总体缓和、中苏冲突引发日本执政党和反对党内部分裂的情况下，这一“比较”的视角，成为评价中国、苏联、越南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工具。结构改革理论的支持者，如之前曾提到的吉宝安多（Jimbei Ando）等，他们向日本人介绍欧洲共产主义和德、法的社会民主主义，而远离中苏冲突的话题。出身于左派知识分子的吉宝安多在比较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后，开始高度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直到 80 年代，由于勃列日涅夫长期统治、阿富汗战争、以及在波兰出现“团结”工会，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更为多元化。通过“比较”认知多种形式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为评价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到古巴社会主义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新的标尺。

同时，苏共在意识形态上对日本坚持保守主义观点，即，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但勃列日涅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集体安全”构想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后，苏联开始悄然与日本接近。甚至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 70 年代初，希望在对日关系中运用“微笑外交”。日本一些支持台湾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是“多极体系”，例如中岛岭雄。

在当时采用比较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中，需要特别提到溪内谦和岩田昌征。溪内谦是“国际主义学派”苏联史专家，在欧、美与爱德华·卡尔

^① Тадаси Сугимото. Разработка ресурсов нефти и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на Сахалине. Нихон Херонся, 2015 г.

等学者常有交流。在其《社会主义分析》一书中，他梳理了斯大林体系和苏联党政关系的复杂与多样。他强调政治民主的重要性，甚至预言改革的发生，但是他尚不足以预见到苏联解体。岩田昌征曾经在南斯拉夫学习，基于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模式。这里还需要提到菊池正纪，他分析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倾向于支持毛泽东。日本的中国学学者毛利和子（Mori Kazuko）使用比较分析方法分析改革中的苏联。

当然，在比较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苏联的认知，还受到苏联社会内部争论（关于多元发展）的影响；也受到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到经济改革理论的支持者弗·布鲁斯和科尔奈。日本历史学家春田春树，组织了多场日苏两国历史学家的对话。此外，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感兴趣的，还有日本的文艺学家。日本新闻记者也日益关注与苏联相关的主题，特别是苏联的民族多样性问题。其中日本蒙古学家兼作家司马辽太郎，写过《关于俄罗斯》一书，以欧亚视角观察俄罗斯。^①他的小说《油菜花之海》，延续了这一思路。这部小说是关于高田屋嘉兵卫的。高田屋嘉兵卫在十九世纪初和平解决日俄冲突中（1811-1813年戈洛夫宁事件）发挥了关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70年代的日本作品中，所包含的从欧亚主义观点和文明发展理论对俄罗斯的认知，与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的观点类似。古米廖夫的思想在当时部分苏联人群中受到过关注。

80年代，当社会主义危机越来越明显之时，东欧和南斯拉夫专家木户茂、“团结”工会研究者伊藤贵之和其他学者，明确表示使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他们的一个观点是，正是在东欧“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市场改革和“多元化”民主发展的基础。

此后不久，这种对于国际局势的现实主义认知，也在苏联出现了。在完全由苏斯洛夫掌控的苏共党内政治理论家中，以保守主义者为主。但是在1970年，在苏联科学院内部成立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中心和信息资料库，专门进行地区研究，如美国、非洲和远东等。一些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具有相对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进入到这些研究所工作；一些年轻学者也被接

^① Ретаро Сиба. О России. Бунгей Сюнсю, 1984 г.

纳进来。一些政治学家，如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所长奥列格·博格莫洛夫，以及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安纳多利·布登可和叶夫根尼·阿姆巴尔祖莫夫等人，也支持这类工作。以这些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为依托，后来在布拉格出版了《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这份杂志是苏联一批相对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讲坛，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中国。但是 1968 年“布拉格之春”后，对于自由主义学派和新改良主义理论而言，“冬眠”期开始了。

尽管如此，国际局势缓和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机构，特别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周围，集结了一群相对自由的顾问和助手。包括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亚历山大·鲍文和中国学专家列夫·德柳欣等人。同时，来自“罗马俱乐部”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搁置意识形态，致力于在生态问题和核武器问题上解决“全球性问题”。其中的一个成果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不再被视为意识形态的敌人，此前不被苏联承认的国际政治学会（IPSA）也在苏联举办了会议。苏联逐渐出现了与日本类似的政治文化。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代表，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东方学所。

1970 年后期开始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所长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特别关注“新兴工业国家”的出现，以及日本和德国利益的多样化。东方学所起初研究亚洲，不过研究人员的兴趣被中东和非洲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以及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高度增长的经济所吸引。被降职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感觉到了危机。他在自己的新职位上更能够感受到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1982 年安德罗波夫执政后，尤其是 1985 年开始改革后，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在苏联政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们面临的是全速发展的亚洲，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两位学者在担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所所长之后都进入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并非偶然。他们加入了苏共改革大本营。然而，由这些趋势到形成新的日本学，则仍需要时间。

苏联的改革者们意识到，全球经济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国际局势缓和的范畴。在“经济相互依赖失衡”的背景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比重低于“第二世界”国家，更不要说“第一世界”了。在“第三世界”国家追求革命性变

革的政治思潮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占据上风。阿富汗革命失败之际，正逢苏联革命思潮在第三世界国家破产之时。

（二）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与经济合作的局限

国际局势缓和期间，是日本和苏联初次建立经济联系的时期。甚至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题材——短讯，专门介绍与苏联社会接触的具体经验。同时还产生了一种风气——透过商务关系的棱镜，比较日本人和苏联人接触时的相互认同。从商业视角认知苏联的代表作，是堀田善卫（1918-1998年）的著作《十九层的日本小巷》（1972年）。堀田善卫出生于富山县的一个批发商家庭。作为“国际主义”记者，二战期间他曾在上海生活。他对于印度和俄罗斯等大陆国家具有浓厚兴趣。在上述书中，描述了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在苏联的日本商社职员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作为“排头兵”被派遣到莫斯科，在“乌克兰”宾馆建立了他们的基地。书中透过经济关系的棱镜，叙述了两个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如何交叉的。书中认为，日本和俄罗斯的集体主义文化，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个人主义。

国际局势缓和时期，还适逢日本因能源缺乏，对开发西伯利亚的兴趣日益增长之时。有兴趣进口资源的日本企业界代表，积极推动实施西伯利亚开发项目，如今里广记、永野重雄和植村甲午郎等。在《日本企业在苏联“战斗”史，1965-1983年》一书中，铃木馨佑描述了日本资源能源企业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联系。日本企业对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苏联远东，表现出浓厚兴趣。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是佐藤荣作和田中角荣政府的主要政策。

但是70年代后半期，商业界对日苏关系的影响减弱。原因在于，日本商业界更加关注中国，全球经济衰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下降，更重要的是苏联领导群体老化和保守心态增强。中苏冲突造成日本政治派系分化，对苏联认同不再有往昔的吸引力。同时，日本保守主义政党内“台湾游说集团”的政策，朝着亲苏联方向演变。但是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日本亲苏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遭到削弱。尽管如此，大平正芳和铃木善幸政府对待苏联的政策，还是与将苏联看作“邪恶帝国”的里根政府保持距离。这一政策与佐藤诚三郎主张的“综合安全”构想相关。1982年铃木善幸辞职后，亲

美的中曾根康弘内阁执政，日本的亲美外交政策再次强化。

1982 年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苏联开始调整对日政策。从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文件来看，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曾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议，按照“五十对五十”的原则通过妥协方式解决领土问题，以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但是因为韩国客机事件，这一目标没有实现。1985 年 3 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去世，改革政策被冻结。

四、1985-1991 年的“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开始了一场名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改革）的运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世界经济领域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象大大下降。里根总统、撒切尔首相推动实施新古典主义的保守经济改革，如火如荼。而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等勃列日涅夫保守主义阵营的政治家们，却无计可施，苏联改革的希望只能越发寄托于新任总书记的个人特性。

在关于日俄关系重建的思考中，最大的疑惑可能是，为什么双方错过了这一良机？日本和俄罗斯，一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个拥有技术和资金资源，两国在能源领域互补，如果能够去除国际政治的障碍，实际上日本和苏联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苏联改革者中不少人支持多极化，例如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等，这一点表现在 1986 年 3 月通过的新纲领中。当然，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也在纲领考虑的范围之内。

但是事实上，当时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等）对于美苏之间的核裁军更感兴趣。而且，里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也寻求与苏联和解。雷克雅未克会晤，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立场接近，两个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同意削减核武器。反对核武器的日本学者支持这一进程，例如坂本义和，在政界是日本社会党的土井多贺子，但是总体上，在日本，支持者很有限。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现出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意愿，但是在日本外交部，遏制政策占据上风。除了支持台湾的中岛岭雄外，日本知识分子对于该问题同样漠不关

心。与此同时，“东芝”公司卷入的丑闻曝光^①，对于支持改善与苏联关系的人而言，“冰河时代”开始了。

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于苏联改革的极端保守态度，很快引起美国政府的不安。甚至对日苏关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日本共产党，对待以政治新思维和全人类价值为基础的苏联对外政策，都态度冷淡。然而，随着1988年布什上台，关于苏联政治改革的讨论开始积极起来。参加讨论的包括和田春树、长谷川毅，以及其他日本政治学者。同一时期，普里马科夫领导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的学者们，也重新评估“新亚洲”的重要性。这些人倾向于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俄罗斯新一代青年日本学学者，如康斯坦丁·卡尔基索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和格奥尔基·库纳泽等人逐步崭露头角；阿列克谢·基里琴科和其他俄罗斯学者关于战后日本俘虏的研究，也受到日本方面的关注。

市场关系在改革框架下得到承认后，多元主义在苏联也有所发展。围绕着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日后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聚集了一批激进改革的拥护者。当时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彼得拉科夫、亚夫林斯基、沙塔林及其志同道合者，以“500天计划”的精神重新评价日本。这是因为，在日本方面，安倍晋太郎及其支持者执政的自民党和苏共改革派之间，积极构建起了联系渠道。在苏联方面，在如何评价日本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委员会保守派的影响大大降低。相反，姆里季雅科夫的《学习日本》一书，以及苏联一些与日本相关的机构，对于日本的评价越来越受到关注。

当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的影响力下降，但在国外却上升。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影响力，也不能忽视。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与海部俊树的高层会晤，喜忧参半。当“戈尔巴乔夫热潮”在日本到达顶峰时，苏联政府在苏联国内却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了。之后不久，日本迎来了苏联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似乎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1991年12月26日，日本国内的主要报刊之一——《朝日新闻》，没有在第一版，只是

① 指的是日本东芝公司向苏联出口军用敏感的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对苏联舰艇的制造技术起到了推动作用，引发美国对日本的谴责——编者注

在第二版报道了苏联解体。

结语：彼此认同中的局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日本和苏联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因而讨论两国相互认同的材料比较匮乏。原因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线：苏联方面，在斯大林末期成为超级大国；日本方面，在美国占领时期经济迅速发展。虽然在和平共处政策和世界紧张局势缓和的背景下，日苏恢复了关系，但是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日益关注的是中国市场。苏联在 80 年代“新冷战”时期陷入了经济停滞，而日本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超级大国。这就是两国在战后的发展路径，相当的不对称。

日苏两国为数不多的认同交集包括：1945 年 8 月日苏战争，十年后恢复外交关系，70 年代的能源危机。但是，在这些时间点上，两国的交往和交集都很薄弱。中苏冲突带来的 70 年代美苏政治缓和和多极化，也没有使日本对苏联形象的认知有根本性的改变。80 年代的改革使得苏联声誉有所改善，但是直到苏联解体，日本和苏联的相互认同，仍然没有达到交叉或者融合的程度。这就是两国相互认同的极限。

（崔珩 译）

【Abstract】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are close neighbors separated only by a strip of water, but in terms of mutual perception, they are quite un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both countries' mutual perceptions, among which rather important ones include wars, revolutions, political factions, economic ties and external factors. Specifically, the Japanese P.O.W issue, the issue of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the issue of Japanese militarism have always been obstacles to both countries' mutual perception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are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utual percep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or Russia. On the whole, until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mutual percep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still have not reached in-depth

integration.

【Key Words】Japan-Soviet Union Relationship, Japan-Russia Relationship, Japan P.O.W. Issue, Japan-Russia Territorial Issue

【Аннотация】 Японию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оссию) разделяет лишь водная полоса, н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заим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они довольно чужды. Есть много факторов, которые влияют на уровень взаим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Япон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ми являются война, ре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фрак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и внешние факторы.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роблема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опрос о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на севере и проблем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всегда были препятствием для взаимн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США, Китай и друг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всегда были важными внешн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которые влияют на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 между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Россией). В целом, вплоть до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заим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между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не достигло ну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япо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а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япо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7 年第 5 期

(总第 207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 元